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06年

胡启立：我和胡克实的交往

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

李锐：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

唐山大地震采访记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特稿

1 我和胡克实的交往……胡启立

春秋笔

2 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李 锐

7 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执着追求……龚育之

求实篇

9 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张培森

19 许集美冤案始末……苏双碧

25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马长虹

往事录

29 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王海光

34 上海第一尊毛泽东塑像……金大陆

怀人篇

40 感受少奇同志务实民主风格……姚力文

人物志

45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李 玲

50 白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王海印

亲历记

55 唐山大地震采访记……张广友

62 我在唐山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张靓文

66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李学愚

一家言

69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赖诗逸

73 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齐翔延

品书斋

74 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序……沙叶新

海外事

76 向华盛顿进军事件……雷 颐

信息窗

80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换届暨十五华诞庆典在京举行……王志光

本期执行主编 徐庆全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氓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5.80元

我和胡克实的交往

● 胡启立

时光如梭，转瞬之间胡克实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真可谓岁月无情,世事沧桑。

我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并曾经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共过患难,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但是一时又难以下笔。近日欣闻要编辑《胡克实纪念文集》,编委会还邀请我作序，所以就不能不让我忆及尘封的往事,想起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克实同志的为人,想起克实同志的做事。

我是在 1964 年作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进入团中央领导班子的。从那时起直到 1966 年 8 月,我曾在胡耀邦同志和胡克实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在此期间,克实同志平易近人、勤恳稳重、踏实认真的作风,孜孜不倦、勤奋刻苦、联系实际的学风,朴实无华、精益求精、严谨务实的文风,以及对年轻干部的循循善诱、大力扶持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

克实同志是在经受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后,于 1937 年 9 月在 16 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从那时起，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中。他经受了 8 年抗日战争和 4 年人民解放战争的锤炼，在不到而立之年，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青委副书记,重又开始做党的青年工作,并且由此进入他新中国的青年工作生涯。

1952 年，他 31 岁的时候，奉调到青年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又担任书记、常务书记,先后在团中央工作长达 22 年,直到 1973 年调入党的科技工作战线。应该说青年工作耗尽了他韶华之年，而他也为党的青年工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他这种青年工作经历的,就是在老一代青年工作者中,也不多见。这种经历既表明了克实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贞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深厚感情。

党的科技工作是克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离休。他是在经历"文革"磨难,重新恢复工作的情况下,走上党的科技工作的领导岗位的。这时,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国家科技事业的工作之中。10 年动乱结束后,克实同志精神无比振奋,被压抑多年的工作热忱强烈地迸发出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新观念，坚决认真贯彻党中央的科技工作方针,积极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科技进步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奋发学习,辛勤工作,殚精竭虑,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我永远忘不了在"文革"那个疯狂年代中,耀邦、克实等同志在极大的冲击和残酷迫害面前,表现出的对党的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忠贞不屈的精神!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每人反剪两臂,弯腰 90 度,"接受批斗"。克实腰部受伤,严重到不能直立，只能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弯着腰勉强移动。在那样严峻的情况下，他依然神态自若,闲庭信步,并关心像我这样的青年干部。他曾悄悄地对我说:"你要挺住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和事实总会搞清楚。"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鼓舞并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些永生难忘的艰难岁月。

克实同志在 6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追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努力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所具有的良好修养和优秀品德。可以相信这本纪念文集的出版,能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胡克实同志,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向胡克实同志的优良作风和品德学习。为此,在这本纪念文集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来纪念克实同志 85 岁诞辰及逝世两周年。

(本文是作者为《胡克实纪念文集》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

● 李　锐

按语：陆定一同志 1906 年 6 月 9 日出生于无锡，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达 20 年之久。今年 6 月 9 日，是陆定一同志百年诞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高度评价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的光辉一生。本刊特发表李锐和龚育之的文章，以示纪念。

八十年代到了中顾委后，同陆定一同志交谈多了起来。他一直以医院为家。每去医院，我总要去看望他，随便闲谈。当年项南不认识陆，很想交谈一次。于是我作了介绍，于 1988 年 10 月 5 日上午一起到北京医院，作了一次长谈。我特意带了一个录音器。这个记录是根据录音记下来的。

李锐：看样子戈尔巴乔夫是比较厉害，人事上变动，把利加乔夫调整了一下，不抓要害，只搞农业了。

陆定一：把利加乔夫留在党内是对的，干部政策不能搞一脚踢。我们党的七大，要把布尔什维克的几个头子选到中央来，有的当中央委员，有的当中央候补委员，大家都不赞成。毛主席说，一定要选，当时他说话灵，而且也说的对。结果这样一个中央就领导革命成功了。没有这些人，革命还不成功呢。

布尔什维克是可以的，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糟糕，就孤立了。像造反派还可以，但“响当当的造反派”就糟糕了，到了极顶就糟糕了。所以不要那么厉害啊！老人家晚年不要那么厉害就好了。

李：他到晚年太过分了。

陆：到了晚年他糊涂了，脑子太热了。

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要悲悲戚戚。“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等。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人们说：“文化大革命”真悲惨啊，这可以理解，因为刚过来。过了十年以后，现在再来看，中国是巨人，巨人醒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还是对的。站起来了后，怎么走呢？我唱支民歌，你们听一听：“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爬得起来就爬起，爬不起来你再爬。”就是说，中国革命成功了怎么办，应该继续吗？可我们接着就发高烧，一个大跃进，一个“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还要搞资产阶级思想。搞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可以那么搞呢？用对待地主的办法来对待资产阶级。建国初和平过渡以后，资本家变成知识分子。我们恰恰相反，把知识分子变成资本家。全错了。三大改造以后，就应将资本家当作知识分子使用。毛主席曾经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各个阶级，哪一个有知识，农民没有知识很多是文盲；工人知识也很少，虽然在工业中工作，知识也不多；地主有知识，是孔夫子那一套，对革命没有用处。孔夫子有一点值得思考，他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伦”，都是封建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经常在一起，就要讲关系，讲道德。其实毛主席也讲如何处理关系，比如军民关系、党政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大民族同小民族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人伦的。人伦还要啊，但不是封建的人伦。毛的选集里面就有很多是讲关系问题的。比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都是人伦，只是不是封建的人伦就是了。

1957 年 4 月,陆定一(左) 与毛泽东
在杭州举行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

我的两个发言你们看了吗?(指 1988 年 4 月 30 日、6 月 17 日在中顾委常委会的两次发言,主要预言世界形势) 看了,你们赞成,我就同你们谈一谈。不谈这两个发言了。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现在的变化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为什么在想呢? 因为好多人提出来,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讲课照老一套去念人们不听了。什么道理呢?因为形势已经变了。老一套只适合于 1914 年以后的五十年。这个时间没有查资料,我也不可能查资料了。我仅仅根据我的记忆了。这个五十年中,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批国家再革命,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 100 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革命。马克思是很希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结果搞到现在它那里没有革命。这就有了过渡时期。形势已经到了帝国主义把世界瓜分完毕,已经没有了那种形势了,还是依据老一套来讲,人家当然不理你,我也不听。所以产生了一个糊涂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中苏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裂,思想上中苏都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苏联主张开兵到什么地方,革命就革到什么地方,就是输出革命。开兵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东德和波兰,而且在此驻有重兵。它搞集团,搞社会主义阵营,搞华沙条约组织,这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为什么同它分裂,我们反对它的大国主义,这一点还是对的。但我们说它是修正主义,说它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要搞大跃进。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甚至红卫兵还冲进了苏联大使馆。幸亏周恩来阻挡了他们。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了,只有我们革命。所以这个时候是思想糊涂,乱了。另一个方面就是第三次浪潮,它对外国的影响没有中国大,在中国引起了轰动。"资本主义万岁,万岁",这就反映了中国的思想混乱,从哪一年开始混乱可以研究,大概就有一二十年了。混乱的状况不止这些,还可以举出一些。的确是混乱。社会主义不晓得有好多种,主要的还是中国同苏联两国。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威信为什么下降,下降到美国、英国共产党的人数极少极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西班牙,佛朗哥传位给王子后,王子启用了共产党。

项南:瑞典、丹麦能不能承认它们是社会主义呢? 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李:最近一期《求是》上面,广东老年理论工作者会议谈当代社会主义的几种情况,似乎是这样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搞的是假社会主义,但假的里面有真的;我们是真的社会主义,但真的里面又有假的。)

项:前年我代表党中央去跟社会民主党谈判,他们的党纲是这样写的:社会民主党思想渊源于:1、马克思主义,即人道主义;2、德国的古典哲学;3、基督教的某些教义。

陆:它们去说他们的。像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有皇帝,有的没有;有的总统制,有的内阁制。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搞社会主义,能否也搞多党制呢?

社会主义本来被广大群众看成为救星,有了苏联称霸,有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使群众觉得你不像个救星了。柬埔寨共产党内部起来要求取消共产党这个名称。缅甸社会主义民族纲领党也搞的一蹋糊涂。

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威信下降,日子不好过。斯大林有责任。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现在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不对,不管怎么样,斯大林时期总是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保存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是一个巨人,我们自己的的年轻人不认识这一点。巨人跌倒,伤筋动骨,但中国还是爬起来了。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没有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是应该讲的。形势

不同了，阶级斗争表现为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

戈尔巴乔夫的书中不敢承认苏联是大国主义，是一霸。你有勃列日涅夫主义嘛？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大国主义嘛。也不敢承认苏联生产的低增长，只有2%。这个人花言巧语。我这里还要讲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如果不讲是不行的。

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就对了。而又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可以随便用的词，可以时紧时松。当然四项基本原则也可当棍子打，不过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总是具体化了。现在讲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比较好了。现在《求是》杂志创刊时开宗明义说，反对僵化，反对自由化，也不讲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自由我们还是要啊，在法律的范围里的自由嘛，这个连资本家都懂嘛。

李：我问您一个问题，毛主席为什么后来变化成那个样子？同他自己讲的绝然相反了。

陆：我不清楚。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线和二线。（李，这是否是主席的由衷之言。）主席退是不容易的。比如，如果毛泽东说，我要退，倘若刘少奇赞成他退，就说明有一些人在附合。因此，刘少奇不能赞成，周恩来不能赞成，旁的其它人也不能赞成。这一次，小平同志好，退下来了，蛮好嘛！如果他脑子不清醒，他就退不下来。（项：他究竟退了没有？）他怎么能退呢？你们都拥护，又没有一个赞成我退的，我怎么能退呢？因为他的威信太大了，群众拥护他，他退了农民都会不赞成的。如果他退了当然很好了。这就有个我们的制度的问题，选举中央委员能不选举他吗？美国选总统两个人竞选，如果得上40%多的票就能当选，不要半数，只要比对方多一点就当选了。他们的制度有一个好处，一届任期满后非退下来不可，要重新参加选举，不重新竞选就退下来了。我们就没有这一条，现在当然比以前好一点了。退下来不容易。（李：毛提出来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依我个人看法，这不是由衷之言。）不，八大二次会议他还是蛮好的。就是那一年冬天就搞大跃进了。那时，毛泽东主张大跃进，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大跃进把经济搞下来，搞乱了以后，他还能够同意“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什么意见也听不进了。（项：“文化大革命”，把你搞下去究竟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后来给我加了顶“阎王”的帽子，我是共产党内的唯一的“王"。

我主张还是要讲社会主义，讲阶级斗争，但不是原来所讲的阶级斗争，是“和平过渡、和平竞争”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我和戈尔巴乔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避开这些提法，所以他的一套搞下去，将来会有困难。他说服不了我，因为离开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许多国家革命都成功了，那些独立国家在寻找学习对象，如果中国好，它向中国学；我们中国要不要向别人学呢？也要向别人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是要的。现在向别人学，连马克思主义都不要了，那不行。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王明的理论讲得多好，迷惑年轻人，还迷惑老人啊。我认识王明比较早，他就是打击别人。留学生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问题，苏联不让代表团管，后来除几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少数几个工人出身的党员外，其余都打倒了。

项：定一同志，有个问题问您一下。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新民主主义结束。你参加讨论了吗？

陆：1949年宣布新民主主义结束，我没听说。

项：事情是1953年提出来的，但分界线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谭震林向我们传达的，当时我们听了都一惊，但没有人怀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如果新民主主义那一套做法拉长一些，可能更好。

陆：我没有听说过。新民主主义的结束是在三大改造以后。当时，还没有狂妄到这个程度。如果那时讲，民主党派怎么会同意呢？我们会把民主党派赶走吗？不会的。我的看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开始早点晚点都没有关系。但在三大改造后，要使用民族资产阶级。

项：1954年我在苏联莫斯科，一看，商店里没有东西。后来我接待苏联共青团书记谢利平。他曾在苏联对我说，中国怎么样了？我说中国的东西比你这里多得多。他不相信。后来他来了，我陪他到了上海、杭州，他什么都没有兴趣，就爱看商店，他说中国这是一个奇迹。你们是不是搞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实行

了三大改造。现在我的看法是三大改造搞早了。那时我们非常自豪。我到苏联后,又到了日本,那时日本也不行,商店里也没有东西。战后五十年代,它还不如中国。我在日本三十九天,只吃了一个鸡蛋,当时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光荣得不得了。

李:我们有一个问题,过去对社会主义没弄清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过去完全不去了解,把它看成为最坏最坏的,你死我活的东西。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时代不能比,同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和二次大战结束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西门子公司的股票只有4%是西门子家族的。而且大企业领导人基本上不是家族的了,都是专家学者;股份是相当分散的。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变化,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也被他们吸收过去了。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发展中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我们胜利后,把它拿过来就好了。本来应该是这样。

项:我讲一件事。打倒您的时候,中央发了个文件,把你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你还可以找来看一看,很有意思。其中一条罪状,就说你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1985年我和胡启立到了西德,到了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看他的故居,有一个马克思家族的系统表,其中有他的一个很喜欢的女儿,叫珍妮。珍妮的丈夫是荷兰人,叫菲利浦斯。我就问:这个菲利浦斯和家用电器的菲利浦斯是不是一个人。他说就是他。你看,马克思的女儿也是可以嫁给资本家的,马克思也没有僵化到把成份论看得这么厉害。

陆:成份论、血统论都是从苏联搬来的。

李:毛主席在解放后为什么对知识分子采取抑制到底的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到最后变为臭老九的政策,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陆:有什么奇怪,那时是头脑糊涂了。

现在有了和平演变的条件,将来暴动不可能了。到美国去暴动,暴动不起来了,人家控制得很严;人家又富了,富的人比较多了,谁愿意起来破坏啊。你到美国去打游击,都不行了。美国、英国的生产由停滞变成递增状。一个美国人同我谈话,我对他说,现在有两个国家呈递增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都是递增状:2%—4%。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快,历史上面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发展的很快,因为所有的打仗的国家都向它买东西,买枪、买炮、买钢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递增状况有一段达到什么程度呢?一年是24%,三四年就番一番。

项:你讲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改变了,还有资本主义造成三大差别的日益对立也改变了。我到美国、丹麦、英国去看了,农村的情况比城市好,农民生活比工人生活好。在美国一个农民从事生产,他的投资平均要25万美元。而一个工人只要十万美元。现在我们不发达国家,人往城市流,美国等发达国家有钱人往郊区去住。我访美回来,华国锋问我,让我简单说一说美国社会情况,我说:“美国有钱人住乡下,没有钱的人住在城里;有钱的人多吃蔬菜,没有钱的人多吃肉;有钱的人住平房,没有钱的人住高楼;有钱的人坐大轿车,没钱的人坐小卧车;有钱的人穿棉布,没有钱的人穿化纤布。”

陆:你没有在美国住二十年,那个很乱的地方,你二十年才能看到。

项:我去了,最乱的我也看了,包括华人街和黑人街。华人街现在也神气得很啊。美国有一种民族,叫ABC,他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不用现代工业用品,不用小汽车、电灯,现在还用牛耕地。

李:今后世界是互相融合、比赛、竞争,谁也不要想谁吃掉谁。

陆:谁比谁好,可以互相学习。

李:最近出了《河殇》这本书,这部电视有缺点、弱点,特别对历史上有些事情的写法,包括你提的没有把中国革命放进去,但总的意图是好的,是为了唤起忧患意识。

项:《河殇》的作者跟我谈过一次,他的意思是中国黄河的文化曾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起来了,他们就是要回答一个为什么。

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年的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落后了,只单单贬低黄河不对。

和平过渡之后,资产阶级消灭了,资本家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国家就要用他们,再不要犯我们犯

过的错误。我们搞的和平过渡是世界第一个，没有谁在我们之前搞过和平过渡。苏联、东欧都把资本家搞得很厉害，差不多就当地主在搞。我们的政策后来搞的不好，本应该在和平过渡后把思想转过弯来，为什么没转过来呢？当时对形势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列宁表述的那个时代。

李：费正清主持的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请我去，我初步想，索性讲一个很大的题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基调是：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能胜利。请你提点意见。

陆：我们党在政治上有过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经济上也屡次发生错误，原因是我们整个党不懂经济建设，不止毛主席一个人不懂，对中国经济状况不大了解，凭空想象把经济跃进上去，这个雄心壮志还是好的，但想得太高了。对毛泽东，不能用他这个人来解释历史，解释不了。当时搞大跃进等运动，我们都提不出意见来。大跃进时，毛把各大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都找来了，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

项：定一同志，中国党历史上许多事情不能用个人来解释。你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有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我们党有好几次大是大非争论，但党和领袖，可以不听任何不同意见，也没有任何制衡的力量，也不能去监督他，因此中国党只要一犯错误，就是全党性的，没有一个地方例外。

陆：你提得好，提出来嘛，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项：《河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写作时间很短，连写连拍只有三十多天的时间，有很多毛病。作者都是三十几岁的人。

陆：那好嘛，不要打击他们。

李：在六中全会，你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讲了那么几点意见，不赞成决议中写上这一条，就当场闹起来，这个很不正常，耀邦同志的事也很不正常，我们都反感。

陆：耀邦的事是不正常的，你也不要太反感。

项：你平时还有个观点，说自由化是在文革时拿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

陆：我查了报刊，第一个是用来反彭真的，第二个是反我，至于反刘、邓大概在以后，没有查我就不说，要有文字凭据。对老同志你们要原谅，他们是农民，忠心耿耿，不容易了。

陆定一是我的老上级。1941 年《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办不久，我就调到报社，一直管评论工作。抢救运动刚开始时，我被人诬告。1942 年 12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博古、陆定一、余光生三人同我谈了一个通宵，询问我的历史情况。1943 年 4 月 1 日，我被逮捕关进保安处。1944 年 6 月释放回到报社时，博古说，他们是不同意逮捕我的。陆定一是改版后调到报社任总编辑的，从而报纸面目一新，也不每天发社论，而是要事才有社论。还记得这样一件小事：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我们能接触到美国的报刊了。有一天报纸四版刊了一条盘尼西林面世的消息，知道是陆定一翻译的。陆定一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当然重视自然科学（党内高层这样的老人极少）。应当知道，不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搞不好的。当年我写过几篇有点名气的社论（如 1944 年 10 月 3 日的《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统计资料刊二版一整版）。博古和定一大概比较器重我，日本投降后，我就被派到冀热辽区主持报纸了。1959 年庐山会议时，陆定一同我一个小组，批彭德怀和小组中批我时，他都一言不发。在秦城狱的最后几年，他同我是隔壁囚居。他的代号是 68164，我是 67126。（前两个号码是入狱年份，1 是专案一办即管判了政治死刑的人，后两个号码是当年关进来的人次。）监狱管制极其严格，即使关在隔壁，谁也不知道是谁，放风时，也是露天的单监。我当然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常听到他大声嘶喊：“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放风时，他老唱那首悲壮的苏武“牧羊歌”。那时，我真担心他得神经病。他后来同我详谈过，在关入秦城前两年，他关在一个胡同中，受到的种种酷刑审问的待遇，听来令人发指。我是 1975 年 5 月释放的，他到 1978 年 12 月才释放。陆定一冤案彻底平反后，他一直以医院为家，也未能安排正式的负责工作。但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有机会就发表谈话，并在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反映他对当前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我非常崇敬定一同志，未能对他作什么研究，只有在他百年诞辰时（我参加了纪念座谈会），将他当年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供关心他和关心党史的人一览。

2006 年 6 月 20 日

（责任编辑　杜　晋）

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执着追求

（二○○六年六月九日在陆定一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 龚育之

今年是陆定一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又是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周年，这两件事，都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

从七大以前的一九四四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二十二年间，除了中间一年多以外，陆定一一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恐怕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长了。

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陆定一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如果要问，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人，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共产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着追求。

陆定一（一九九四年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对科学文化工作的完整的方针，是怎么决定的呢？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了这个方针。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分别提出，那还要追溯得更早几年。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这是向戏剧界提出的，但还没有推向整个文艺界。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件事《历史研究》编辑部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当时一般还不知道。

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里，还没有“百家争鸣”这四个字的概括，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接着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六年四

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四月二十七日陆定一发言。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收入了《陆定一文集》，这里就不引用了。其中，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在四月二十八日的讨论中，有人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

这样，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讨论总结，才接着这个话，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这两番话，现在已经发表在《毛泽东文艺论集》中，这里也不引用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今年是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五十周年。

陆定一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就我所知，陆定一为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做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批阅一份东欧党对过去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苏联李森科学派进行反思的文件，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陆定一请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一九五六年八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使长期被压制的遗传学家在中国取得了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在中国科学界影响很大。会议参加者李汝祺发表了谈与会体会的文章，毛泽东看了，认为很好，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且代拟了按语，代改了题目：《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拔白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极大地冲击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陆定一为在生物学领域坚持这个方针，仍然保持了可贵的清醒。在一九六○年十月的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陆定一都指名一些大学在青岛会议以后再次批判遗传学是错误的，批评这些学校的领导没有在生物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实现党的领导。

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起草和试行。科学十四条是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起草的，中宣部的干部参与了讨论和执笔。高教六十条是陆定一主持下由教育部和中宣部起草的。文艺八条，最初在周扬主持下起草，以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这三个关于科学文化工作的条例，共同特点是纠正"左"倾，调整政策。调整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一个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努力都中断了，中宣部被称作"阎王殿"砸烂，陆定一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纲领批判，那几个条例也受到多方攻击。好在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出的陆定一，作为一个在党内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致力于回顾和研究党的历史。在他心中，念兹在兹，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八六年，为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他只能凭记忆写，因而对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四月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些史实，不免有些粗疏。我当时就与刘武生合作，根据档案材料写了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我专门到医院里去看望陆定一，把我们的文章读给他听。他听后，笑了笑，说：你查了档案，当然以你说的为准！

陆定一著文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他自己说，目的是"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这三十年的历史，是开辟坦途，经历几次严重曲折，重新走上坦途的历史。重走坦途，仍然不免波动。现在又过了二十年。纪念陆定一诞生一百年和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年，不但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三十年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为借鉴，还应该总结和知道从那以后到现在的二十年间新的历史经验，也包括新的教训，以为当前和今后的借鉴。就是说，不能把双百方针当成空话套话，而要与时俱进，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从当前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提高到新的水平。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

● 张培森

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张闻天逝世30周年。回顾历史，这位老革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党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为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为实现党的战略转变和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关于他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内所任职务却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混乱。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张闻天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中，明确宣布遵义会议选举他为"党中央总书记"；而到了1982年党史部门却又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另外的指示要求将其改为一种含混的称号，叫做"负总责"；而今日许多出版物在按此口径称他"负总责"，又不能否认"总书记"的说法时，便在"负总责"后面加一个括弧（习惯称总书记）。但是这种看上去很全面的说法，却实际上仍旧是告诉人们张闻天并没有总书记的正式职务，以至去年3月3日竟然出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载的历史人物专栏《永远的丰碑·张闻天》中，既无"总书记"又无"负总责"，等于抹掉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篇章的严重混乱。问题是究竟张闻天历史上有无担任过总书记的职务？早在2000年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就对此写过专论文章，而如今又出现如此严重混乱现象，笔者作为一个从事张闻天史料搜集、整理多年的党史工作者，就不能不对此有关党史的重大问题再作一点详细的论证了。

1938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五十年代起：国内长期讳言，国外早有公认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任何职务，建国后在国内很长时期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从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起，到后来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党史革命史书籍，在说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都根本不提张闻天的名字，更不要说他后来担任什么职务。然而国外50年代以至70年代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却还都说到张闻天担任过中共党内的总书记这一事实。1957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他1936年赴陕北采访的原始记录，整理写成了一本《红色中华散记》，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中文本1991年由江苏

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奚博铨），该书在说到1936年7月26日他在保安对张闻天的一次"长时间的访谈"时，明确指出："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再看1967—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包华德主编），其中有张闻天的小传，传记的开头就说他30年代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id-1930's)；文中在叙述长征这段经历时，又再次说他接替博古的是"总书记职务"。当年出席遵义会议唯一的外国人，也就是人所共知的那个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1973年在东德出版了一本《中国纪事》（1932-1939），其中关于遵义会议解决的组织问题，也是肯定"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后来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以上这些国外的有关中共党史书籍都毫不含糊地承认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表明这是一个早就为外界所公认的事实，只不过是国内长期讳言而已。

庐山会议后：批判中偶露真相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遭受错误的批判并被罢官之后，公开出版物自然更不可能记述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了；但是随后六七十年代党的高层领导人在谈党内"路线斗争"时，却间或透露出一些与此有关的基本事实。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紧张，1960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有个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报告，报告在谈到党史中从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就说到了张闻天，报告说："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变）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这时，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说到他做张的说服工作时却透露了一句："并且拥他为领袖"。毛泽东的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张这个人物在那个关键时刻的分量，同时也可以说是遵义会议有过"拥他为领袖"的一个佐证。60年代中随着大批修正主义，毛泽东谈党内"路线斗争"的次数也日渐增多，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士有一次谈话，他告诉客人说：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毛泽东这里把张算做党的一代领袖，则至少是肯定他是党内代表一个时期掌握全局的人物。就目前所见，明确说及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是邓小平1965年6月14日接见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他在谈遵义会议这个话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而在较大范围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的则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次讲话。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党内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长篇的"两条路线史"的讲话，明确地说：遵义会议后"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同年7月5日，周在又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更加具体说到当时总书记的交接，他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作为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恩来如此明确说出张闻天的职务，则应该看做是可靠的基本事实。

"文革"后：确认"总书记"的两个正式文件

"文革"结束后明文确认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第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是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所谓"六十一人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蓄意制造的一大冤案。当年要这批同志履行国民党监狱的"例行手续"出狱，是党为迎接抗战需要保存干部而作出的决定。那时正是张闻天任总书记在中央主事。"文革"起来后，康生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头目"，竟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出来作伪证，证明刘在北方局是背着中央自己决定的。面对康生的威胁，张闻天坚持申明中央知道此事，而且为了避免涉及毛泽东，独自承担责任，只说此事是由他批准的。为此《调查报告》在澄清此案时特地指明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报告指出："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是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这里正是明确地用"中央的总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左四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记”这个职务来证明这个批复的合法性。

第二个党的正式文件就是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悼词”公布了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三件重大史实，一是在会上张闻天“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二是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公开宣布总书记是由遵义会议选举，这是第一次。应当指出的是，这份文件是经中央审定，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审阅同意，在陈云主持的追悼大会上，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宣读的一份向中外公布的权威的公开文件；而且当时健在的出席过遵义会议的当事人除陈云、邓小平两位同志外，其他还有杨尚昆、聂荣臻、李卓然、伍修权等同志，他们当时都没有对以上史实提出过异议，有的如伍修权写的回忆文章也证明了此事。要说到这份文件的起草过程，清楚此事的张闻天夫人刘英不只一次地说过：《悼词》中关于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加上的，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也就在追悼会后的第二年，在由胡乔木主编的一九八○《中国百科年鉴》所载张闻天条目中也是明确称他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1982年：改变的理由与矛盾

要求改变张闻天职务称呼的理由，是1982年中央有关党史部门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以下称《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提纲中没有说到会议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而只有这样一段话：“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就是当时上面要求改变为“负总责”说法的主要根据。

基于以上理由所作的改变首先想不通的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她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她当初听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时就知道他是总书记，不久她就接替邓小平担任了中央队秘书长，而且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同张闻天长征中结下了感情，到陕北后结婚成了家。她对张闻天文集组的同志不只一次地说，那时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总书记”，后来“毛主席称洛甫是明君，常跟我开玩笑称我是‘娘娘’，就是因为他是总书记嘛”。她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1937年11月她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东方部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她的，住的是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曾领她去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她印象很深地记得王稼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时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人们都知道，刘英是从不争个人名位的，然而这次她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年7月的一天，她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何方、萧扬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不同意更改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同志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同志意见办时，她服从了。然而据笔者接触所知，刘英组织上是服从了，思

想仍是想不通的。

对于要做这样的改动，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的同志也是想不通的，那时虽然掌握的材料还不算多，但是仅就已有的材料来看，矛盾也是很明显的。编辑工作小组还就已知材料专门向上面打了报告，建议不要更改，批复也是“按陈云同志意见办”。当时我们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录，看到在此之前出版的《彭德怀自述》、黄克诚发表的文章在说到张闻天时都是用的“总书记”，而我们征集到的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仍然不少人用了“总书记”的称呼，然而胡乔木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后竟指责说这是“混淆视听”，于是有些老同志的文章就不得不按统一口径改成“负总责”，不过有的老同志如杨尚昆就在“负总责”的后面加上“习惯称总书记”。但是有些老同志后来出版的书籍就是坚持不改，伍修权1991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中就仍然用的“总书记”（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也未作更改。

“总书记”究竟有无档案根据？

应该说在目前尚未发现遵义会议全面的原始记录的情况下，《提纲》的确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档案，其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遵义会议的重要史实，如“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取消三人团”、会议大部分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等。然而从其内容来看，在党内最高职务这样的重大组织问题上，为什么遵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本身没有任何说法，却只是后来在“行军中”，才在“常委分工上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那么这个“决定”又是根据何来？，而所谓“负总的责任”并不是什么职务。怎能孤立地单凭这样一份并不完备的简单的《提纲》，就断然得出推翻邓小平所说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结论？

而事实上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却是有其他可靠的历史档案为证的。其中有力证明的一份应该说就是张闻天本人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所写的《反省笔记》（以下称《笔记》）。这份《笔记》的缺点是检讨有些过头，但在一些重大史实上应该说是可信的，而其中关于所任总书记职务说得最明确的，是《笔记》说到张自己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要向毛泽东让位而未能正式提出的几段话。他说：“我现在反省我在六中全会上没有坚持的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我没有很好的思索王稼祥同志所传达的国际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没有把康生、陈云同志关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总书记的提议，提到其他中央同志中去讨论，提到大会上去讨论，我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接着他说“当然，在六中全会时，关于此问题，我确首先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就马虎过去了。”再接着他又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确实首先向毛提出过让位，是毛本人当时还不同意提出，结果反而检讨自己，但是“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这句话却说得再明白不过，“总书记”是他当时在中央的职务。

既然总书记的职务明确是有的，那么这个职务究竟是否是通过会议选举的呢？《笔记》也有一句关键的话可以证明，即在此之前谈他遵义会议的经历时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这里“推举”完全印证了邓小平所作《悼词》中所说的选举，而“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则说明选举只能是“政治局许多同志”出席的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可能是《提纲》中所说后来行军中少数政治局常委分工的会议。虽然张闻天这里用的是“书记”而没有“总”字；然而人们须知，张闻天在此之前就已经是书记处的成员之一，根本无需再来“推举”，因此这里所说的“书记”决不可能是书记处成员之一的书记，而且《笔记》紧接着就自谦带检讨地说这是同志们不恰当把他“抬上了党内的最高地位”。因此这里推举的无疑就是他后面所说的要让而未能让掉的“总书记”职务，前后完全是一致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张闻天是人们所公认的为人正直、不说假话的革命家。而这份《笔记》成文

时间又是在1943年毛泽东已经被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推举为中央主席之后，距离上述六中全会才不过五年，其所述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应该说是相当高的。这份《笔记》据刘英回忆说，闻天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去看，“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1983年张闻天文集编辑组也曾将这份《笔记》的摘录本送给陈云去看，陈云通过秘书批复说他看了两遍，也认为张闻天同志所谈基本上是准确的。因此张闻天这份《笔记》目前就是证明他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一份最为可靠的历史档案。

此外，至今中央档案馆还存放着另一份重要档案，这就是1936年6月16日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情况的一份电报。这是自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电报往来后的第一次恢复通电，电报原稿上注有“发报第1号”。电报向国际代表团汇报了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党和红军的全面情况，并陈述了目前的打算。就在内容共有十一部分的这份长电中有一段专门汇报中央的组成情况，电报说：“现在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两份名单中不但都是张闻天打头，而在常委名单中唯独张闻天后面注有“书记”，这里清楚地表明，他是中央常委中的“书记”，也就是“总书记”。

而从笔者主编《张闻天年谱》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档案材料来看，在这一时期中央发给党内的由中央领导人署名的电报中大多数均是张闻天领衔，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至1938这近四年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与其他领导人联署的278封电报中，张领衔署名的就有242封，其中有“洛”在前的“洛毛”联署的共220封。而“毛”在前“洛”在后的“毛洛”联署电报在整个总数中只有36封。另外在这近四年里，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不完全统计就有157次，并在大多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些过去一般人全然不知，难怪王震1985年在一份批示中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史实。历史要真正实。”他还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值得注意的是，王震的批示是在陈云《提纲》公布之后，然而批示就没有按统一口径称张闻天为“负总责”，而是用了“中央书记”这个称呼。

那末“中央书记”是否就是“总书记”，人们不妨还可以再来看看当年继斯诺之后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采访记录。1937年7月14日她在延安对张闻天作了一次专访，这次谈话的记录后来发表在1938年8月美国出版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刊物上，谈话记录前面有一段韦尔斯所写的说明，说明的第一句也是：“洛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不过这篇谈话在收入她后来出版的《续西行漫记》一书时，她在书中对这个“书记”作了一番解释，她说：“在他（指张闻天）以前的书记们是陈独秀（1927年），瞿秋白（1927-1928年），向忠发（1928-1931年），1931——1933年这一期间无书记，职务由委员会担任。”韦尔斯的这个说明应该说是大体无误，因为她所举的这三人都是当时担任党的最高职务，这里除瞿秋白确切的职务现在查实为“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外，陈独秀和向忠发的职务都是明白无误的总书记。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中央书记”即“总书记”，说法略有不同，实质完全一致。

总之无论是当时的历史档案，还是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张闻天的职务不是明确的“总书记”，就是专门标明中央的“书记”（同一时期别人所没有的称呼）的记载，却从没有见到过有“负总责”这样称呼的历史记载，难怪她的夫人刘英想不通说，“哪有什么‘负总责’呀”？后来不得已才在她发表的文章中改为“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老人真正的意愿。

杨尚昆90高龄吐露真情

既然“总书记”的职务确凿无误，问题便又回到了《提纲》本身，为何在这份《提纲》中却出现“常委分工”的“决定”？如果《提纲》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那么可以判断《提纲》所说“常

委分工”做出的由张闻天“负总的责任”的决定,只能是在遵义会议有过总书记选举这个前提之下,而不可能脱离这个前提。可是既然遵义会议已经有了选举,又为何后来还要常委会再来作出决定呢?这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最终是当年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向我们揭开了谜底,是他向我们当面讲述了事情经过的真实情况。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我(即笔者)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这次两位老战友相会,正是在邓小平逝世不久,而他(她)们本身也都是90高龄的老人,叙谈往事,不免感叹时光之倏忽。因为是要写序,交谈中自然最多的还是他们共同经历过来的历史,其中特别谈到了他们都深为了解的已故战友张闻天。而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是杨老主动说起的。他说:

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这番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谈话,不但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在对张闻天《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当场接受),而且也说清楚了陈云《提纲》所说会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

经不住检验的“引证”

历史现象错综复杂,有时仅仅一个史实,不但档案史料中存在矛盾,而且即使是当事人也说法不一。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在把握事物的整体以及发展全过程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研究,才能对可靠的基本事实,得出近乎正确的判断。这里决不能片面地抓住一点或者某个局部,而不顾及其余。即使是当事人,哪怕是权威的当事者的某种说法,也需要进行分析,是什么时候讲的,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陈云生前有名的“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想对实际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是如此。为何“负总责”之说长期为一些人相信,除了因为有新发现的《提纲》这个权威材料之外,还因为党史部门在片面得出错误结论的同时,还不加比较和分析地引用了其他被视为权威的“历史证据”。以下仅举数例:

(一)当初推翻邓小平所作《悼词》说法的依据之一,就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作批林整风报告中的两句话,一句是:周在报告中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接着又一句说“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你看,既然博古原来就不是总书记,那么接替他的职务的张闻天当然也就不是总书记了。可是笔者手中却有一份周恩来公开发表过的历史文献,这里不妨比较一下。这就是长征前不久周恩来签署的以“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名义发布的《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这是一份有“总队长张爱萍、党代表周恩来”签署的动员队员武装上前线的号召书,这份正式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刊登在由中共中央和工农政府主办的同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机关报上。号召书在引用博古、朱德两位党和军队最高负责人的讲话时,都明确标出了他们当时的正式职务,朱德标的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对博古明确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原文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对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神圣与光荣的事业,就是上前线去,到红军中去!’”而这份文件发布的时间,距离后来发生的遵义会议和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职务交替,也不过才八个月。怎么可能总书记这个职务后来就突然没有了呢?一个是当时正式公布的历史文献,而另一个则是30多年后的“文革”时期,并且从讲话记录来看前后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两次明确称“总书记”的话为何不引?)的讲话,怎

么就能以此断定张闻天接任的不是总书记呢？

（二）将“总书记”改为“负总责”的再一个根据，就是陈云1982年对中央某个党史部门提问的书面答复《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首先就说1931年和1934年先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接着又说：自从向忠发以后直至八大，我们党“没有再设过总书记。”这里笔者就要说到中央档案馆一位已故的李云龙老同志，这位从事档案工作多年的老档案工作者特别认真，他在《答复》发表之后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有根有据地得出结论：1934年1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确实是成立了书记处的。人们可以从这些保存的档案中清楚地看到了当时书记处是如何从最初成员的提名，到如何请示共产国际并获得批准，直到全会通过的整个过程。他还查得，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中央以书记处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就达一百多份。这位老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根据这些档案写了一篇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发表在《中央档案馆丛刊》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有书记处就有常委，因为二者在当时是混用的。

而关于博古、张闻天“总书记”问题，《答复》所说自向忠发以后就没有再有过总书记的说法，如今看来也只是说对了一部分。1931年6月时任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两位主要负责人，一个是王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是周恩来准备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开会商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成立的“临时中央局”的确没有“总书记”，博古只是被指定的总负责人。因此本文前面所引的斯诺夫人说，1931-1933年，这一期间中央无“书记”，职务由委员会担任，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然而1933年临时中央迁移到中央苏区之后，就不好这样说了。当时身处中央核心的张闻天最熟悉这段历史，他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又是如何记述这段历史的呢？他说，记得博古到达苏区后曾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于是这次会上“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而博古本人对“总书记一职”并没有推辞。接着张闻天对此事还有这样一段阐述，他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由此可见从上述在苏区召开的这次会之后就不好再说中央无总书记了。

这次会是1933年召开的，接着1934年就在瑞金举行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关于五中全会有无再推举博古当总书记，张闻天《笔记》中没有记述，但也没有说博古不再是总书记。不过既然会议决定设立了书记处，书记处的头却仍然是一个临时负责人，这有可能吗？而从前面所举的周恩来1934年5月17日所签署的公开文件上明确称呼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这件事上看，五中全会是1月中旬召开的，而周签署的文件距离五中全会才四个月，没有会议的正式说法，周怎能擅自公开对博古作这样称呼？然而从现在出版的所有党史书籍上只能看到六届五中

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信

1979 年 8 月 25 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同样没有理由否认有确凿档案以及当事人充分证明张闻天“ 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一事实。

(三)还有一个被用来证明张不是总书记的“ 证据”就是 1938 年张闻天本人发表过一个“ 无所谓总书记”的声明,你看,连张自己都说“ 无总书记”,难道还不是有力的证明吗?然而引证者并未弄清这个声明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表的, 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声明,以及声明发表后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欲知此事的背景必须联系到王明的回国, 王明是 1937 年 11 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他在莫斯科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启程回国之前据说先后还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他当时这种身份回到延安自然是超乎中央之上的,故他一回到中央就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党史上通称的“ 十二月会议”。

正是根据王明的提议,会议对中央机构作了改组,常委扩大至 9 人,中央由常委实行集体领导并重新分工,会议虽没有明确撤销张闻天的总书记,然而却以实行集体领导为名无形取消了总书记。可是这种无头的“ 集体领导”却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中央常委分开了两拨,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张闻天、毛泽东又同王明明摆着存在分歧, 中央的指示号令如何下发?好在原来会议规定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的同时还有这样一条,日常来往电报“ 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因此这时从延安发至各地的中央许多指示电报,包括指示各地大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只好是以“ 洛、毛”或“ 毛、洛”个人署名来代表中央。

全会所产生的中央机构中一律都是“ 总负责人博古”。但是很早以前,1982 年一些老的党史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根据“ 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保存的材料”整理发表过一篇《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其中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机构中就明确标的是“ 总书记:秦邦宪”(按:秦邦宪即博古)。

其实, 对于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问题来说,关键还是承不承认遵义会议有过推举他为总书记这个事实。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已经很清楚, 从会议之前的动议(毛泽东 1960 年的谈话),到会议本身的选举(邓小平 1979 年对张的《 悼词》、张本人 1943 年的《 笔记》、杨尚昆 1997 年的谈话、伍修权等人的文章),再到随后途中常委作出决定(杨尚昆 1997 的谈话、陈云的《 提纲》),都有当事人前后一致的说法以及可靠的文字档案根据,而这又是一个不容分割的完整的过程。面对这样的事实,如若还要拿“ 中央机构没有设置” 这样一个并未查实的说法来做根据而加以一概否认的话,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提纲》中记录的遵义会议“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不是也要否认,如果这一点不容置疑(事实上毛泽东也正是从此进入中央核心),就

1969 年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说到张闻天过去做的好事时还特别指出他在王明回国以后,“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一边的”,可见张闻天这个并没有明文撤销的总书记对当时处于困难境地的毛也还是相当重要的。

可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1938 年 3 月 26 日,时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采访张闻天的谈话《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文章的副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和正题一起均以显著字号刊登在报纸的头条上。报纸以这样的方式刊载谈话张闻天事先并不知道,而从武汉方面获悉以后,一向严于律己的张闻天觉得这样公开有违“十二月会议”议定的事情自然不太合适,便一面致电王明进行解释,一面在 1938 年 4 月 12 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声明:一、“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这就是给人印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条“无所谓总书记”声明的由来。公开声明尽管如此,但是党内毕竟没有明文撤销,何况也没有明确谁来接替,因此实际党内总书记该履行的职责张闻天照旧履行,代表中央的署名电报照旧下发,该主持的中央会议照旧主持(至今留下的会议记录上的列名大都仍然照旧“洛”字打头),同年 9 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词也还是由他作的,直至六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只在名义上当当会议主席。因此并不能根据这样一个声明就认为张闻天就没有过总书记的职务,也不能据此就说他的总书记只当到 1937 年“十二月会议”为止,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如他《反省笔记》中所说六中全会期间要把“总书记一职”让位给毛泽东之事,也不可能发生当时康生、陈云向他提出要在此次会上推举毛为总书记之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张在回答造反派问题时,他还是坚持说自己 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才是“书记处书记之一”,而不再是总书记。

我们应该怎样对历史负责

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 17 年直至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 40 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

就拿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这段历史来说,从庐山会议批他开始,就一直流传这样一些说法:一是说他的转变完全是被毛“争取”过来的;二是说变换职务之事,是张自己提出来的,甚至说他是“自己想当”中央领导;三是上台之后又说他对“未参加军事指挥不满”,以致“反毛”。然而人们过去有所不知的事实是,张早在苏区时期就曾经是在中央正式的会议上,唯一起来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面对面斗争的中央核心领导人;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和途中的危急时刻,又都是他主动找毛谈话,并支持毛的主张。以他当时在党内地位和他原有的思想基础而言,应该说遵义会议之前,他同毛双方是一个合作和互动的过程。至于说当上总书记,现在才终于弄清,是会上选举了他,他还没有当场肯接受,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终于接受的呢?人们又有所不知的是,红军离开遵义之后,正是毛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土城战斗)遇挫,可以说吃了一次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威信),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他才终于临危受命。更不为人知的是不但在扎西转兵之际,他以总书记身份通过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方式进一步支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至攻打娄山关二占遵义进一步显示了毛的军事才能之后,又是张亲自提议毛为“前敌总指挥”。诚然张不是军事家,没有参与当时具体军事指挥,然而却不能说他不懂得军事战略,现在人们有所不知,他就在长征出发前夕发表一篇董老(必武)称之为“战略社论”的重要文章,其中明确提出了红军(一)要采取依照具体情况决定“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二)要认清中国革命战争“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能完成”的长期性和地域的不平衡性;(三)要了解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持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粉碎敌人的“围剿”的三大战略思想。可以说后来整个长征完全证明了这三条战略思想的正确。如果了解了以上这些基本事实,谁又能相信前面那些不实之词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张闻天冤案的平反，和中央批准的张闻天文集、传记和年谱的陆续出版，应当说上述混乱状况已经得到不少澄清；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张闻天的真实历史被埋没得太深太久，以至时至今日有关他的一些重大史实仍然存在着严重混乱。笔者印象很深地记得杨尚昆在他1997年的那次谈话中，对于那些不了解张闻天历史的同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看来（还）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能单凭他的职务，长期以来又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张闻天这个人物，遵义会议后这段历史的主要作用就是保证毛的路线"畅行无阻"，说得好听一点，一切都听主席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仅仅是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的总管而已。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关于是否是总书记问题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史实之争，确实意义不大。然而究竟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先就拿1935年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来说吧，过去人们根本不知是张闻天主持召开的，现在党史书上终于写上这一点。然而至今也仍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之前又为会议做了哪些思想上的准备。事实上还在长征没有到达陕北之前，他就在自己的文章中纠正了过去苏区时期那种笼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左"的口号，向党内发出要更高地举起反日旗帜的号召。尤其不为人知的是在红军刚进入陕北后中央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吴起镇会议）上，他就在讲话中从对当时西方发生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分析出发，提出当前世界有面临二次大战的危险，从而提出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即"变保卫苏区"的战斗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换言之，就是要将反"围剿"的内战转变到抗日战争的轨道上去，指明这是长征结束后"我们的新任务"。及至他率领中央机关进驻陕北瓦窑堡之后，便又紧接着著文，在全面阐述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把"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放到党的"中心问题"的位置上来。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作战，当捷报送到中央后，他又立即致电毛周，提出释放被俘军官，着手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在爆发一二·九、反日新高潮到来的背景下，他便乘国际代表张浩来到陕北传达国际七大的东风，不失时机地主持召开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他所亲自起草的并得到会议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在党内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继著名的"八一宣言"之后的又一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

再拿1936年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来说吧，应当承认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和平解决方针上有着重要影响；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这次事变中所始终表现的冷静坚定的战略远见。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2月13日），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议对策，由于是突发事件，共产国际尚未有明确指示，在与会同志几乎都同意报告人"除蒋、审蒋"的意见的情况下，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张闻天力劝大家"慎重考虑"，"不要急躁"，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当时列席会议的冯文彬同志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曾亲口对笔者说，这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毛张曾经发生一次激烈争论，毛甚至冲着张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应验了张的远见，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整个时局的关键，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终于停止，这就为后来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仅仅从以上这一些事实就可以看出张闻天绝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更要看到的是，这位主要领导人不仅在事关政治路线问题上，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政治智慧；而且这位公认作风民主的领导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建立起一套集体领导的党内民主制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共党内民主的新时期。历史充分表明他是相当成功地履行了他自己的职责，成为中共党史上名副其实的一任好的总书记，其表现出的历史作用也是无人所能代替的。如果竟以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抹去这样一位重要领导人的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实际上就抹去了党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如果历史是这样，还能算是真实的、完整的历史吗？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许集美冤案始末

● 苏双碧

许集美

杰出的地下工作者

许集美，福建晋江安海人，1924年8月出生在一个华侨知识分子家庭。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当地知名的养正中学。1939年，年仅15岁的许集美，由该校地下党员邓贡直、林松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弥漫着大江南北。为了保存实力，党改变斗争策略。经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批准，许集美在当地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借此身份掩护，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安溪县工委书记、厦门市工委书记、闽中地委委员兼泉州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游击纵队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1948年，他经过精心策划，摸清敌情，虎口拔牙，大白天打进泉州监狱，成功地救出被捕的地下党同志。此举轰动泉州城内外，街头巷议游击队劫狱的壮举。

许集美白区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1948年福建解放前夕，由于闽浙赣省委领导人曾镜水错误判断福州城工部是个叛徒、内奸组织，下令残杀福州城工部所属100多名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造成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惨案。此后闽浙赣省委又让闽中地下党下令游击队负责人许集美等公开张贴布告，解散厦门城工部。这就意味着要对厦门城工部开始镇压。要许集美亲自去屠杀自己的同志，他怎样也下不了手。他一面推迟贴出布告，一面暗中通知厦门城工部成员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避免了我党的一次重大错误，拯救了这些革命同志的生命。许集美这种敢作敢为的胆略和气魄，在当时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的。

1948年上半年，闽浙赣省委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计划组织武装人员到闽浙赣边界活动，但缺乏经费。曾镜水要许集美在一个半月里筹集80两黄金。当时许集美是泉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和部下再三研究，因为80两黄金不是小数字，无法零星筹集，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华表山草庵主持人广空法师身上。许集美向广空法师如实说明原因并晓以大义。广空虽未接触过共产党，但传闻中印象不坏，就答应要帮这个忙，并亲自写信要他弟弟准备了100两黄金，许集美嘱咐以"泉州人民游击队"名义开了借条，并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身份承诺"只要经济略为好转，一定如数奉还"。100两黄金解了闽浙赣省委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广空法师为修葺草庵提出要回100两黄金，许集美等向省里打了要求偿还100两黄金的报告，并很快得到落实。广空法师盛赞"共产党言而有信"。

许集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他作风深入，

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居然如履平地，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受过伤。1949年，他策反国民党325师一名副师长倒戈起义，又策反驻守福州北大门的国民党50师参谋长陈盘庚阵前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8月31日，解放泉州时，他率领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泉州城区，为人民解放军进入泉州起了前导作用。泉州中心县委向党移交所属地下党员2232名（不包括所属的厦门市和屏州工委的党员数），正规武装626人枪，脱产武装2647人枪，为党奉献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产。

“莫须有”的“地方主义”罪名

泉州解放后，许集美先后担任晋江县县长、泉州市市长、晋江行署专员等职。在支前、剿匪、土地改革、镇反，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许集美只因是地下党人、白区工作者，一次次遭受打击迫害。1958年福建突然搞起所谓“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许集美、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政籍，工资降五级，押送劳改。原闽中地下党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批判、处分和判刑。

那么，“地方主义”的罪名是怎样来的呢？福建大部分地盘属老区，长征时，从福建出发的红军人数就有二三万人，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红军长征后，福建地下党领导的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分布在全省农村进行斗争，一直坚持到福建解放，被称为“红旗不倒”的典范。但是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部分同志中有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为此，一些原地下党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发点牢骚，说几句过头话，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由于“左”的思想作怪，在历次运动中，有些人总以整人为快，胡乱上纲。例如当时他们批判的“红旗不倒论”、“忘本论”。“红旗不倒论”是黄国璋对下放干部作报告时讲的，他说：过去有两个考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老区斗争、红旗不倒”，“现在我们还要求老同志保持红旗不倒，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忘本论”原是王一平在省委召开的老区座谈会上讲的，他说：“不少群众向我们反映老区存在的问题，当时只做一般的解释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忘本思想。”类似这些说法，无非是指要坚持老区的革命精神，不忘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这个“本”，却被歪曲成“搞‘地方主义’的人提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宣扬斗争性，煽动和组织这些人向党进攻”。经这样一上纲，原本是正面、积极的言论，顿时变成“向党进攻”的毒草，属敌我矛盾。

其实，当时许集美并没有参加省委老区座谈会，但作为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关心老区座谈会是理所当然的。他趁郑种植到福州出席政协会议之便，让他去看看黄国璋，顺便了解一下老区座谈会的情况。郑先后两次见到黄国璋，黄谈了老区座谈会的情况，并向郑询问了晋江地区地方干部的情况。郑回泉州后，把这些情况告诉许集美。这本来是个极平常的问题，却被歪曲成“许集美派郑种植三找黄国璋（实际上郑黄见面两次），面授机宜，正式加入了反党集团的一股”。既没具体行动和具体材料，就把许集美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进行严酷的迫害。

196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福建省委成立甄别小组，对此案进行认真调查。认定当时定罪所据材料都不能成立，给予平反。省委决定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职务和名誉，并向他们道歉。许集美平反后，调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共三明地委副书记。可是时隔不久，十年动乱又开始了。许集美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进行长期关押审查，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批斗。最后，确实找不到他有什么大问题，只好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副书记、莆田地委副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四人帮”垮台后，许集美松了一口气，认为又可以认认真真为党工作了，万万没有料到当时省里的主要负责人却借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运动，炮制了一个所谓“四○五”案件，诬陷“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许集美同志再一

次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

“四○五”冤案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关于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福建省委的某些人不去认真清查“四人帮”在福建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地下党干部。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的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华东组发言时就提出“原福建地下党干部黄国璋（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集美（莆田地委副书记）等极少数几个人，长期以来，打着山头帮派旗号，利用派性，幕后操纵，干了很多坏事。”并说“这几根‘地线’不挖掉，一有风吹草动，又会兴风作浪，后患无穷。”上面一声令下，下边跟着就来。同年4月12日至25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当时的莆田地委第二书记在会上发言时竟然说：“现已初步查明，‘四人帮’插手莆田地区，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或叫三条黑线……一条是地区的许集美、莆田的张庆、永泰的程国良、仙游的林柏椿、福清的黄世铨、陈木水、平潭的余兴铨等人（被点名的都是担任地、县委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干部）通向黄国璋等人的‘地线’。这伙人是埋藏在福建党内的一个反革命帮派，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披着‘老革命’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4月25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又说：“我省乱而复治，治而复乱，几经反复，根子就在‘四人帮’支持的我省那几股帮派势力，为首的除了陈、郑、庄、李一伙以外，还有黄国璋、许集美、朱义斌等人……”

可以看出，省地两级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已经为所谓“查地线”定了调子。可是还没有开始查，就把许集美等人当成“敌人”进行批斗。1977年5月10日，把黄国璋从福州押去莆田。11日，地委在莆田城关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批斗黄国璋、许集美“反革命罪行”的广播大会，据说全地区收听广播的达20多万人。之后，黄国璋、许集美先后被押去福清、仙游、长乐、永泰等县批斗。所到的县都要把所谓“黄国璋一伙”的“地线”人物抓去陪斗或关进学习班批斗。

在批斗黄国璋、许集美的同时，原地下党干部和老区群众也被关进所谓“学习班”“守法班”进行批斗。要他们交代同黄、许的所谓“帮派关系”，达不到目的就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致死致残，有的坐牢、判刑、甚至杀头。在莆田地区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副主任和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原地下党干部共51人，因受许集美牵连而受审查和各种处分的46人，占90%。其中被整死的有永泰县委副书记程国良等3人，拘捕入狱的有老红军郭永星等3人，判处徒刑的有县委副书记林柏椿等11人。仙游、福清、长乐、闽清、永泰等5个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的原地下党干部22人全部搞光。可知，这些人是借清查之机，大整地下党人，并不是在清查什么“四人帮”。

所以，当他们查不出“黄国璋一伙”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什么牵连时，他们就转换命题，大造舆论，说黄国璋、许集美等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1977年6月3日，当时一位省委书记兼莆田地委第一书记在向省委常委会汇报时居然说：“闽中地下党政治不纯，有地、富、反、坏、特务、叛徒，包括黄国璋、许集美。”随后，省委于8月3日决定成立“四○五”专案领导小组，并在莆田、晋江、福州、厦门、漳洲等地市成立“四

许集美、高景春夫妇

○五”专案办事机构。“四○五”专案领导小组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任务就是审查原闽中地下党及其领导人的所谓‘严重政历问题”，并报公安部对25名地下党人立案侦查。在全案审查的25人中，被诬为叛徒、特务、内奸和反革命骨干分子的就有17人。这样，就把一个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的闽中地下党打成“完全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反革命组织了。他们还无中生有指控‘许集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39年混入党内，内奸分子”。据此，于1977年9月3日对许集美拘留审查，1978年8月7日正式逮捕。从此，许集美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活。

实际上，许集美同志的家庭历史都是清楚的，父亲是个秀才，教书先生，没有当过官。哥哥、姐姐早年漂洋过海去印尼、菲律宾谋生，是爱国侨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的四哥在菲律宾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所谓‘官僚地主”家庭并非事实。

许集美本人15岁（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清白的。“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在肃反、审干中，经组织审查，福建省委于1956年正式作出结论‘不作为历史问题”。

所谓‘特务”问题也完全是诬陷，省委早有审查结论。1973年的一次省委全会上，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代表省委明确宣布：“经省委审查结论，许集美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是‘四○五”专案组还是对许集美作出‘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是个特务、内奸分子”的结论。

残酷的迫害和株连

许集美被逮捕入狱后，关在一间单独的牢房里，有病不给治，有药不给服，不准家属送食物，不给放风，不准看报纸，连听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有线广播也要进行干扰。省‘四○五”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的莆田地区公安局长在审讯许集美时说：“黄国璋和你都是福建的拉鲁（西藏叛匪司令）。拉鲁在中国的西南，你们在中国的东南，一个搞公开叛乱，一个搞秘密颠覆，互相配合，共同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每当这个局长审讯许集美时，经常要许站着受审，不准坐凳子；要是不按他们的需要招供，或不在他们编写的违背事实的审问笔录上签名印指模，就得长时间甚至通宵罚站，五花大绑，反手背铐，甚至挥拳猛击许集美的头部、太阳穴。

为了搞到许集美的‘特务”材料，把一些所谓“知情者”秘密拘捕。省文化局退休干部兰守仁、漳州师范讲师郭荫堂，原养正中学校长俞贵元等3人，曾是许集美的老师；原南安南星中学校长、三青团骨干林则务，曾是高景春（许集美爱人）的老师；还有国民党专员黄哲真的老婆黄汉卿等人都被秘密逮捕审讯，要他们交代许集美的‘特务”问题，搞不出材料就刑讯逼供，这些人受尽折磨，有的死于狱中，有的出狱后就死了。

许集美的爱人高景春同志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经反‘地方主义”和‘文革”十年动乱的两次株连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得已于1970年提前退休在家，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运动，也被列入专案隔离审查，受尽凌辱，被逼跳楼，跌断腰脊骨2节，肋骨断4根，双脚后跟骨碎。到了这般惨境，仍不放过，被强加罪名判处5年徒刑。许集美家的老保姆李茅，年近70岁高龄，是个地下党员。只因给许集美送衣服食物，先后两次被关进监牢。出狱时，那个公安局长还威胁她不准对任何人说她被捕的事。许集美的儿子，因为去学习班看妈妈，被关进莆田看守所一个月。许的侄孙是个医生，也被抓去关在泉州监牢。许在原籍的4个侄儿、侄女都被隔离审查，16家亲戚被抄家。许的大哥侨居海外50年，因为相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回祖国定居安度晚年；大嫂在国内，曾经在敌人包围下，奋不顾身帮助营救多位地下党同志脱险，也因受许的株连，被莆田地区公安局派出的武装人员，带着手铐押解前去抄家，致使两位老人惊恐交加，先后离开人世。在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决议强调：“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后，公安部正式通知福建省委撤销‘四○五”专案组。但福建方面拒不执行，继续罗织许集美罪名，抢在1980年《刑法》生效之前，于1979年12月21日以“反革命”罪判处许集美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中央领导关注许集美冤案

许集美被判刑后，他的海外亲属从菲律宾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和中纪委、公安部、中侨办、外交部等发加急电报，要求对许集美案件"处理复查、以释放或保外就医"。后来又趁来京参加全国侨联代表会议期间，向中央写了申诉信。胡耀邦、邓小平及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志十分重视，分别于1980年2月12日、3月8日、3月9日作了批示。中侨委领导接见了许集美同志来京的海外亲属。在许集美冤案还没平反之前，中央组织部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了报告，提出4点应急的缓冲意见：1、许集美的保姆可以释放，许的儿子回原单位工作；2、可以允许许的亲属探望，但要做好工作；3、可考虑高景春保外就医；4、许集美可减轻处理。中组部曾多次给福建省委打电话，讲了4点意见的内容，并要省委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但省委却置之不理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

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同志在审阅福建省"两案"办1980年3月12日报送许集美主要罪行材料（摘要）上批示："许集美判刑的根据不足，也值得怀疑。"1981年1月27日，在福建省"两案"办报告许（集美）案复查结果时，王鹤寿同志又一次作了批示："我看过福建报的材料，证据不足，而且牵强，请告福建省'两案'办要慎重决定。"

中央领导为什么这样关注许集美冤案呢？这是因为：第一，福建地下党问题很复杂，除闽中地下党外，还有闽西南的"红旗党"案，福州东岭工委、厦门城工部等问题。闽中地下党案的解决，必然导致这些问题的解决。第二，许集美冤案发生在文革之后，十分离奇，属于比较明显的冤假错案。这个案子从1977年8月3日成立省委"四○五"专案审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至1983年5月12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决定撤销这一专案，历时6年。这期间，用"四○五"专案办主任杨布的话说："查阅了63000多卷的敌伪档案，走访了680多个知情者，访问、调查300多个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为了要搞出黄国璋、许集美等人的所谓叛徒、特务、内奸的材料，真是不惜一切代价，跑遍全国各地，查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的敌伪档案，采用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各种手段审讯几百个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所谓知情者。但是审查结果，在所有被立案审查的18个党员干部（其中地厅级干部8人）中，没有一人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没有一个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

项南为许集美平反呕心沥血

1981年初，项南奉命督闽，中央领导人告诉项南：福建的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要坚决而慎重地处理。这里说的历史遗留问题，当然包括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使项南感到难度最大的是"福建地下党冤案"。当项南来到福建时，"文革"结束已经快五年了，还有许多"地下党"干部被关在牢中。对此，项南感到很意外。

项南深深地体会到，"地下党"的冤案能不能平反，"这是能否打开福建改革开放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省委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大批的干部解放出来"。项南亲自调阅了大量有关材料，

许集美和方毅（左）

并对那些处处设置暗礁的干部进行说服工作，亮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左”的影响，他要大家不要互相“怪这个怪那个”，要以大局为重。

为“四○五”冤案平反阻力很大，一些相关的领导人推三挡四，拒不配合。项南不能因此影响省委的团结，但原则问题又不能“和稀泥”。阻力再大、再得罪人，他也得坚持下去。他向省委常委会提出让至今还关押在监狱里的许集美、陈贵芳等人“保外就医”。他的提议在阻力重重下得到落实。保外就医对许集美来说是个转机，他可以写申诉材料要求复查他的问题。他远在菲律宾的姐姐、嫂子也特地赶回来，要求政府为弟弟的冤案彻底平反。许的姐姐激动地说：“我弟弟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却被当成叛徒、特务，现在说要台湾回归祖国，像这样做法，他们会相信吗？”对此，项南表示理解。他决心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用事实来证明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正当项南在平反“地下党”冤案遇到重重困难时，耀邦同志在陈贵芳的申诉信上又作了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中央组织部在转达耀邦的批示和陈贵芳的申诉信时，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们，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这对项南来说是支持也是鞭策。

根据中央指示，项南决心加强力度解决福建“地下党”问题，确定了“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地下党”问题的八字方针。强调“按照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把地下党冤案问题查清，并予以公正解决。”由于项南态度鲜明，省委中的一些常委坚定地站在项南一边，给项南以支持。而另一些人则硬顶，阻止对问题的解决。

党中央对解决福建地下党问题十分关心，在胡耀邦的批示之后，中央决定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一个3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由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何载带队开进福建。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之后，认为涉及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四○五专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项南想“借东风”，在常委会上请“中央调查组”当众宣布调查结论，并让常委都表个态，以便统一认识，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正在这节骨眼上，有的常委突然生病。项南说：“我们等。他什么时候病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会。”

就这样，省委常委和“中央调查组”等了半个月。开常委会时，“中央调查组”在会上宣布为闽中地下党“四○五”冤案的平反结论。项南当即要求所有常委逐一表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常委都只好表态同意“中央调查组”结论。

1983年3月29日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宣布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同志的冤案平反、恢复党籍。同年5月，省委又发文，对受“四○五”专案株连的地下党人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至此，许集美冤案得到全面平反。随后，省委着手解决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成绩很大。据统计，经法院、公安、党纪政纪处理的7423件案件，经复查属冤假错案的竟达复查案件的81.9%。由法院受理申诉案2654件，改判无罪、免刑的2219人，达复查案件的83.5%。由公安部门受理的申诉案件，复查1875人，经复查平反纠正的1750人，占90.9%。此外，还恢复了3960人的党籍。这样大面积的打击和迫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但这样大面积的平反冤假错案，也足见党的魄力和实事求是精神。

许集美平反之后，心态很好。他在接受《项南传》作者胡少安采访时说：“彭德怀、刘少奇、贺龙这些开国元勋都受了冤屈，比起他们，我的案子算什么。”在项南的提议下，许集美到菲律宾旅行、探亲，借机广泛接触华侨上层人士，处处维护党的形象，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招引许多华侨到国内投资，对推动福建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平反之后的许集美被安排在省侨办当副主任，1985年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二十年来他协助成立泉州侨乡开发协会，开办开发区，引进大量侨资。在担任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执行会长期间，为老区建设作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使不少老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由于他德高望重，被推举为林则徐基金会负责人，为修复林则徐纪念馆及其他遗址到处奔波，为基金会筹集资金，为宣传和弘扬林则徐的爱国为民精神提供了条件。他在协助党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福建的扶贫工作和中央的扶贫工作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李　晨）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 马长虹

托洛茨基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学习着毛泽东的著作,不断地深化着反托意识;人们在为王实味英年早逝扼腕叹息时,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比王实味更富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舆论宣传的特点,托洛茨基渐渐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

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更是殚精竭虑。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器否决了托洛茨基在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等领域的理论和提案，并发动了持续数年的、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上作最后陈词时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相信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很不幸,历史让托洛茨基成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将他的所有对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断头台;1991年,

苏联解体。而预言了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是颇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在革命的旗号下,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歪曲无所不用其极,托洛茨基的著作被严厉禁止,阅读、传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论处,被判处死刑、流放,最轻的也要监禁几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末,苏联开始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将迎来公正评价之时,苏联解体了。因此,苏联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可谓是不了了之。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前线检阅部队

就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史、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权威党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从这条注释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引用了斯大林报告中的原话,对托洛茨基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绝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功勋,而仅强调他及其派别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任何一个革命者抑或仅仅是有一丝正义感的普通群众,在看了这样一条注释后,必然义愤填膺,对托洛茨基及其派别除之而后快。

1989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空前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逐步地发生了微妙的较客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是,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相对于1952年版毛选中的注释,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而列宁历来高度重视

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诬蔑性词汇。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又有所不同：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注释中又有了三个可喜的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温和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不实之词。仅就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而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但是，注释中“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句评价并没有改变，这是致命的。

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人们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这里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对列宁”是非真，如果是真实的，就不必删去，正因为是非真，所以应删去；事实上，托洛茨基非但没有反对列宁，反而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宁最可信赖的战友，这从《列宁全集》中收录的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他从不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七人小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正确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他对多数派的批评都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这与多数派一味谩骂、固执己见的作风大相径庭。

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

至此，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让历史中不再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义务，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试解 1967 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 王海光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 1967 年 2 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 3800 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伊始，就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痛切地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

作者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悲剧。毛泽东同志所以要在“文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十六条”所以要提出群众路线“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正是因为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

作者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 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

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中，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人，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作者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蒙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它指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紧急呼吁》进而对中国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话说，它们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作者表达了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者还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夺权者的认识。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真相，被无意识地动员到这场运动中来的党员、团员、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拳拳的护党之心，是从党性出发的，但对造反派分析中也显然有着不无感情用事的粗率之处。

既然这场政治危机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周天寒彻”了，要把这场运动“重新纳入”党内斗争的范围，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揭露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作者似乎认为，在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觉悟了。他进而指出：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从文中可见，作者并没有指出这种依靠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具有组织行动意义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许，他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在结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正式发动起来了。运动的最初阶段，重点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响应“文革”的群众主要是在学校。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组入校领导运动的方式，——这是中共历来领导运

动的传统套路，虽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但对社会的冲击面还不是很大。此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理念。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文革”运动，首先是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肯定青少年学生的激进行为是革命行动，认定刘、邓派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了这场运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场运动，肯定了群众自发成立组织的合法性，群众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是自建国17年来，中共第一次允许群众可以在党的组织系统之外进行自行结社的权利。

196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打破运动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独创的，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这个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确定了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这是依靠党外的社会力量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的一个历史“创举”。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动乱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到1966年底，在工矿、农村限制开展运动的规定都被打破，全国各行各业都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形成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1967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支持并指导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夺权”，打响了全国夺权的头炮。一二月间，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夺权奇观。

在这个“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急剧升级的过程中，运动的对象和动力发生了转变。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经风光无限的老红卫兵们摔落下马，敢于“矛头朝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原来限制人们参加运动的有关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随着动乱范围的扩大，“文革”领导者和群众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上下对接的错位。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动中，党内外开始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声音，屡屡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这在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进入夺权阶段后，以往的国家管理系统全部被打乱了，以极左思潮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促使党内外一些思想敏锐者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和做法进行更深入的推测思考，人们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开始由“文革”的前台人物渐渐转向到毛泽东本人。但是，此时反“文革”的思想言论，在中

《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部分）

共党内外的动因和表现仍有所不同。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从前段运动的矛盾引发来的，具有反弹的性质，以拥护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其分野；中共党内出现的反“文革”思潮，则主要是针对全面夺权来的，反对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自下而上层层夺各级党政组织的权。

在社会的异端思潮中，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红卫兵从天之骄子的革命宠儿地位上跌落下来，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举动，以“联动”为其代表；一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血统论”思潮和贯彻政治歧视的社会政策，要求维护人权平等的基本价值，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其代表。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对以后群众组织的派别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

在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批正直人士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同志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介入运动“支左”，普遍镇压了造反派的情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缺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共产主义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发生了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在运动的具体政策问题上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有着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贞之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中共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革命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作为中共党员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

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这份《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唯我独革”的国际共运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的蹂躏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对作者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非凡的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运动发生偏差问题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同志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并不旁及其他。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对“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另外，《紧急呼吁》将这场运动中的举措，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夺权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相联系，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毛泽东同志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责，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即1967年初，全党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紧急呼吁》似乎对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权威力量和轴心作用认识不足。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通过了《历史决议》，才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海第一尊毛泽东塑像

● 金大陆

一尊毛泽东不锈钢胸像

196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如日方升的时候，上海长宁区刻字社金属雕刻小组的十五位员工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倡议：塑造一尊巨型不锈钢毛主席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在一片革命的喧嚣中，这类倡议很快就泡沫化了（以至后来因市委“迟迟不予答复”，竟成为上海最大的当权派“仇视伟大领袖”的佐证）。“一月革命”中，长宁区刻字社的代表跑到北京，在出席全国工艺美术造反派大会时，再次向参与接见的周恩来、陈伯达提议，并当即得到周、陈的认可。第二天（即1967年1月13日），国务院第二轻工业部便致函上海市手工业局，表示热烈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同意筹建“九米毛主席不锈钢像”工程，并提议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定稿，先试制小样，备齐资料，上报审批。经费开支则暂由刻字社垫付，待后拨款。由此可见，上海的塑像工程在启动阶段就上下通达了，且打上了“组织委托”的印记。

1967年1月24日，由市手工业局牵头，有市委工业政治部、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冶金局、工艺美术公司、油画雕塑创作室、长宁刻字社等十二个单位参与的“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展了试制工作。试制工作没有专家，仅凭雕刻工、钢模工、翻砂工们的“赤胆忠心”和“深厚感情”在支撑、在操弄，所以送审的一公尺小样被第二轻工业部指定“内部审稿”，“继续进行表面加工”。为领袖塑像毕竟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1967年的领袖被全民抬举着、欢呼着，风发而神圣，其形象岂容丝毫的差失。“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终因“没有能力塑造毛主席的形象，只好采用得奖的办法向全国征稿”。经过这么一番磨合和整改，“毛主席塑像委员会”于3月1日开始，正式在上钢三厂开模，首先为上海浇铸一尊毛泽东不锈钢半身胸像。制作过程历时近三个月，其间共试制了四百五十毫米、五百毫米、一千零五十毫米等八尊小样。据报道：正式“浇铸的这一天，当飞舞着万朵金花的钢水，注入砂模时，盼望了很久很久的人群，个个扣紧心弦，等到钢水浇完，钢像还处于红彤彤的阶段时，人们就冒着高热，迫不及待地打开砂箱，检查是否符合要求”。（1967年6月14日《红钢战报》）新铸的毛主席不锈钢半身塑像高一米零五十、宽一米一、壁厚十六毫米、重三百公斤，被各类红卫兵造反报称为“全国第一座”。

6月5日，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塑像游行安放仪式。毛主席不锈钢半身塑像围着红绣球，由鲜花和青松簇拥着，端坐在报喜的彩车上。彩车在喧天的锣鼓、爆竹声中从上钢三厂出发，渡江以后沿瑞金二路、淮海路、南京路缓缓地向市革委会所在地外滩前行。一路上，身着白衬衫，佩带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注意：这身装束并不具有文革的特征）举着彩球载歌载舞，红旗方阵气势如虹。从四面八方奔赴来的群众，集合成了数里长的报喜队伍。队伍到达外滩后，举行了庆贺大会。随即“在万众欢呼声中将不锈钢毛主席塑像隆重地安置在市革委会的正门前”。

6月5日的上海是激奋而昂扬的，它通过仪式，通过集会，不仅制造了巨大的群众现场，更制造了巨大的社会共鸣。

两尊毛泽东金属立像

“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工作有着北京的背

景，其具体任务也是要为天安门广场浇铸一尊“九米毛主席不锈钢像”。这种目标指向自然不能满足上海造反派的意旨，所以1967年3月，上海的一百多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9工程组”，声称要在人民广场检阅台前，塑造一尊高达12.26米的不锈钢毛泽东立像。5月9日，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红三司、红代会（筹）新复旦师、新师大红卫兵师等造反组织又正式发表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指明这是“一座毛主席身穿军装”的立像，要让它“永远屹立在东海之滨，黄浦江畔，永远屹立在我们的身边，发射出万丈光芒”（1967年5月16日《火线报》）。随即，“119工程组”主持召开了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对塑像的建议。

群众组织张扬出如此宏伟的规划，且“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工作在多次要求“慎重”的情况下，正等待着“中央批示”，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促使市革委会办公室于6月29日发出通知：所有的塑像工程“暂停动工”，有待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决议。市革委会还指出：其实，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均缺乏条件和力量，在材料、浇铸、表面处理方面“存在一系列难题”。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组织还相互攀比，相互封锁技术。当119工程组筹建12.26米塑像时，塑像委员会即将原9米高的计划修改为15米。当塑像委员会因力不从心提出合作意向时，119工程组则不予采纳。双方人员间的走访，也尽量遮掩关键技术。在1967年全民崇敬领袖的狂热中，在直接为领袖造像的神圣行动中，竟然存在着不顾大局与要端，为追求更胜一筹的势派，为炫示超越他人的荣光，而谋虑计策方略，而把玩雕虫小技的情状。可见，人群集体性地升腾在虚幻中，一切都是膨胀的、浮游的。但回到具体的操持中，就必然会发生重重的纠缠，相遇种种的诱惑。普遍的人性在此才必需是面对的，在此才会是真实的（这即属于“非常”状态中的“正常”）。

7月11日，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毛泽东塑像问题”。（恰逢毛泽东关于塑像“劳民伤财”的指示下达）会议认为：在上海市内的重要公共场所（如人民广场、外滩等）拟建若干毛主席塑像，但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划”，“各工厂、学校一律不搞”。很明显，会议的结论并没有限制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的动作，因为强调了“公共场所”的需要，重申了等待“中央规划”的必要，反而为这两个跨行业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更富有弹性的腾挪空间。所以，尽管以后风声趋紧，不时传来中央或市革委会有关“制止”塑像的指示，准备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广场浇铸15米、12.26米塑像的规划，也几乎看不见落实的希望，但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凭恃着颂赞领袖的时代认同，借助着基层群众的期待和支持，仍在不停歇地为浇铸新的毛主席塑像而奔忙运作。各类红卫兵小报则不间断地向外界传输着这方面的消息，比如9月22日《新交大》报道，受国防科委委托，上钢三厂用二炉钢水一次铸成的毛主席不锈钢塑像（高7.1米、重16吨），正在进行抛光，将于国庆节前护送北京。9月30日，《新交大》第四期刊出的照片可谓确证。再比如8月17日上海电专编辑的《文革通

讯》报道，高 3.7 米、重 2500 公斤的毛泽东磷青铜立像，已于 14 日在上海汽轮机厂分二段一次浇铸成功。其它消息也证实，8 月 17 日，这尊毛主席立身铜像在 119 工程组展出，共有 5 万人瞻仰。看来，尽管消息之间在细节方面有些驳杂，但塑像委员会和 119 工程组在 1967 年的第三季度，塑造成了两尊全新的金属领袖像应该是确实的。

9 月 29 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向上报告，因仍有单位继续毛主席塑像的施工，“我们口头、书面劝阻均无效果”，故建议市革委会成立“毛主席塑像工作组”，进行“统盘考虑”。结果，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后作出严肃批示：“现在一律不造”，因此“不必成立工作组”。徐景贤还特地在批示中加括号注明“包括 119 工程和塑像委员会的铸像”。但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说了等于白说，做了就是做了，这多少具有冒犯和嘲讽的意味。

第一尊校园塑像

1967 年 5 月 5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新华社专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立即在上海的校园里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济、复旦、华东师大等校的师生奔走相告，纷纷贴出倡议书，要“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也永远矗立在校园”。

同济是最早行动的，5 月 15 日晚由军训团和东方红兵团确定初步方案，16 日即选址破土，17 日师生们便抬举着 1 米高的塑像模型在全校游行。确实是边设计、边施工、边庆贺。当时，曾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提出“伟大不等于巨大，巨大未必伟大”，“根据我校条件，搞个三、四米的就行了”的意见，这不仅引出了一场批判，以正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更激发了“革命小将”的斗志，因为“我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完全有胆略、有信心、有毅力、有能力”，“高水平、高质量、高速度地建成毛主席巨型塑像”（1967 年 7 月 1 日《东方红》）。这便直接导致参与该项工程的全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青年教师，竟然“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权威”。

为毛主席塑像是盛大的节日，设计组通过向全校征询意见，采纳了解放军“毛主席身着军装”“让军帽拿在手里”（因为“毛主席宽大的前额集中了全人类的智慧和理想”）的建议，完成了设计稿——毛主席巨型塑像耸立在同济园的中央，像高 7.1 米，基座高 3 米，由晚霞色花岗岩砌成。基座正面嵌着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背面是十面红旗和万年青浮雕，这“象征着我们千秋万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向着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海枯石烂不变心”。

施工是跃进式的，至 5 月 31 日，开工半个月的泥塑工作已基本完成。因为第二天是同济校革委会成立的重要日子，“泥塑工地上一片欢乐，参加劳动的工人和同学怀着喜悦的心情，忙着整理场地。下午五时三十分，突然泥塑后身开裂，裂缝迅速扩大，同学们奋不顾身抢修无效，终于整个泥塑全部塌下了”（1967 年 7 月 1 日《东方红》）。这在当时是一件天塌地陷的大事，不仅仅在于明天政要们要来出席会议，更在于为毛主席塑像的行动所寄寓着的政治意义。经检查，造成塑像轰然

垮塌的原因，是“运用了强度不够的木骨架”。这在以建筑为专长的同济大学，也应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这是没有专家、权威参与工作的灾难，同时，幸亏没有专家、权威参与其中，也就消解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的猜疑和恐惧。

工人、同学们擦干眼泪，一遍遍地学习“老三篇”，“闻讯而来的革命师生员工纷纷送来鼓励书、请战书，送来一段段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精神的照耀作为那个时代的法宝，固然可以重新集聚队伍，昂扬斗志，但终究不能替代科学的规律。经研究，工程组决定电焊钢骨架。于是，“电焊工人夜以继日地战斗，仅仅一夜工夫把高达七米多的钢骨架竖立起来”。接着，又两天两夜“把十三吨膠泥一块块抛上脚手架，扑打在钢骨架上”，至6月7日，新的毛主席泥塑成型了，师生员工们敲锣打鼓，声称“创造了世界雕塑史上的奇迹”。12日，工程完成了壁厚8厘米的石膏模上浆。后又用一千根钢筋，二万根细铅丝进行绑扎，且工艺规定钢筋骨架与石膏模内壁间的距离，必须严格控制在三至五厘米内。施工队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在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任务后，激动地在塑体上写下一条大标语：一切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从塑像的垮塌到再度树立，期间的痛苦、委屈和艰难终于在此刻消融了，消融在一条伟大的归因中——其实，在那个嚣浮的时代，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归因是很容易就可以攀援，就可以划入的，且越伟大越容易攀援，越容易划入——那就是简洁思想、沸腾情绪，让自我丧失在这种归因中。反之，当这种归因成为了集体认知，或者说表达了普遍心声时，它留下的社会悲哀又会是很深刻的。

6月22日，总高10.1米的壳体式毛主席塑像工程进入混凝土浇注工序。决战时刻，场面繁忙而热腾，人们紧张而激动。层层升高的作业台上，挂起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高扬起的塔架上，披下了毛主席的巨幅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炊事人员到达现场，医务人员到达现场，文艺小分队到达现场，广播台一遍遍情绪激昂地播送着“老三篇”。浇注混凝土需多方配合，连贯运作。经过长达四十多小时的高强度作业，至23日凌晨，“当东方喷射出万道光芒的时候，当广播台高奏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时，整个混凝土浇注工作胜利完成了”。

7月1日上午7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四十六周年的日子里，同济大学八千师生隆重举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典礼”。令人诧异的是：与两个月前新华社全面报道“清华大学建成毛主席巨型塑像”的消息形成鲜明的反差，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竟然没有对此作点滴的报道。

其它的塑像

同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于7月1日落成时，由劳模蔡祖泉挂帅的复旦大学毛主席塑像筹备组、交通大学毛主席塑像筹备组、华东师大“九·一五工程组”等正率领着师生员工在校园中积极工作，比如：承担塑像任务的复旦“红画笔”不仅将各种毛主席像拍成照片，画成样稿，组织全校讨论，还专赴青浦淀山湖寻找上等黏土。殊不知，因清华的造像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效仿，同时也引发了中央的隐忧，所以此时关于塑像的风声已开始悄悄地变调了。7月5日，毛泽东作出正式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68页）。7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不仅传达了“最高指示”，更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

在此前后，根据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对上海的塑像情况所作的调查，全市共有32个单位有所行动（含跨行业的“119工程组”等），且已完成塑像的单位有4个，正在建筑中的有11个，筹备动工的有17个。

7月底，市革委会向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并特别提示“正在筹建毛主席塑像的单位”正式转发中央“七·一三”指示，严肃指出“上海一定要坚决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时，市革委会又以徐景贤的批示“已建立的，不采取批准手续；未建立的，暂不建立；继续向群众做说服工作”为口径，向中央发出请示报告。一切似乎都在按照部署平稳地进行，但局面并未发生明显的改观。

9月13日，中共中央追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通知》承认"七·一三"指示下达后，"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直接给中央送来报告，要求兴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目前，有的正在施工，有的积极备料"。《通知》重申"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并在第三条中作出具体规定：

"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毛主席塑像的，严格按照'七·一三'指示办事，由省市领导机关或军管会认真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主席塑像的，立即停下来"。

事实证明，恰恰是这第三条规定非但没有成为有效的禁令，反而成为各地继续"兴建毛主席塑像"的借端。其一，因为出现了"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的提法，也就在"未建"、"准备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客观上为前者的合理"存在"赢得了辩解的空间。其二，因为要求有关领导部门实行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也就将"建与不建"的问题，演变成了对"像与不像"的裁判。"像"即"合格"；"合格"则不拆。其三，因为规定"七·一三"指示后建造的塑像"停下来"，那么该指示前或计划、或动工的项目，自然也就不必"停下来"了。何况，对指示前后的认定，是很富有伸缩性的。

上海方面的情况可谓例证。据10月2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上交的《关于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的毛主席塑像如何处理的请示报告》称：据统计，"目前已建成毛主席塑像的有十多个单位"（期间，复旦大学的塑像于8月5日落成；华东师大的塑像于9月15日落成）。这不仅影响很大，使"原来已经停下来的单位，又继续动工了"（例如华东化工学院），这些单位的有关人员还经常手持中央"9·13通知"到政宣组来，指着第三条的内容"吵着要政宣组派同志前去审查"，并要求"报销经费"。同时，根据北京市革委会已组织二十多人规模的塑像检查组开展工作的情况，市革委会政宣组认为"我们不过问是不恰当的"，故特此建议由政宣组、群运组、文教组、工业组、经济计划组，并"可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成立上海市毛主席塑像检查组。对此，徐景贤作出如下批示："我们没有责任批准他们报销经费"；"检查只是为了拆除不合格的，这项工作矛盾必大，可暂缓进行"，"如发现有严重歪曲损害主席形象的，可临时组织检查小组专门处理"。徐的态度是有些迟疑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回避的。半个月后的11月9日，政宣组再次向市革委会报告上海建造毛主席塑像的情况，"目前继续加紧施工的有机械学院、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第一医学院、上海橡胶厂等单位"，"他们相互串连，相互效仿，相互支持"。同时，有些单位明知中央通知的精神，干脆不作汇报，擅自动工造像。报告特别提及工总司安亭兵团无中生有地宣称"经过市革委会同意，工总司支持"，在嘉定安亭筑建起一座毛主席立像。还有专业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室在"七·一三"指示前，已建成四座3.8米高的毛主席塑像，"目前又擅自建造，虽加制止，效果不大"，甚至还准备向有关单位出售这些塑像。

那么，为什么"关于毛主席塑像"的禁令一直不通畅呢？

看来，在"为毛主席塑像"的使命面前，人们的情感和精神，正是通过对物质材料的把握和雕塑，而倾注于其中，凝聚于其中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充满情感和精神的运作，才使塑像神圣化、光辉化了，以致不仅可与人们的情感产生交流，更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支柱。且用于塑像的物质材料是坚固的，即塑像将成为永驻的、不朽的存在，这一切怎能不使人们因热爱而执着，因景仰而向往呢！所以，即便有领袖的谕示，有中央的指令，但降临到民间时，民间的理喻和接受，也会使之产生偏离，产生倾斜的。

荒诞与失当

综观上海的整个造像运动，其内里的荒诞与失当也是值得一记的。

以1967年5月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为标志，全国兴起了大规模的造像运动。因此时全国的文革形势正处于"全面武斗"的阶段，也就出现了不少同一单位树立起两座塑像的情况。上海市区的文革运动基本没有经历"全面武斗"，但个别基层单位的派别冲突，围绕着"为毛主席塑像"的重大事权，仍不免乱腾地发生争斗。前述中的华东化工学院两派就曾拉开阵势，企图对峙地塑像。结果，1967年11月，"红旗"一派在院内大草坪上筑起了巨型毛主席塑像，并署上了"红旗全体

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的字样。对立派“新化工”一千多人竟然九个月不去大草坪毛主席像前请示、开会。直至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化工学院，经作了大量协调工作，并决定将塑像的署名改为“院革命委员会”后，才算解决了问题。（1968年第59期《支部生活》）

上海某学院的A、B两派也曾上演过这么一出荒诞剧。当时A派率先于6月21日在校门口贴出筹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的倡议，并敲锣打鼓，报送喜讯。但B派却“不闻不问，没有写出一张喜报和标语”。第二天上午，A派打电话给B派，请看以下的对话实录。

A派：“想问一下你们对校门口那个特大倡议的看法？”（作者注：竟然不直接说出是为“毛主席塑像”的事宜，可见心态之别扭）

B派：“这个问题——我们很早就提出建议了。所以，你们现在是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A派的传单上有“戳一枪”写道：“恬不知耻，贪天功为己有”——这是当时典型的用语）

A派：“你们的建议？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B派：“有好多事情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A派：“为毛主席塑像，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打一场人民战争！”（因为主动，便把道理讲得圆满）

B派：“对！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使全院的革命造反派在B派的领导下，共同来筹建毛主席塑像。”（可见要害不在于事情，而在于事权）

A派：“我们希望联合起来筹建一座光焰无际的毛主席塑像。如果你们执意同我们分裂，我们建造下去的决心是下定了。”

B派：“那是你们的事。”

通话结束（《情况纪实》上海某学院红卫兵传单）。

6月23日，A派宣布成立了上海某学院“毛主席大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并联合附近工厂的造反队召开了“毛主席塑像开工典礼大会”。与此同时，B派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声明》，强硬指出：A派“想在建造毛主席塑像方面捞稻草，想借此证明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完全是枉费心机的、徒劳的。我们警告你们，你们根本无权建造。我院只能在B派领导下建造此塑像”。在这派言语中，哪还存在着“为毛主席塑像”的热情和忠诚呢！24日上午，A派去同济大学塑像工地取经。中午回院后即用白粉在大楼中心草坪上划出了塑像筹建区。B派一负责人当即与工人发生争执，并撕扯筹建区的牌子。下午，B派动用高音喇叭集合队伍，再次与工地上的A派发生争吵。以后，待到中央的指示下达了，这所学院的毛主席塑像也就没有建起来。

塑像工地速写

在此，不仅是记录了“为毛主席塑像”而发生的一段史实，更是为了说明“为毛主席塑像”这般神圣的行为和主题，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阐释而发生衍变的——以致或者使之悬置起来，变得庞大而不落实，落实的却是派别的需求；或者使之粉饰起来，变得迷离而不真实，真实的却是集团的功利。于是，“为毛主席塑像”的行为和主题，在一片拥护和歌颂中，尽管不失外在的“神圣”，内质里却已经渐渐地被标签化，甚至被工具化了。这是“为毛主席塑像”的荒诞和悲哀。其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荒诞和悲哀都是可以通过这类小孔而窥见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感受少奇同志务实民主风格

● 姚力文

在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中期，我曾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五年多。我真正深入认识和理解他，还是在参加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后，联系五年多的耳闻目睹，我深切地感受到：不论在艰苦卓绝、处境险恶的白区斗争环境，或是在敌强我弱、浴血奋战的抗日斗争前线，还是在夺取了全国胜利，长期身居高位的情况下，少奇同志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了真诚共产党员的本色。

少奇同志的高尚风格具有鲜明的特色：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独立地做艰苦的工作；他尊重同志，平等待人，具有民主的工作精神和民主作风。

他倡导具有民主的工作精神和作风

少奇同志在 1948 年 10 月间，用自身的体验，勉励华北记者团的同志们："你们要有主动地学习的精神，独立地把你们的事业做好"，"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之后的不久，我从当时的《冀鲁豫日报》调到《华北人民日报》当记者，赶上了学习这次谈话的热潮。通过学习我深切体会到：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时刻，少奇同志不仅对记者们，也是对经历过革命斗争和战争考验的党的干部们所寄予的殷切期望。期望他们能够锻炼成为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能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运用理论，独立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的建设新中国的人才。

当我回顾少奇同志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整理和编辑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稿之后，我更具体地感受到，他要求别人做什么，他本人总是率先地切实地去做。

"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这是 1937 年 5 月，少奇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来的。之后，他又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论党》等文章和报告中多次阐发了这一思想。

什么是民主的工作精神？就是不仅要认真执行民主的程序，更重要的是"把民主精神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少奇同志有针对性地指出：领导机关要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启发同志的批评精神，使群众敢于讲话；领导人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同志，用平等的态度待人，虚心接受下面的批评，不搞任何特权；党组织要吸收全体同志的经验和好的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在加强教育，提高党员服从组织、遵守纪律性的同时，注意清除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这就是民主的工作精神。与此相反，没有民主精神的人，往往是独断专行，压制民主，甚至搞个人专制主义。他们只要下级的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不听取下级的意见，不帮助下级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只知道作报告、发指示、责备下级。

少奇同志倡导民主精神并身体力行，是与他深厚的群众观点和公仆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少奇同志看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努力，任何事业都不会成功，所以要

刘少奇在农村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不应该、也不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只能是启发人民群众的自觉，引导和组织群众的带头人。“即使是伟大人物，也只能起这些作用。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少奇同志说，还有些同志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人民之中；他们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任”；“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归”。如果这样的同志不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没有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向群众学习的观念，他们怎么可能有民主的工作精神呢？怎么可能克服官僚主义呢？

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少奇同志强调：“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反对官僚主义。”他号召：“我们的同志要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并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和群众。还须制订出关于民主的法律，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的官员的办法等。”只有加强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再加上健全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发扬民主的工作精神。

担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近二十年的杨尚昆同志曾向我介绍说：我同少奇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来往较多，彼此熟悉，我深知他好学不倦，勤恳工作，平等待人，作风民主。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退居第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有事总是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商量，乐意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对某项工作提出意见，总是事前经过充分酝酿，往往能得到大家的赞成。他原则性强，严肃认真，有时批评某个同志显得很“厉害”，然而这些同志也并不觉得他不民主。

他心系百姓、直面现实、勇于自我批评

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内民主和发扬民主的工作精神的内容，也是推动党内民主和发扬民主的工作精神的有力武器。要顺利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领导同志的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少奇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在党内造成一种敢于讲话，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放手工作的民主风气。

少奇同志是这样讲的，他总是身体力行、常年不懈。

1947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少奇同志和朱德等

同志一起转移到华北解放区。他作为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壮大了我党我军的力量,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在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左”的错误。少奇同志不推诿责任,勇于承认并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郑重地自我批评说:“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大约在进北京后的1950年初,广大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即将展开的前夕,他叮嘱当时主持华北局工作的第二书记刘澜涛同志:你们什么时候开会,通知我一声,我到会上对1947年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以便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更好地工作。“文革”后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后,刘澜涛同志同我谈起这段感人的记忆时,仍然很动感情,表示出对刘少奇同志的衷心钦佩和怀念。

少奇同志不仅自己勇于发现和改正错误,他还鼓励全党同志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去研究问题、发现问题。

1948年秋,解放战争的形势飞速发展,全国胜利在望,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提醒自己,也告诫同志们,要经常检查自己,切不能自以为一贯正确。在这一时刻召开的华北记者团学习集会上,少奇同志不仅动员记者们到基层、到各阶层群众中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困难和呼声;鼓励记者们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中央。“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误,允许你们提出,这是你们的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有缺点,也要提出来。”少奇同志还坦诚地说:“我们坐在这里(指党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我国农村的生产力遭受巨大损伤,为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少奇同志于1961年初,去湖南省农村作调查。在他自己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我旁听了他同当地几位老农和基层干部的一次谈话。少奇同志动情地对乡亲们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在谈到“退赔问题”时,他说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还有部分个人所有制,不能随便侵犯,自留地的产品要归社员所有。不能动摇所有制,一动摇社员就不安心生产。为什么有些社员不尊重所有制呢?一个原因是肚子里有点饿,主要想拿点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的社员的东西。首先是公社大队不遵守社员所有制。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现在应讲清楚,上边拿的要坚决退赔。社员拿别人的,也要退赔。现在拿不出的记个账,秋后退赔。

少奇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向乡亲们提出建议:“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少奇同志的这次谈话,具体地体现他心系百姓疾苦,正视错误、勇于自责的坦荡胸怀和风格。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教育,终身难忘。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可能具有最大的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无所畏惧。他没有做‘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近半个世纪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一个心系百姓,直面现实,勇于自我批评的榜样。

他是政治改革的思想先驱

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欧亚大陆先后发生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一是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推行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一是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召开了夺取全国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场上

胜利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党的“八大”集纳和深化了方方面面的成果，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为新中国构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蓝图。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正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外宾所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破除了“迷信”，“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在这一解放思想的大潮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探索和反思涉及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少奇同志的重要贡献是：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思想，提出了进行民主制度建设的观点和设想。

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敢于直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暴露出的弊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介绍了波匈事件的情况和教训之后，初步阐发了进行民主制度建设的观点。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为了“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除要进行教育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

少奇同志在1956年秋冬至1957年春的多次讲话和报告中，主要讲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监督制度。他号召要认真研究人民代表大会怎么工作，如何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是研究报纸如何监督。对此，刘少奇曾指示新华社说：你们要认真地讨论一下，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外国新闻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他希望报纸起到监督作用，因为“当错误从地平线刚刚冒头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揭露和制止，是对人民不利的；应该及时地在新闻报道中提出来，要人民注意。”他甚至提出了“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的通讯社”的观点。谈到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他强调，“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这既是对党内纪律存在某些事实上不平等现象的谴责，也是对建立确保领导者与一般党员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平等权利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强烈呼吁。

二是规定对领导者的权力限制。他说：“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否则，容易出现“一说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的错误。这里刘少奇的阐述是简明而有针对性的，这确是当时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的一种新视角，一个大胆的法治思想见解，也是对建立约束权

力主体行为机制的理性思考和严肃探索。

三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思想。建国初期由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各种组织机构建设的需要，党从军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提拔和选用了大批干部。由于事实上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而又缺少对干部的选举、任免、任期、离退等方面的明确制度规定，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一些干部产生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思想，干部队伍膨胀和机构臃肿、重叠的现象开始显现，而且带来干部队伍难以更新调整和素质下降的后果。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警觉。1957年2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我国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现在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的错误。”而在此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高层领导的任免也提出过意见。他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长”。“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他指明：“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他的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已经有了这种意思。而且他敢于在政治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对比，表明在那一时期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少奇同志探索改革道路的视野和胸襟是很宽阔的。

四是取消特权。党中央在建国前夕就敲响了防止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的警钟，建国后还发起了一系列运动进行整顿，并不断强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对廉政建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少奇在“八大”上仍然不得不警告：“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取消特权的观点，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他建议，“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例如领导人乘坐装有喇叭“可以不听交通指挥”的汽车；群众难以吃到肉、花生米、油等食品而领导人员有特殊供应；在人民中间影响不好的警卫措施等等。他提醒说，这些事情似乎是小事，但“不知不觉地享受了特权”。而且“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你们这些人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点花生米算什么呢？一闹起事情来，一上了马路，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在原则上应该取消。”这里，少奇同志的说法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具有最高层领导干部身份却能够提出取消特权制度的观点，这与单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相比，显然是更深刻得多的思路，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直面现实的内省性思考。

尽管少奇同志上述政治改革的思想因未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未能在实践中贯彻与落实，而是被之后兴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浪潮所冲击，所吞没。但是少奇同志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相当丰富的，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那种求真实务、勇于探索、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精神，他那种心系民众，直面现实、正视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那种尊重群众、尊重同志、平等待人、把“民主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的民主精神和风格，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发扬。

（责任编辑　致　中）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 款 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李 玲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一、追寻历史正义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1926年，年仅十四岁的少年邓拓就步罗隐的《咏蜂》写下了这首充满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诗。诗中感叹民生的意识和兼济苍生的襟怀，表明邓拓自幼就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仁人志士精神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邓拓对文史地知识的涉猎面非常广。除学校教育之外，他大量阅读了父亲的藏书和家乡福州乌山图书馆的藏书。这些书包括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经典论著，还包括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以及十月革命后所传播的马列主义著作。同时，他也阅读佛教和基督教经典。福州西郊怡山附近有座千年古刹——西禅寺，经常有高僧开坛讲经。他时常不惜跑远路到西禅寺听法师讲经。福州东街花巷有个著名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尚友堂，离邓拓家不远。邓拓也时常带小侄女邓全一起去做礼拜，听牧师宣讲基督教义。但最终形成他人生观基石的，只是儒家的济世精神和马列的社会批判理论。宗教，在邓拓的心理中仅仅是作为知识而存在，并没有形成信仰，对他的人生观没有构成什么影响。他始终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前生和来世。

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著名的"科玄之战"。正处在建构人生观时期的初中少年邓拓一直非常关注这场论争。张君劢和丁文江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些论辩深深吸引住了邓拓。每天放学后他都迫不及待地到书刊上寻找新出的论辩文章，消化理解之后还向同学们介绍各方的观点、谈论自己的看法。这场"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924年底。参加论战的除张君劢和丁文江外，还有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范寿康、林宰平、孙伏园、朱经农、任叔永、唐钺、邓中夏、瞿秋白等。论战的深入是代表科学派的胡适与代表唯物史观派的陈独秀展开正面交锋。最让邓拓服膺的是陈独秀等人的唯物论

观点。在陈独秀看来,重要的是“历史观”,而非“人生观”,“人生观”必须无保留地统摄于“历史观”。与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相比,个体性的“情感”、“意志”、“信念”、“良知”等等,并不重要。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唯物史观深刻地影响了邓拓的思想。唯物史观把“历史必然规律”置于绝对重要的位置上,而忽视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取向堵住了以个体生命体验反思意识形态信仰的可能性。它奠定了邓拓在革命队伍中无条件忠顺于意识形态信仰的心理基础。

1929年夏,17岁的邓拓高中毕业,本来准备按照三哥的建议报考清华大学。他的三哥邓叔群清华学堂毕业、公费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和森林学硕士学位,此时已经成为著名的真菌学家,正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任职。邓拓到上海考试由于被同乡拉去看电影看到深夜,早晨晚起耽误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于是,他就报名考取了私立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考试完他受到三哥的数落之后,反倒冷静下来对三哥说没有上清华未必是一件坏事。他说:“三哥,你以为清华和留美,便能挽救国家的命运吗?在这班国民党的腐败官僚掌握之下,所有的科学和文化的贡献、设施,都是空话!”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同样怀着报效祖国的殷殷之心,但与相信科学救国的哥哥不同,邓拓显然更加关注如何改造社会组织结构,认为追求社会公平比追求器物层面上的进步更有价值。邓拓的志向是批判甚至推翻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志向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方面。首先,邓拓在建构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从“五四”到“五卅”再到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时期,在刻苦学习之中,他广泛接触了各种思潮,尤其是初步接受了从俄国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受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影响,这样他的人生追求就和从小就泡在实验室中探索自然科学的三哥有所不同。其次,邓拓自幼就熟读经史子集,儒家圣贤“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社会使命感和他们“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早已渗透在他的思想深处了。这样,尽管他有研究的兴趣,但是他显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希望能投身到追求社会公平、历史正义的事业中。他要在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两间憔悴一书生,长对清灯亦可惊。
不卜文章流海内,莫教诗酒误狂名。
得侔前辈追真意,便是今生入世诚。
白眼何妨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

这首作于1930年冬的《书城》诗中,邓拓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两类传统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一类是以文章为传世之事业的正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诗酒傲世的狷狂知识分子。邓拓是积极入世的。他不愿意仅仅在诗酒山水中独善其身而放弃自己的社会使命。邓拓渴慕先贤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不愿意追求个人的功名,不愿意追求家族的荣耀,也不愿意仅仅在“立言”之中寄托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要在这新时代寻找代表历史正义的道路,要把自己投身在实现这种正义的实践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在灯红酒绿之中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庸俗之辈,邓拓是不愿意同流合污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鉴别,邓拓认定了中国共产党所实践的便是自己一直在追寻的历史正义。他决定为之献身!他相信把生命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就能超越个体的有限性,获得最终的精神归宿。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邓拓才能在国民党狱中毫无畏惧、坚守气节。1932年12月11日,邓拓参加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起义的活动,在工厂开会的时候被捕了,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不久,他又被解押到苏州反省院。在狱中,面对叛徒的威胁利诱、面对敌人的酷刑,邓拓始终一声不吭。这时候支撑邓拓的是心中的理想之光,是共产主义信念。

从狱中出来,邓拓一边参加哲学论辩、宣传马列主义,一边寻找党组织、参加“左”翼社会活动。1934年至1937年,他在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就读。他提交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同时,邓拓还完成了一部25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邓拓研究灾荒,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活动,其中也熔铸了他关怀民生疾苦、批判社会不公的人间情怀。因而,他对灾荒史实的梳理最终引向对人类社会关系的追问。他认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

解放军某部批判邓拓大会

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伤害和破坏。”这一时期，邓拓一方面从事学习、研究，另一方面还担任了开封“民先”大队长的职务，领导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进步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他才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1937年从狱中出来，邓拓就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五台山地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民族抗战工作，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的总编、社长，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人。邓拓是以一个“左”翼战士的身份从事新闻工作的。他的新闻理论，延续了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的观念，认为党报是“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这显示了他与诸多中国近现代报人的不同。他必然要把这些自由主义报人所反对的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当然，在他的使命意识中，党性原则维护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团体自身的利益，而是党的纲领中所强调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他的新闻理论着重阐释了毛泽东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

60年代初，邓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集中集中批判主观主义、批判不切合实际的盲目行为。这既源于他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冷静、深刻，更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大跃进”给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他感到痛心疾首。在中央领导层对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有所反思的时代大环境中，邓拓暂时舒展了他的呼吸，摆脱了精神上的许多束缚，写了一大批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大话空话的杂文，锋芒直指前一时期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也直指还留在许多人身上的极“左”作风。他抓住主观主义这一思想方法来批评，显然把反思的锋芒直指各个决策层、领导层。当然，这种批评仍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前提下对党的工作所作的内部反思，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执政党进行批评，更不是对使得错误政策能够通行的政治体制本身进行质疑。他希望他的批评能够警醒从事现实工作的各层领导，让他们改变思维方式、改进工作方法。邓拓在毛泽东等已经作出反思的形势下写杂文，批评主观主义的错误，尽管忠心耿耿，且完全符合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并且谨慎地把反思限定在思想方法上，不去触及中央仍然肯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本身，但仍然注定了是不会讨领袖的欢喜的。此时，邓拓历经延安整风和50年代的党内外斗争，自然是明白吹捧比批评更安全、什么都不说比反思更安全。事实上，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投机的林彪这时候选择的就是一味吹捧毛泽东。但是，邓拓提起笔来，辛辣地批评、讽刺了各种主观主义、盲目吹牛的做法。促使他这么去做的，是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的责任心，是心中的那一股追寻历史正义的理想之光！

“何以对将来青史”，是邓拓1946年痛悼王若飞、叶挺时质问国民党的一句挽联。其实，个体如何面对永恒的历史，也正是邓拓自己一生的核心情结，是邓拓衡量自我生命意义的标尺。他把马

列主义认同为代表历史正义的大"道",认同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于是忠诚于这一意识形态就是邓拓把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建构牢固关系的必然方式。把马列主义奉为唯一的信仰,而不是作为世间各种学说的一种，邓拓自然就不可能对革命的基本原则、基本组织结构作出反思,只可能在不动摇革命大原则的前提下反思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式。

二、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邓拓既有明确的生命自觉，始终关注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邓拓的思维中,基本上只是个体生命对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原则的被动服从，而不包含个体生命对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原则的质问。他的斗争锋芒只会指向意识形态的敌人,而不会指向革命原则、革命领袖本身。对敌的坚定顽强、与对党的忠贞柔顺,是邓拓性格中互补的两面。每当革命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无端受到党组织的怀疑、受到领袖斥责的时候，邓拓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与历史理性关系被割断的焦虑。

1944 至 1945 年整风受审的时候，邓拓由于在河南从事过地下工作,无端受到怀疑,他写下了《战地歌四拍》这组向妻子倾诉怀抱的诗。其中两首,他这样写道:

青丝依样似旧时,
镇日书空,
孤怀无寄!
入乡有意从头认,
壮志纵成烟,
不向蓬蒿浪掷!
心血如潮,
七度春秋销北地,
数三十又三年,
衰逝堪伤天欲晦;
问后来岁月,
还能几许?
古道凄清埋诗冢,
高山流水休再听,
广陵散绝,
无复当年韵!
只如今抖擞旧精神,
酬尽心头文字债,
待取新衣上征途,
好将身手试,
长为孺子牛。

鼙鼓又声喧,
打叠琴书无着处,
缩地失长鞭,
脚跟无线,
咫尺吴头楚尾,
想旦夕四野动烽烟,
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东西。
漫负笈携囊早登程,
且休回首,
向茫茫平沙去处舞干戈,
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回首三十三年的人生岁月，回首在根据地游击抗战的七度春秋，再面对目前不被组织信任的困境,邓拓不禁感到天地苍茫、时光无限,而作为个体的人是多么脆弱无力。他觉得满怀的壮志,都可能化为云烟;觉得自己的心境异常苍老,再难以用浪漫情怀去憧憬未来岁月。尽管难以抹去自我生命的荒凉感,邓拓还是不改甘为"孺子牛"的志向,他还是勉励自己要抖擞精神、继续在革命的征途上跋涉前行;还是鼓励妻子"且休回首,向茫茫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邓拓在忠信被疑的情况下,既抚惜自我的精神伤痛,又不改追求理想的心志。这与屈原被放逐之际吟咏《离骚》抒发自己的忧愁,又表达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追求何其相似!这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生命自觉和理想坚韧。所不同的是，邓拓在忧伤孤独之中并没有像屈原责备楚王宠信奸佞、批判世俗混浊那样去责备、批判任何人、任何制度。圣主贤臣的儒家文化,还提供了士大夫以天理大道对抗世俗权势的思想可能。但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高度的一统化之中,此时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可供质问革命异化的思想资源。任何人只要对革命忠诚,就很难从思想上去对抗、审视革命组织的种种作为。邓拓自觉以革命战士、以共产党人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不仅不

会在理性上质问组织，而且不会对组织有什么非理性的怨气。邓拓在备受打击之时审视自己的过去岁月，追问自己的“后来岁月，还能几许？”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在本质上是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强烈的愿望与强烈的不自信所造成的冲突。强烈的愿望来源于邓拓济世救国的高远情怀，而不自信则是因为他把党认定为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一旦党怀疑自己，固有的忠诚意识使得他不会去怀疑党与历史正义的必然联系，而只觉得自己可能要跌出代表历史正义的战车，堕入无边的历史阴影中，使生命失去意义。这样的焦虑，并没有对党的任何怨言，但是表现出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注，因而仍然是一种相当个人化的思想漫游了。因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邓拓妻子丁一岚编辑《邓拓诗集》时，经反复斟酌，仍然不得不删去“镇日书空，孤怀无寄！入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衰逝堪伤天欲晦”、“古道凄清埋诗塚，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这样一些情绪低落的句子，因为“她考虑到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中，本应充满昂扬和豪迈，而邓拓那些惆怅情绪，需要做特别的注释读者才能明白”。担心读者不明白，实际上包含着担心受到误解，担心政治评价上再出麻烦。尽管几十年之后，人们认识到“惆怅和忧郁，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昂扬的对立面。它们不会损伤人的理想主义，不会让人消沉。相反，在特殊情形下，在特别的人身上，它们反倒使豪迈与昂扬更为深沉”。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不允许它的忠诚战士有任何惆怅与忧郁的。革命意志薄弱这类武断的评价，总是很容易被强加在那些有个人化人生感悟的忠诚者身上。

1948年4月，“如故年华过荏苒，伤心梦幻倍蹉跎”的焦虑再度充塞邓拓的心头，他还是用“一生九死抱琵琶”来明志并自勉。1957年前后，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他不仅不抱怨，而且还如实向下属传达领袖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每当忠诚的自我与革命主体之间出现裂缝的时候，邓拓总是用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用党性原则说服自己顾全大局，维护组织的权威和领袖的威望；总是勉励自己用更为勤勉的工作、更为忠诚的行动向组织和领袖见证自己的忠心，从而弥合自我与革命主体之间的裂缝，从而使自己的生命能够融入自己所认定的历史理性中。每当个体生命面临被革命主体抛弃的可能性时，人生如梦的虚无感受就会悄悄在邓拓心头滋长。1959年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他郑重地告诉自己“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这恰恰表明他心中有人生如梦如烟的失重感需要克服。

正是因为把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原则之间的关联看作立身之本，邓拓在他感到政治环境宽松一些的时候，便能大胆以革命主体一员的主人翁精神对革命事业中的不足之处展开反思。1957年创作的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中，邓拓便站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批评了“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庸人政治”。只有对现实有敏锐的触觉、对历史和人民有深切责任感的人，才可能这样切中时弊地思考问题。而当意识形态、革命领袖走向偏颇的时候，邓拓有时便不能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尽量按照中央的口径说话，尽量用领袖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1950年他写作了社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定下的调子，认定“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1960年创作的《江南吟草》和《延庆道上》系列组诗中，邓拓像不谙世事的贵族诗人、像不愿意被现实打搅的归隐诗人那样，给饥荒中的农村镀上一层优美的田园诗意。在意识形态中不能落伍的观念，有时也会压迫着邓拓的思维，遮蔽着邓拓的眼睛。他这么做的深层心理动因是，害怕被抛出革命的战车之外从而与自己认定的历史理性、意识形态法则之间脱钩。他早已认定了追求革命、追随领袖是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唯一之路。

1966年，江青、姚文元等对邓拓的杂文进行政治附会，制造“文字狱”，把邓拓打成“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大老板”，打成“叛徒”。邓拓在申辩无门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用自己的尸骸去填补自我与革命主体、自我与永恒历史之间的裂缝。在遗书中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这表明邓拓至死都是忠诚于他认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他不能让自我生命游离于他青年时代就认定的历史理性之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白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

·王海印

辛育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者和第一任院长,曾获得许多殊荣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承担过国家多项重大科研项目,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胸外科医学人才,对我国的胸外科手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他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又践行了白求恩的精神,而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感受白求恩精神

辛育龄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时,他在保定的一个属于教会创办的学校读初中,年仅16岁的他不甘心作亡国奴,返回故乡,通过地下党员的哥哥参加了由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领导的抗日革命组织——冀中抗日民族自卫军。因他年纪太小不够参军资格,被派到政治部搞宣传,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处刷抗日救国标语。半年之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到达保定,将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成立了冀中军区。辛育龄于1938年春正式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每当战斗一打响,一些伤员从前线被转移下来。当时我军的医护人手欠缺,军区卫生部就从政治部抽调人手支援,其中就有他,从此他便成为军区卫生部的卫生员,为以后认识白求恩并走上学医救人的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不懂医术,为了更好的医护伤员,军区卫生部首先对他们进行培训,那时候崔月犁(解放后任卫生部部长)与他在一个班。共有三个班:一个班是女同志学护士,一个班年岁稍大一点的学医士(医助),还有一个就是药剂班。当时的药品多是英文名称,因他懂得英文,于是便到药剂班当了司药。受训毕业后他就到冀中药剂科(药政科),主要负责管药、发放药品等工作。

1939年春天,白求恩大夫到了冀中军区,急需配备助手,卫生部便派辛育龄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剂员。此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和白求恩朝夕相处。回忆起那一段生活,辛老没有谈自己的经历,而是谈白求恩的工作精神对自己的感染:

白求恩医疗队来到冀中军区,明知战斗前线有危险,但他坚持一定要到前线去,完全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救治伤病员。在几个月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从白求恩的身上看到了他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和精湛的医术。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国家,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援我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崇高道德啊!尤其是在救助伤员的时候,他表现出的那种英勇无畏,令人钦佩。

回忆让辛老陷入沉思,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与白求恩工作的情景,一点点地还原。辛老讲到了齐会战斗中白求恩的所为。

齐会是河间府的一个小山村,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我120师到达以后,首先把战斗的重点放在这里。战斗打响以后,敌军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很嚣张,叫嚣着向我军攻来。我120师依据沙河

的地势布阵，战斗到上午10时左右，将敌人包围并歼灭几百人。

这次战斗之前，白求恩医疗队并没有接到通知。在得知前方有战斗时，白求恩医疗队立即奔赴前线。到达前线后，辛育龄帮助医疗队搭建临时手术台后，就一直作为白求恩的助手对伤员进行救护。白求恩主刀，辛育龄的工作就是对伤员进行分类：看哪个伤员流血严重，就挂红牌，准备手术；伤势不太严重的伤员，便进行包扎或者挂黄牌。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战况激烈。敌人的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并配备了飞机等空中支援。为了保存力量，我军进行战略转移。而白求恩呢？辛老回忆说：

白求恩是真不怕死的，他很了不起。在部队要撤退的时候，白求恩不吱声，他不说撤，也不说不撤，专心致志地做他的手术，包扎、止血等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领导派警卫员催促他离开，甚至要强迫他走。正在这时，一个浑身是血、肠子露在外面的连长被抬进了手术室。我用绷带将他的伤口勒起来，通过翻译问白求恩："这个病人的伤势这么严重，他还能不能活下来？怎么办？"白求恩回头一看，命令说："上去"，于是就将这个伤员放到手术台上，展开手术工作。由于医疗条件极差，就用凉开水消毒，然后把肠子洗完后填回肚子里，用线缝上。当时警卫员要拖开白求恩，要白求恩赶快撤退。但是白求恩根本不理他，硬是将病人的手术完成后才离开，拆下一块门板将这个伤员连忙转移。这个人还真救活了。当我们撤到宿宁县的时候，傍晚，白求恩检查伤员的时候，那个连长主动给白求恩打招呼，白求恩赶紧给他检查了一下伤口，发现没什么大碍。部队决定吃完饭后赶快转移。白求恩说不能吃饭，我病房还没检查完呢？本来贺龙要亲自接见他的，以表彰他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抢救了很多伤员，是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但白求恩坚持看完伤员后才回去吃饭。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煮几个鸡蛋或者煮几只买来的小鸡就算是最好的营养了。谁知白求恩却让他的勤务员把这些食物拿去给伤员吃。勤务员面有难色地说："那怎么行呢？这是首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白求恩说："快去，这是我让拿去的，快去吧！"……从一点一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打心底里佩服白求恩，为了抢救伤员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自己宁愿挨饿也要把最好的食物送给伤员吃。这些事迹都是真的，他可是一心一意为了伤员。

正是被白求恩这种精神所感动，辛育龄萌发了学医救人、学医救国的念头。此后，他一心扑在医学上，不但学白求恩的精神，也学白求恩的医术。尽管后来白求恩离开了冀中，他一直记挂着白求恩，时时刻刻以白求恩的精神作为自己工作的楷模。

此后，辛老再也没有见过白求恩，但是却听到了他的噩耗：

大概到39年11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说白求恩同志病危。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白

叶剑英陪同尼克松访华团成员黑格参观针麻肺切除手术

辛育龄八十寿辰全家福

求恩要准备回国，回国的目的是募款和采购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因他到中国来时带的东西（药械）已用光了。临走之前我军在青红江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战斗，白求恩要求打完这一仗再回国。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的手被伤员的骨头茬划伤并感染了，当时他并未当回事儿就投入到新的抢救中。那时有两种细菌特厉害，一种叫破伤风，另一种叫七星坏疽，这种细菌一旦感染，它沿着淋巴管、血管走到肌肉，走到哪儿就坏到哪儿。刚开始时白求恩没有在意，到第二天他感到手痛，第三天胳膊就红肿了，感染得挺厉害。那个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即使有，对这种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当他感到胸闷气喘的时候已经晚了。有人建议他赶快把这只胳膊截掉，防止病菌传播扩散。他说已经来不及了，病菌已顺着淋巴管扩散了。他已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加重，在最后的日子里白求恩曾说："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11月12日，他光荣牺牲了。他牺牲三天后，我们才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赶去悼念。在追悼会现场，很多老百姓特别悲伤，哭成一团。我们心里也很悲痛。白求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呢？除了战场救助伤员外，如果不打仗时，他也给驻地的群众看病，大家有时亲切地称他"白爷爷"。被救活的那个连长（时任团长），也赶到了，他趴在白求恩的遗体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你不能死啊，我们需要你"……群众对白求恩，白求恩对战士的这种情结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一幕一直深藏在辛老的内心深处，同时也使他树立起自己生活工作的坐标：以白求恩的精神要求自己，并将这种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

胸外科的创建人

在从冀中白求恩医疗队回到卫生部后，辛育龄根据卫生部决定，筹备建立了冀中制药厂，19岁的他担任了厂长。这个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建的药厂，使军队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缓解。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干中学、学中干，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医懂药的医生。

1942年，根据中央的部署，一大批知识分子调往延安学习，他被派往延安。在延安，通过培训他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这一段时光是辛老生命中最重要的痕迹。对于一个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医生，获得一个难得的专业学习机会，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他抓住这一次机会，认真学习，心无旁骛。学习结束后，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专业训练，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了。

1945年日本投降，辛育龄到了东北。他像白求恩一样组织医疗队，并把白求恩的精神作为医疗队工作准则，穿梭于各个战场，哪里有战火，哪里就出现医疗队的身影。1948年东北解放后，他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医院，并担任院长，为东北医疗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辛育龄被派到苏联学习胸腔外科。1956年从苏联回国后，他放弃了部队优越的条件，放弃了上校军衔，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中央

结核病研究所，成为一名普通的医生。那时，我国的胸外科技术相当薄弱，甚至难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大肆泛滥的肺结核则成为当时致命的“杀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吃住都在实验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他的倡议下，我国医学上的一门新的学科——胸外科创立起来了。经过多次摸索实践，辛老首创了支气管黏膜外缝合技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杜绝了手术后残端致命性并发症，大大降低了支气管瘘的发生率，保证了手术安全并提高了手术后的疗效，因而获得了“国家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通过对动物肺移植的研究和实践，获得了肺移植手术技术和肺移植后抗排斥的宝贵经验，成功实施了两例人体肺移植，填补了我国肺移植科研领域的空白，荣获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为了消灭肺结核病，辛老积极推广肺切除手术，并发明创造了针刺麻醉法，配合肺切除手术。在当时，这样的手术方法不仅在国内是个创新，在世界也达到了先进的水平。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尼克松访华时，叶剑英陪同访华团成员一同观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他们大为赞叹。

辛老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医德的教育。在他的带动下，胸外科培训、科研为一体的卫生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胸外科人才。他以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感染着其他医生，以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神话，

在辛老继续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探索奋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文革”的“激情”燃烧到病房的时候，辛老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批斗对象。他被责令放下“屠刀”，接受改造。为了证明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的‘白专’典型”，造反派统计出他从医以来所作的手术有七千多例，作为“罪行”进行批判。

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辛老不管受到怎样的批斗，他仍然以医生的职业道德来要求自己，以白求恩的精神鼓励自己。当然，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人民群众，都离不开医生。有时候，尽管他在批斗台上接受所谓的批判，但一旦有了病人，他就坚决要求进医院进行抢救。甚至批斗他的造反派，有的也成为他的病人，他一样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抢救。

熬过了犹如漫漫冬夜的十年文革后，辛老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根据组织的安排，他领受了筹备创建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

受命筹建中日友好医院

在中国筹建一所医院，一直是日本一些友好人士的心愿。中日两国本是友好的邻邦，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使两国成为敌对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成功地实施了改造的政策，使日本战犯受到很深刻的教育。这些战犯回国后，有感于自己所犯的罪恶，成立了中日友善协会，或出于赎罪感或者其他原因，他们发出要为中国作点好事的倡议，提出帮助我们建设医院的意向。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对此积极推动，首相大平正芳为促成医院的建立，牵线搭桥。继任首相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继续推动，并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签署了援建医院的合作项目。项目由日本政府投资，总投资额为165亿日元，（约合2亿8千万元人民币）后日方又补充了

本文作者与辛育龄

1000多万元。除日本政府出资外，我国还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包括征地、宿舍等项目建设。我国总投资大概为500万元人民币。根据组织的安排，筹建这所医院的任务便落在了辛老的肩上。

接受任务后，辛老把全部精力放在医院的筹备工作上。他多次与日方磋商，就医院的整体布局作出选择。同时，为了保持医疗卫生技术的先进性，他积极招兵买马。辛老给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写报告，从全国各地调入一大批学科带头人，由卫生部直接领导这所现代化综合医院。

谈到筹建这所医院的过程，辛老如数家珍：

当时，我们刚刚改革开放，说实在的，对于现代化医院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对所要筹建医院的技术水平、资金、设施等都不甚了解。我向中央提出，到日本进行考察。日本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五所医院，我看了三所现代化医院，心中就有底了。第一感觉是日方提供的资金不够，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医疗器械代替的。我当时有个担心，怕他们输送来的设备过时或过于陈旧。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当时日本医院的CT设备全是美国的，而他们给我们的是他们本国生产的，我就问他们医院的院长，他们说本国的设备不行，老是出故障。于是，在同日方谈判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次谈判，我向他们提出应提供200亿日元的投资，并就设备等问题提出了方案，结果没谈拢，他们说我苛刻。回国后，我向谷牧同志和万里同志汇报了情况，谷牧约见日本驻华大使磋商。同时，我向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汇报，钱部长提出，假如日方坚持不追加投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不要计划中的康复中心，我认为不可以，并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钱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其后，同日方先后谈判了七次。在谈判过程中，我曾向日方代表团团长提出：你们对我们国家是有血债的，犯有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我的哥哥就是被你们日本侵略军杀害了。我认为，你们为了这么几个钱，首先表明你们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当时的日方代表团团长说，真没想到还给你的家庭带来过伤害，现向你致歉。经过几轮的谈判，日方以研究所和人员培训的名义又给了一些费用。我国考虑到中日关系，最终达成了建院协议。

医院建立起来后，辛老即向组织提出，只干一年，在医院走上正轨后即退下来。辛老调来了中央保健局局长边志强等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组建了第一届医院领导班子，形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相互协作的集体。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辛老虽然要面对医院许多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业务和研究。让他割舍不掉的是他的手术刀，是他的科学研究和那些期待通过手术治愈的病人。1985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主动要求退下来，回到了手术台前。此后，他老当益壮，专心投入到研究中去。经过多次探索、实践，辛老创造了一项重大发明：电化学治癌的方法（俗称电疗或烤电）。这一发明，为那些千百万个癌症晚期不宜做手术和不能使用放疗和化疗的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延长了病人的生命。该项发明在1990年被卫生部正式批准用于临床，至今也是治疗癌症患者的重要技术手段。

而今，八十余岁的辛老仍然以满腔的热情工作，继续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地奉献。采访最后，辛老用一首诗概括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抒发自己的情怀：

缘古行医成名难　　豪情满怀创新天
悬梁刺股攻读艰　　总结经验留后人
救死扶伤平生事　　不甘医术化青烟
人生价值是奉献　　改革大潮催奋进
古稀之年心未老　　健步跨入新千年

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国医疗事业的热忱。采访结束天色已晚，辛老还要准备明天的手术，他还要制定多项最佳手术方案，也许他又要工作一夜。在回来的路上，辛老的谈话回荡在我的耳边，他对病人的那份感情、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奉献让人感动。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学医的承诺：以白求恩为榜样，将白求恩的精神发扬光大。（责任编辑　赵友慈）

更　正

我刊今年第6期《我给陶铸当秘书》一文中说：“过去不到一年里，土匪杀我干部群众六千余人，而我们镇压土匪只有二万余人。”（第14页左栏倒数4—2行）文中的“二万余人”，应为二百余人。特此更正。

《炎黄春秋》编辑部

唐山大地震采访记

● 张广友

在我多年的记者生涯里，所采访的重大事件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1976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

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当机动记者。地震发生后，我是首批于当天到达唐山地震现场的记者之一。第二次地震（7.1级）发生时，我就在唐山市内。从那以后，直到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夕（9月8日）的50多天中，我一直是在地震现场，有机会目睹此次大地震的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的许多重要情况，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由于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不能如实反映情况。这场非常罕见的大灾难实情，基本没有公开报道。

一、“7·28”抹不掉的记忆

1976年7月28日早晨，我是5点钟从家里出来的，到总社时不到6点。当时地震已经发生两个多小时了，可是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连国家地震局也不知道。去那里采访的记者打电话来说，从丰润县一个人的电话中，才知道震中在唐山市。这时已是6点半了，立刻由新华社发出内部消息。当时新华社内部报道不是论小时，而是论分发出的，比如“×时××分”的消息随到，随编、随排、随发，流水作业，一刻不停。地震是3点42分发生的，我大约在7点钟出发。没有准备，除了一个装蜂蜜的玻璃杯，装了一杯水，什么也没带。总社派了一部“奔驰”车子，拉上我们三名记者出发了。出了京城往东走，越看灾情越严重。到天津，街上过不去了，只好绕着走。绕出了天津市区，驶上津唐公路后，路广人稀，以至见不到人。虽然汽车在飞速行驶，但仍不觉快，目不暇视眼前的一切，心中想的是唐山，急切想知道震后唐山的情况，大家相对无言……不知不觉来到芦台大桥，糟糕得很，桥断了，无法前进。当时，我想如果能发回一条哪怕几个字的消息，比如说“芦台大桥已断，不能通行”，那这条消息价值可大了，不知道可以多救多少人。因为唐山地震后70—80%的人被压在废墟底下，早抢救一分钟，就能多救出不少人，可是抢救队伍都不知道唐山芦台大桥断了。京津派去的抢救部队、抢救车，跟在我们的车子后面往唐山去抢救。芦台大桥离唐山还有100多华里，车子过不去，怎么办？要是走着去，天黑也到不了。退回去又不行，那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解到，那怎么行。我们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于是赶快调转车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告诉跟在我们后面来的抢救车：“前面大桥断了！不能通行！赶快绕道走！”我们估计从北线经宝坻、玉田、丰润去唐山，这条路线靠近山没有大河，可能还行，于是我们绕道北上。车过玉田，越往前走灾情越严重，不时看到抢救车拉着伤员疾驰而过。我们急于知道灾情，拦住迎面来的汽车问，可是多次招手，汽车都不停。好不容易拦住了一辆拉伤员的卡车，问他们“唐山怎么样”，他们回答很简单：“全完了，全完了！”再想多问，汽车已经开走了。

车过了丰润，情况越来越严重。丰润到唐山的马路很宽，马路那边群众像炸了营似的往外跑，平板车上推的，自行车推的都是人，有死的，有活的，死活难分。这半边马路就我们这一辆汽车往里跑。当我们车快到唐山市时，放眼看唐山，楼房、建筑物基本上都没了，只有凤凰山上有个小亭子和电站的圆形热水塔没倒，其他就是一片废墟。

我们到唐山市，一进市内，第二次大震（7.1级）发生了。当时我们的车子正在路上走，突然

地震后的废墟

围上来了。他们首先问:“北京怎么样?”“天津怎么样?”我们告诉他们北京、天津的情况。他们说只要北京、天津的问题不大,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在和群众交谈当中,有的群众找上来了,说:“同志,你们救救我们吧!我家有位伤员快死啦,你们用车子把他送出去吧!”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见死不救吧,情理难容,的确于心不忍。但是要救他吧,工作就没办法进行。后来我们讲:“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是中央派我们来了解灾情的,现在需要赶快向党中央报告灾情。如果我们去抢救,救了你一个人,救不了大家……”群众听到这些后就说:“赶快闪开,让他们走,快让他们去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群众如此通情达理,我们深受感动。

好一阵摇晃,汽车方向盘不听使唤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地震,赶快刹车!”所幸的是车子走得比较慢,没有掉到沟里去。车子停住了,我急忙把车门打开,当时摇晃得特别厉害,有些站不住了,于是我就抱着路旁的一棵树。这时,一些第一次地震已经震酥,还没有倒塌的建筑物,经过这次地震后基本全倒了,只见随着倒塌的建筑物升起一股股黑烟白烟。陡河电站180米高的大烟筒,第一次地震中错位了,但没倒,这次彻底倒塌了。有的汽车、拖拉机翻掉在路沟里。当时想,如果我手头有个照相机,这个镜头是很难得的,可惜我们这些文字记者,都没有照相机。

我们到唐山市后,余震不停。那种灾难情景是我想都想像不到的,更不要说看到过了。在不停的余震中,我们的车子缓慢地进入市内重灾区。我们边走边看,到处是凄凉的景象,所有建筑、房屋已经全部倒塌,几乎看不到一堵立着的墙壁。人们正在抢救被埋在建筑物下面的人。他们一个个满面灰尘,血迹斑斑,有的披头散发,好像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一些男人光着膀子,只穿着个裤衩,有的妇女穿的是男人上衣。在一些倒塌的房屋下,不时传来呼救声……街道两旁躺着很多人,死活难分。有的无声无息,有的在呻吟哭泣……当人们看见我们的车子时,都惊奇地瞩目相望,因为我们的车号前面两个数字是“01”,一看就知道是北京来的车子。于是好多人

进入唐山市后,到处是死尸。有时甚至马路上车子都没法通行。我们的司机说:“老张,你下去给我拉一拉吧!死的我也不敢轧!”没办法,我就只好下车把死尸一个一个拉开,车子才过去……

唐山全市已是一片废墟,地委机关所在地找不到了,市委大院房屋倒塌不见一人。组织在哪里?领导又在哪里?我们逢人便问,到处打听。在一家倒塌了的工厂门前,碰到一位全副武装的站岗民兵。他告诉我们说,市委领导在市中心马路上停着的一辆红色大轿车里,那里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指挥中心。我们按照那位民兵指给我们的方向去寻找。

我们来到了唐山市最宽阔的一条马路——新华路。这条东西长四五公里的马路两旁,过去都是整齐的楼房,现在已经全部倒塌。以这条街为界,往南是路南区,是这次破坏最严重的震中地区。从这里向南望去,一片瓦砾,以致连块立着的墙壁也看不到。在这条马路的东头大街上,停

放着一辆目标明显的红色大轿车,这就是刚刚组成的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在这辆车上,我们见到了当时的领导:当天从石家庄赶来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力和被抢救出来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车上一共有四五个人。许家信上身穿着一件圆领衫,下身穿着短裤,头上和腿上缠着透着血迹的白色绷带。

我们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许家信像傻了似的,两眼发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地低声说:“你们看吧,情况就是这样!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死了,下边的各单位,有的还没联系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还不清楚。现在都在大力抢救压在下面的人……”他的嗓子嘶哑了,眼圈也红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地委13名常委死了7名:第一书记李悦农,代理第一书记牛勇,副书记何毅、强华,还有3名常委。剩下5名常委,有2名不在唐山(书记刘歧、副书记曹子栋),其余3名包括许家信在内(地委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都受了伤。许家信是被武装部的同志从倒塌的房屋里扒出来的。他出来之后,找到了其他2名还活着的地市委领导,立即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抗震救灾指挥部。

他们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抢救出倒塌的房屋下面压着的还没有死的群众(后来得知当时还有10万人左右)。时间就是生命,时间越长,这些人活着的希望就越小。现在余震不停,抢救工作的危险性很大,特别是那些残墙断壁,危险性更大。最关键的是工具,一般的锹镐之类工具不行,因为这些被压着的群众,大都是压在倒塌的房屋预制结构水泥板下面。一块水泥板都是两三千斤重,搬不动,拿不起。有的手指头抠得直流血,眼睁睁地看着人在那里压着,没有办法,最好是能够迅速派来一批吊车。其次是重伤员太多:一是抢救出之后立即包扎治疗问题;一是如何迅速转移问题。如果抢救出来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就会增加……

唐山是我国的重要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开滦矿的一些矿井在唐山市内。我们急于想知道开滦煤矿的情况。许家信说,地震时有1万名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地震后电停水断,万名工人情况如何,尚且不知。矿党委书记赵成彬一家4口人,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已经死了,只有他被抢救出来了。他身负重伤,拄着根棍子组织抢救井下万名遇难工人……

震中一日,所见所闻,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更重要的是电讯线路全部中断,写了稿子怎么发回去呢?正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指挥部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他说,北京军区来人了,据说那里已经架通了一部电话,指挥部就设在飞机场,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

天已经黑了。我们冒着闪电交加的雷雨,赶赴距市内10公里左右的唐山飞机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逃难的人流仍是络绎不绝。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能够乘飞机迅速逃出飞机场。这些逃难的人流中绝大部分衣着不全,满面灰尘,有的光着脚,有的只穿了个裤头,有的相互搀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不能站立,在地上爬行,有的倒在公路边的沟里,死活难分……恰在此时,又下了一阵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一些受伤者的伤口,流到地上,呈现了许多血色泾流,有的同死的尸体泡在一起,成了赤水沟……那情景实在悲惨,令人椎心泣血!

在机场的指挥台下我们找到了从北京赶来抢险救灾的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对我们很支持。他说,军用电话已经接通,你们可以先用一下,但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这是目前唐山通北京的唯一的一部电话,就靠它向军委汇报情况,联系调动部队抢险救灾。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江山和北京军区分社记者张景发,他们也都是在当天随河北省委和北京部队领导一起乘飞机到达唐山的。我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决定立即与总社联系,写内部报道。

北京部队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机场调度指挥台旁边的一个草地上。一个20多平方米的帐篷,里面有一部小型柴油发电机,供几只电灯用电。我们便席地而坐,借助昏暗微弱的灯光,扯下笔记本上的几页纸,垫在膝盖上开始写稿了。

要写的东西太多。那么,这第一篇稿子写什么?我想了想首先还是救人要紧。因此,除了写灾

情，写了抗震救灾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重点讲了希望飞快派吊车来，赶快解决伤员外运和安置、治疗问题……

夜里10点左右，我们同总社通上了电话。值班人员说，社领导们一直等待你们的消息。他们对你们出去后一直没有音讯很着急。接着社领导便接过电话，询问了灾情，并向我们表示慰问。我向他作了简短汇报后，便传回发自唐山地震现场的第一篇报道（也许是这篇内部报道起了一定的作用，很快北京就派了100多部吊车来唐山参加抢救工作）。

夜深了，雨止了。我们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心事浩茫，时而仰望满天星斗，时而闭目沉思。夜静更深，四周不时传来抽泣声、呻吟声。在机场内已经集聚了5000多名重伤员，等待外运。这声音实在使人揪心！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们虽然经过了整整一天奔波，疲惫已极，但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白天所见所闻的悲惨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这情景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见过的，也是连想也没想到过的。唐山这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数十万人民失去了生命，我仿佛是在做一场噩梦，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就这样，在唐山机场我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二、感人至深　终生难忘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处于危难的关头。人们说1976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不幸的一年。开年以来，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四人帮”横行，邓小平下台，毛主席病重，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经济方面，长期极左的路线干扰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尽管如此，唐山大地震仍然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全国上下的普遍关怀。据说，当时毛主席处于重病之中，但他对唐山地震十分关心。6月份他的心脏病发作以后，医生不允许他动，要他静卧。医护人员和中央领导有关人员分班轮流守护。据当时在场的身边人员说，7月28日凌晨两三点钟时毛主席还没入睡。地震发生时，他安详地躺在床上。汪东兴进来说，是地震。他马上要去了解情况，回来再向主席汇报，并让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毛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到了下午，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说，地震震中在唐山，京津受到严重波及，唐山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正在派人进一步调查，请主席不要过于牵挂，听医生的话。毛主席点点头，然后对华国锋说，我现在正在病中，这些仍由你去处理。过了3天中央把唐山的情况初步搞清了，写了个报告，送到主席那里，中央决定要派华国锋去灾区慰问，同时要把灾民安置好，搞好抗震救灾工作。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时，尽管他病得连说话都很困难，仍然在病床上坚持把这个报告看完了。当他看到人员伤亡、房屋损失的估计情况时，难过极了。他语气深沉地对华国锋说，要尽快去唐山，代表他慰问灾区人民，并一再叮嘱，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生活……据说，这是毛主席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第二天，以华国锋为团长，陈永贵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一行30多人，带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慰问电，飞往唐山。我是29日接到总社通知，要我立即赶回总社，随中央慰问团采访。于是我立即回京随即同中央慰问团乘飞机飞回了唐山。

“灾区就是战场，震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当时参加抢险救灾的北京军区领导肖选进、万海峰，以“前指”的名义向参加抢险救灾的全体部队官兵提出的战斗口号。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各路支援唐山抗震救灾人马纷纷涌向唐山。首先赶到地震现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沈阳部队。在交通断绝的严重困难情况下，十万部队官兵，紧急集合，昼夜兼程，跑步前进，从四面八方奔向唐山地震现场，到达后立即抢救。我亲眼目睹他们在不停的余震中，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压埋在倒塌房屋下的群众，情节十分感人！开始那几天主要是救那些幸存者。据不完全统计，到8月13日，仅北京部队就从废墟中救出群众12245人。

进入8月中旬，主要是扒找尸体。当时气温高达37—38摄氏度，天气十分炎热，尸体已经腐烂了。要把腐烂的尸体一个一个地扒出来，再装在袋子里，然后再送到车上，那可真是不容易啊！当时有的尸体腐烂得一拉就流出腐烂的内脏和脓血，那种说不出的腥臭味实在难忍，有时戴着

加层的口罩和防毒面具都受不了。唐山那么多死尸，大部分是指战员们扒出来并掩埋的。我采访过一位小战士，他是军区某领导的儿子，刚参军几个月，只有19岁，是38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我听这个小战士讲很受感动。他说：“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死尸的，有时一听到死人就害怕。我刚到这里一看见死难的阿姨披头散发，呲牙咧嘴，缺胳膊少腿的，吓得连看都不敢看，更不敢去摸。后来部队领导说，这都是阶级兄弟，死人要当活人去抢救！开始闭着眼睛扛，后来慢慢地胆大了，一天扛几十个尸体。”刚开始那几天扒出的尸体还好扛，可是过两三天臭味越来越大，越来越难闻，七八天以后腐烂的尸体流着绿水，指战员们冒着酷暑炎热，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下，不怕脏、不怕苦、不怕险，是那么勇敢坚强！

唐山地震时很多压在倒塌房屋下活着的人是部队抢救出来的，一些被抢救出来的孤儿，也是部队收养着。唐山地震中儿童幸存率比大人高些，据说可能是因“目标”比较小，所以孤儿比较多。唐山抗震中有一件五姐弟劳军的事非常感人。地震发生时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被砸死了，就剩下五个小孩。其中四个女孩最大的17岁，最小的4岁是个男孩。部队抢救出来后，他们和部队一起生活，吃穿住都由部队安排。他们想爹妈，最小的还不懂事，成天喊着要妈妈，哭得没法，战士们想办法哄他们。孩子们对战士非常感激。地震时他们家还有一只老母鸡没压死。孩子们看到解放军对他们那么好，很感动。当他们看到解放军很累，吃的又不好，一个个身体渐渐瘦了。于是就偷偷把鸡杀了，给战士们送去。战士们说啥也不肯吃，给他们送回来了。怎么办呢？于是孩子们想了个办法，把鸡做熟了，熬了鸡汤给送去了。哪里能吃，又送回来叫孩子们吃。孩子们不肯吃，又给战士们送去。就这样，送来送去，谁也不肯吃。那天晚上开晚会，那几个大的女孩端着碗给解放军唱了《沂蒙颂》中的一段“我为亲人熬鸡汤”，边唱边流泪，情节十分感人，唱得周围的战士、群众都哭了。他们说，解放军就是他们的亲人。

有一次，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去采访第一批孤儿离开唐山去石家庄。那一批有400名孤儿，大部分五六岁，大概最小的三四岁，战士们一个个抱着送他们。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看到有个战士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那个女孩搂着战士脖子问：“解放军叔叔，咱们到哪儿去呀？”那位解放军战士说：“我带你找小朋友玩去，还坐火车，石家庄那里有好多小朋友……”小女孩问：“上火车你去不？你不去，我也不去。”说着就哭起来了。战士也流泪了。战士们和孩子们的关系是多么好啊！四五岁的小孩子可能似懂非懂，说明她不愿意离开战士，也说明我们的战士是如何对待孩子们的。诸如此类感人的事迹。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在唐山大劫难中，人民解放军是许许多多劫难余生者的救命恩人，又一次显示出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本色，他们的威望大大提高。

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在极端困苦的艰难时刻，唐山人民（包括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唐山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震后唐山，全市106万人口中，伤亡高达40多万。伤亡如此严重，人们想象中一定会是一片

地震后与瘟疫抗争的日子

哭喊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唐山是一片寂静。当时流传一句话“无泪的唐山”。当灾难和悲剧突然降临时，唐山人民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以顽强的生命力奋起与之抗争。地震发生时，绝大部分人被埋在倒塌的房屋下面，据统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在部队到达之前，靠自救和互救脱险的。可以说幸存下的80万唐山人民，在这场大灾中，每个人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险境，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间奇迹。对此，我们作了大量内部和公开报道。其中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有，万名井下工人脱险记；陈树海等5名工人井下15个日日夜夜（地震时他们正在离地面900米深处的一条巷道的掌子面上工作。地震后断了电，巷道出处几处塌方堵塞。他们硬是一步步地扒开，在毫无食物的情况下，靠地下水维持生命，坚持了15天之久）；还有工人王树斌在废墟中坚持与死神搏斗8天，卢桂兰搏斗13天等等。部队发现抢救卢桂兰时，我曾到过现场。这位妇女当时年龄46岁，是在陪她丈夫住院被压在一处医院的楼底下，不能活动。这期间她没吃任何东西，也没喝水，渴急了用裤头接上自己的尿喝，部队从楼板底下救她出来之前，她赤着身子，她要给她送件衣服先穿上……这一切，既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是世所罕闻的惊人奇迹！

唐山地震是国内外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件大事，可是当时“四人帮”控制着新华社领导权，对地震报道作了种种限制。开始时规定，有关地震只准发十几篇公开报道，尽管地震发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抗震救灾发稿量还是压倒一切，公开报道不是什么十几条，而是300多条。这样内参报道量更大，总共发了1000多篇稿子，这些虽然没有同广大读者见面，但却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我们记者在现场采访中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今天，我的这些回忆文章就是根据当年唐山大地震采访中的记录和采访中收集的材料，以及记忆中的材料写成的。这些第一手材料是真实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许多事实，它凝聚着唐山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凝聚着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奉献精神。这对当代青年人以及子孙后代了解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是十分珍贵和有益的。

三、世所罕见的记者生活

唐山地震中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地震后的头两天，我们整整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没有睡过觉。第一天，我们出发时只带来了一瓶水。7月底天气闷热，大家都十分口渴，可是谁也舍不得喝，互相推让。到了唐山市，供水供电系统全部被破坏，市区内找不到一口水井，老百姓渴急了，什么水都喝，以致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第二天整整一天，依然没有水喝。两天一夜基本上是没吃没喝，饥渴难忍，特别是渴的滋味那真是难以言喻。洗脸、洗脚就更谈不上了。后来北京派来水车送水，空运来的大饼、饼干，分给我们一些。开始时我们还不大好意思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理解我们的心意，风趣地劝说：“在这里的人都是‘灾民’，享受同等待遇。”“不吃不喝就没法工作了……”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们也只好同灾民一起，享受灾民待遇。大概是第三天，部队开始成立伙食团，我们挤进去先吃再说。部队对我们十分照顾，还借给我们一顶小帐篷。从此，我们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处。但是，没铺，没盖，只有一张塑料布铺在地上，晚上蚊子咬得满身是包。那几天雨水多，大概8月4日那天夜里，一场暴雨，我们的帐篷全是没脚深的水。不要说睡觉，就连块坐的地方也找不到，只好蹲蹲站站，一直到天亮。吃过早饭又出去采访了。过了几天，部队运来几块床板，我们总算有床睡觉了。刚开始睡上床板时，甭提多么高兴了，有的同志说，比在宾馆睡“席梦思”还舒服。

有住处、有吃、有喝，基本生活有保障了，但条件还是十分艰苦。就拿吃饭来说吧，一是吃不上蔬菜，二是卫生条件太差。馒头里有时还掰出个大蛆来。厨房里剩下的馒头用白布盖着，上面落满了苍蝇，白布成了“花布”，甚至“黑布”。没有办法，一天三餐顿顿离不开大蒜。大蒜是好东西，可吃多了眼睛受不了。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拉肚子的，厕所都是临时的，不能消毒，更谈不到水冲，所以到处是粪便。由于长期蔬菜吃的很少，不少同志得了夜盲症。

最使人难忍受的还是死尸发出的臭味。那股

味说不出来有多么难闻。百万人口的唐山市，死了近2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重点是在人口密集的路南区。此外，还有无计其数的大牲畜和鸡、鸭家禽等。我们住在飞机场，从机场到市里有十几里路，两旁接连不断，都是新坟。一个坟堆里都是埋几个人，有的是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由于死人多，又没有工具，埋得都很浅。许多死牛马根本没有埋，还有不少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尸体一时扒不出来。更为严重的是，唐山市内的冷冻厂，装着上万吨猪肉，地震断了电，猪肉全部腐烂了。8月上旬，天气炎热，这许许多多的尸体、臭肉一齐散发的腥臭难闻气味，充斥着唐山市区的每个角落，使人无处躲避。严重的地方即使戴上十层纱布的口罩也挡不住，憋得喘不上气来。

地震后从开滦赵各庄煤矿救出的五个男子汉（前排）

为了防止瘟疫和传染病，8月间，国家多次派飞机来唐山市上空喷撒大量敌敌畏、六六粉等杀菌药剂，地面上也配合熏撒。药味难闻，刺人胸肺，难以忍受！有时药味呛得我们实在忍受不住了，几个人戴着厚厚的口罩跑到小汽车里躲避（其实那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憋得满头大汗，从车子里爬出来）。有的同志说："地震没砸死，药味也快熏死了。"

地震地区的采访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头几天大批抢救队伍开进了唐山市，各种车辆拥挤得无法通行，没有人维持交通，秩序混乱不堪。有时车子堵住了，我就下去指挥，当起交通民警。7月29日上午，当我们来到唐山矿门前时，同前来抢救的各种车辆挤在一起了。一辆牛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地硬往前挤，车尾一下子把我们乘坐的"奔驰"划了好长一道子，车灯也被搞碎了。我们的汽车司机小李急了，说这是交通事故，要去找车夫讲理。我看着车上拉着三个人，死活分不清，赶忙制止司机说："你没看到他车上拉着三个人是死是活都不清楚，他的眼珠都红了，这时候还去讲理？"后来从京津派去了100多交通警察，交通拥挤的情况才算解决了。

唐山地震后，我们记者从四面八方自觉自愿地主动赶到唐山，有的同志半路采访，听到唐山地区地震后立即奔向唐山。地震发生后的三周内，从总社和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军区等分社来的记者就有20多人；后来陆续增加，最多时达48人。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这些记者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没生过病的。我得过痢疾、肝炎，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没有一个叫苦的，大家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什么荣誉、报酬，的确连想都没有想过。

唐山大地震灾情之重，死伤人数之多，在世界震灾史上是空前的，但当时中央决定既不要外国支援，也不准许外国记者前去采访。当全国、全世界人们读到新华社发自唐山的消息的时候，有谁知道我们这些记者是在什么样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心情采访写作的。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我们冒着如此巨大艰险，克服如此严峻的艰苦困难？大家回答的很简单：是人民记者应尽的职责！

（本文图片选自钱钢著《唐山大地震》，由一介书屋提供）

（责任编辑　萧　徐）

我在唐山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 张靓文

唐山大地震，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二十多万，受伤几十万，是有记录以来世界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难。我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1976年7月，正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季节。我们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的一支设计队伍，就驻扎在原唐山铁道学院的大院内。年初传说，京津唐地区要发生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大家思想上都比较紧张。可是一个冬春过去了，还是平安无事。渐渐地，人们好像忘了这件事。不料，就在7月28日凌晨2点40分，天崩地裂的大地震突然爆发了。顷刻之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在唐山大地。此时此刻，人们都在睡梦之中。

事后回忆起来，那天的天气特别闷热，蚊子也特多，傍晚四周的青蛙叫得撼天动地。这些反常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和大家一样照常工作和生活。直到凌晨楼房发生剧烈的震动，我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当时只听得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滚滚而来，紧接着一道道刺眼的白光穿过窗户，射进房间。起初，我还以为是电闪雷鸣，是不是暴风雨要来了。但是，又觉得不像，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扔原子弹了？还没有等我明白过来，身下的床板就猛烈地颠簸起来，一下子把我抛得老高。我立马坐起身来，求生的本能使我迅速做出决定：下地，冲出房间，逃生。可那时已经身不由己了，想抬腿抬不了，想下地下不了，心想事不成，全身都不听指挥。无奈之下，只好听天由命，蚊帐掉下来裹在身上，我也无可奈何。此时我才明白，是地震。

开始时，是上下震动；后来变成左右晃动。我们女同志住的是一座两层楼房，我住楼上。随着强劲的晃动，房上的预制板一块一块窜出横梁，落到地上。与此同时，两侧的立墙向一边倾倒，靠近我身边的一堵高墙倒在我身上，另一边的高墙向隔壁房间倒去。与我同屋的一位同事夺路而逃，幸免于难。这时，整座楼房轰然倒塌。我只觉得四面八方的东西一起向我压过来，身子直往下沉。我来不及思考，也不觉得害怕，头脑一片空白。在不停的抖动中，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整个儿被埋在瓦砾之中，动弹不得。

原先裹在身上令我很无奈的蚊帐，此时倒成了我的保护伞，既缓解了外来的冲击，又为我阻挡了尘埃。尤其幸运的是，一块砖头正好架在我的鼻梁上，我还能正常呼吸。此时，头脑倒清醒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房屋是否都倒了，同志们是否遇难了？我还能坚持多久，能不能活着出去？要是出不去了，岂不就此就要和我的丈夫、孩子永别了？我丈夫不善家务，他们以后怎么办？此时此刻，我心中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一连串的担心与问号……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隐约听到外面有动静，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只听两位男同志在互相庆幸。一个说："好险哪！我头顶上的那块大石头正好掉在我的枕头旁，差几公分我就没命了。"另一个说："幸亏我住在机电馆，房屋是框架结构，墙倒了，房架没塌，人都出来了。"听到他们谈话，我立刻感到有救了。我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听见我的呼救声呢，还是只想保全自己好不容易拣来的性命？他们竟然不理不睬，由近而远地离去了。

由于被埋的时间太长,我的四肢已经麻木,呼吸越来越急促,大汗淋漓,困顿不堪,直想睡觉。但是,我想起老人们说过,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睡着,一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为了争取最后一点希望,我咬牙坚持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又听到声音,并且由远而近向我这边奔来,一边跑,一边喊:“底下有人没有?底下有人没有?”声音很熟,这是房建科的陈工。我竭尽全力呼喊,有人!有人!上面问,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张靓文!听到我的回音,他们立即动手扒砖头土块,不一会儿我的头露了出来。同事们说,这下没危险了。留下两人继续挖,其他人去别处救人。

等到把我的上身挖出来以后,他们想把我从土里拔出来。可是费了好大力气也拔不出来,原来我右腿上压着一块很大的预制板。要把预制板搬开,没有起重设备是不行的。于是只好另想别法,先把我身下的砖瓦土块掏空,然后把我的身体向下沉,再横移,终于把我从土堆中挖了出来。我环顾周围,我们的宿舍已成一片瓦砾,旁边的西讲堂也已倒塌,一个很大的人字型屋顶直落地面。我们这批伤员就被安置在楼前这块空地上。挖出来的还活着的人放在东边,断了气的放在西边。可是有些刚才还有气的伤员,一会儿也断气了,只得再把他们挪到西边去。那时,活人和死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因此也没有人觉得害怕。人们已经麻木了,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是28日早晨6点过后获救的。由于我被埋在里面四个多小时,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只能在地上躺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重伤员。我为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感到十分幸运,因此躺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非常担心我的队友们,不知他们的处境如何?当时,但凡有点能力的人,包括一些轻伤在身的队员,都全力以赴投入抢救。直到午后,队里的同事才陆陆续续过来看望我们,可是谁也没有认出我来。原来我的脸上又肿又紫,满面淤血,眼睛成了一条细缝。我们的石总工程师带伤前来看望我们,就是找不着我,只好大声呼喊:张靓文在哪里?张靓文在哪里?

震后的灾区一片狼藉。整个地区断水、断电、断路、断绝一切交通和通讯。我躺在地上仰望天空,气候时好时坏,一会儿烈日暴晒,一会儿大雨如注。渴了,能动弹的人连滚带爬到附近泥塘中淘点泥浆水喝;饿了,那些腿脚利索的同志,到处去找食物,拿回来供大家充饥。那时不分单位、不分你我、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犹如到了想像中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然而,听说开滦煤矿已把唐院地下的煤层都掏空了,一旦唐院在余震中下沉,我们这批难友岂不又要遭难?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我是完全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全要仰仗别人的帮助,心中更加不安。

后来队领导决定,把我们这批无力自救的伤员,转移到院外的铁路线旁。据说,勘察选线时规定,铁路两旁的煤层是不准开发的。这下总算让我们安下心来,等待东北的部队和北京局的救援队伍前来救援。队上又找来一些篷布和木棍,给我们支起简易的帐篷,感觉又好了一点。与此同时,不断传来噩耗,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遇难了。特别不幸的是,我们队里有个李工程师,他的老家在东北营口,那里一直预报有地震,他总是提心吊胆。为了预防不测,他让全家老小一

地震后的废墟:唐山矿务局医院

起来唐山小住。谁知没有过几天,就发生了地震,除了李工本人获救而外,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全部遇难;马工程师正在医院手术台上抢救,赶上一次强烈的余震,耽误了手术时间,就此告别了人间;一些重伤的队友,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匆匆离我们而去。另有一些队友,地震中被震落到楼房的地下室,上面压着硕大的人字型屋顶,只听到他们一阵阵呼救声从下面传来。可是,没有起重设备无法相救。我们只能盼望部队快点过来。可是,在一次强烈的余震之后,再没有他们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在期盼着。但是,听到的都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某处公路断裂,需要绕道而行,救援部队一时还进不来。我院的救援队伍早就出来了,由于各路救援队伍都向这个方向开来,车队堵了几十公里长,现在进退两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这里。

我脚上的伤口开始感染,食物也很紧张。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还不错。有人去附近的菜地里摘些瓜果来,分给大家吃,我们躺在地上的伤员都舍不得吃,认为自己躺在地上,没有太多消耗,这些食品应该省给那些忙于救灾的同志们吃。这样,一个西红柿、一条黄瓜经过许多人的手,传来传去,最后还是送回到原来的箩筐里。这个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使我感动不已。

29日开始见到直升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又见到直升机在附近抛东西。原来是一袋袋烙好的大饼往下撒,顿时大家一拥而上。哪知几十米高空撒投下来的烙饼砸在地上,就成了面一半、沙一半的混合物,很难吃进口了。幸好我们食堂还有一点残羹剩饭,让我们勉强又支撑了一天。

比较起来,生计问题还不算最严重。最大的威胁是余震。我们发现近在咫尺的一处险情:我们帐篷前面立有一个铁路大灯塔,如果遇有强烈余震,很可能砸到我们帐篷上。死过一次的人,神经格外敏感。大家都十分担心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向领导提出转移的要求,因为当时面临的救灾任务实在太重,不能再给领导添麻烦了。于是,我们每人都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便随时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白天大家尽量爬到外面去休息,晚上轮流值班,时刻注意余震的动情。有一次发生强烈余震,我竟一下子就从帐篷里窜到帐篷外。到了外面,定下神来,我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窜出来的?平常情况下,这个过程起码要花三、五分钟。这大概就是求生的本能了。等到余震平息下来,再想回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此时我想起一句话来:"人急生智,狗急跳墙"。其实,反过来说,"狗急生智,人急跳墙",也完全可以。人在极端情况下,身体里的潜能是很大的,这与动物一样。其实,人不就是从动物变来的吗?

部队是30号上午才开到我们这里(因为部队进入唐山后,先去抢救当地的重点单位,我们属于外驻单位)。解放军到来以后,查看了待救的地方,同样束手无策,没有现代化装备,谁也对付不了那些巨大的水泥墩子和大屋顶。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伸出援助之手,但统统被拒绝了。那时正值"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疯狂时期,"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多死几个人算什么?就这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被埋在地下的同志,悲惨地离开人世。死那么多人,当然是天灾,但何尝不是人祸?

铁道部的救援队伍31日到达我们驻地。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倍感亲切。他们先把我们这批伤员安置到车上,然后其他队员也都上了车,浩浩荡荡,撤离唐山。唐山已经面目皆非,市区的房屋全部倒塌,不见楼房,不见马路,不见路标,只有一片汪洋,连开车的方向都很难辨别。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车站的水塔、市区的一块语录碑、沿路的电线杆,竟然还像模像样地屹立在那里,这恐怕只有研究地震力学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汽车一路缓慢行驶,有的马路断裂,有的地层错位。唐山火车站内的天桥扭成麻花,钢轨全部弯曲,静静地躺在地上。沿途摆满了一个个长长的塑料袋,里面都是遇难者的尸体。由于天气炎热,塑料袋内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气味四处弥漫,地面上苍蝇围着尸体和一些腐烂的东西飞来飞去。为使灾区避免发生瘟疫,直升机不断从天上喷洒杀菌的粉末。在地震中家园被毁灭,变得一无所有的灾民,低着头,背向路面,光着身子,默默地等待着救助。令人惊奇的是,面对这满目凄惨的环境,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流泪,没有人哭泣。语言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那么沉寂,那么安静。曾经教过我们的马老师,全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震后在铁路旁边搭了一个小帐篷,无声地守在里面,也许沉默是最好的解脱吧。

在我离开灾区之前，我托队上的同事，打听曾在唐山机车车辆厂工作的一批老同学，结果得知他们那里是地震的重灾区。工厂的宿舍在刘庄，正是靠近震中的地段，他们的惨状可想而知。吴济怀、施明娟两口和两个小孩无一幸免。姚振玉和萧老师遇难在当地的开滦煤矿医院，他们唯一的小孩在广州的姑姑家，从此成了孤儿。还有教我们高等数学的杨教授夫妇，也都遇难在唐院。我队最后清点，与我同住一楼的同事和家属共有76人，地震后救出16人，其中一人因受内伤，不久内脏大出血离开人世，最后存活15人，我是其中之一。

接运我们的卡车缓缓地离开这个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以后，我的感觉，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到了天津，才知道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我们这些伤员只能进驻天津北站的"宁园"公园。院机关临时调来很多帐篷，就地扎营，铁路医院的大夫为我们伤员清洗伤口、包扎、上药。家在天津的家属，十万火急的赶来认领自己的亲人。很多家属找不到亲人，就向我们打听情况。事前队领导早有交代，万一家属问起他们的亲人，我们一概都说不清楚，由院领导去解答他们的问题。以后我们这批伤员中，伤势不重的，也都陆续回到自己家里。我还不能行走，队上通知家属前来护理，要不就由单位派人护送回家。我丈夫从北京赶往天津，见我还能出气，只是受了点伤很感欣慰，当下就决定背我回家，与我同行的几位同事一起护送我上火车。当车上的旅客知道我是从唐山地震中救出来的灾民时，纷纷给我让座，表示慰问。一路上，我丈夫给人介绍说，我是"出土文物"，价值连城。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灾难中，我得以逢凶化吉，与死神擦肩而过，无疑是大难中的幸运者。可是我的许多同事，包括他们的老人和孩子，情况怎么样呢？回到北京以后，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令我寝食不安。

28年后，东南亚重现了一次类似的天灾——大海啸，死亡人数也近二十万，但是救灾的规模空前浩大，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救援行动。尽管这次灾害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唐山大地震，但是，及时的救援行动，肯定大大地减少了灾害的损失。自然灾害，现在还不是人类所能掌控的，我们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不要让抢险救灾留下不该有的遗憾，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伤痛。

（本文图片选自钱钢著《唐山大地震》，由一介书屋提供）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68页）降特务"的绰号。

在江西一年半时间里，我的劳动技巧得到很大提高。脱坯、盖房、当小工、插秧、喂猪、炊事员，干校的不同工种我都干过。在盖房过程中，我不仅在师傅们指导下学会了和不同用途与不同需要的泥，而且学会了根据房子的高低来设计脚手架、搭脚手架。那时的脚手架是用麻刀搓成绳子来捆扎的，横竖相交、错落有致，不但要实用，还要美观，是一门颇为荣耀的手艺。

约在1971年春，我们干校从江西搬到天津郊区的茶淀农场。这次搬迁的原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将原属卫生部的北医和属北京市的北京第二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医学院。在这个背景下，北医的江西干校撤销，人员北迁。茶淀农场原为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农场，是北京的一块废地，地权属宣武区。不知什么时候，农场的劳改犯人被迁出，北京市就将我们安置在这里。刚到时，当地人议论，这回不知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犯人？还有这么多的女犯。我们听了只好付之莞尔。在茶淀又劳动了半年多。由于北医和北二医的合并流产，整个五七干校被撤销，我们也就相当于干校毕业，返回了北京。

经过这样一番动荡，原来的学校和宿舍已经变了样，房子被别人占用，我们一家不得已同别人挤在一个单元里。好在家具大多已卖掉，不大的房间到还住得下。幸运的是，我和夫人都回到了教学和科研岗位，可以用我们的知识为国家服务了。

如今，这段"五七战士"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还多。国家的命运在这段历史中发生了当初未曾想过的巨大变化。我自己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记得托马斯·曼说过："一个人不仅仅过着他个人的生活，并且不管意识到与否，也是在过着他的时代和他同代人的生活。"这是一句精彩的话。人的生活不能脱离他的同时代。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我把自己"五七战士"的片段记下来，献给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 李学愚

大约在 1969 年 12 月初，我与我的同事们离开北京前往江西，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

“五七战士”一词，是特定时代的标志性语汇之一。我这个大学教师既没当过兵，也原本同“五七”不着边。如果说今天人们把医生尊称为“白衣天使”，那么作为医学院的教师，我可能更适合作“白衣战士”。“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尚“兵”。人们以兵为荣，争做毛泽东的“好战士”。因此，到五七干校去，人们愿意被叫做“五七战士”。脱去白大褂，当了战士，自然光荣。特别是，知识分子主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这样就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了，同“战士”近了。我在这里絮聒几句，把标题上的“五七战士”稍加解释，以免今天的读者误认这是一篇关于某部队招兵的故事。

从建国初期开始，我任教于北京医学院，是一名基础课教师。比起北大、清华和其他知名大学来，“文革”中的北医，算是相对温和的。但医学院也有比别的高校特殊的地方，这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再次提出医学院到底究竟如何办的问题，或者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早在“文革”前，毛泽东在评论中国教育体制、办学目的以及授课方式时就讲到过，古代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他举了不少古代贤人的例子，其中专门说，李时珍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写出了《本草纲目》。在 1964 年 2 月 13 日的春节座谈会上，他说，现在书念的那么多，书念的多害死人。知识分子应该下乡。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1965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同医务人员进行过一次谈话，尖锐指责了医药卫生部门和医学院的教学体制。这次谈话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六·二六指示”。在谈话里，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 15%的人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三年就够了。在谈话的结尾，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北医在实行斗、批之后，开始落实“改”。“改”的方向，就是落实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离开北京，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怎么走，到哪儿去，还是个问题。最终，北医的教师被分为两个方向，即甘肃和江西，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但两批的性质又有区别：去甘肃者，是为“走六·二六道路”，他们属于到那里“工作”和“扎根”的性质。去江西者，为“五七战士”，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如果从职业分工说，去甘肃的人主要是各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而去江西干校的，则多为教师。这样分别是有道理的。医学教授离临床太久，已无法当大夫，所以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而临床医生正好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

大约在 1969 年 11 月，北医附属第一医院（即通常所说的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和校本部的部分教师（主要以公共卫生系为主。公卫系的专业是防疫、流行病调查等，刚好可以在农村派上用场）共一千余人，携儿带女前往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他们大都分配到公社一级的基层，基本上从事了与医疗有关的事业。在那个时代也算各得其所。

“六·二六战士”走了以后，我们“五七战士”该整理行装了。不做当家妇，不知柴米贵。收拾行装确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我的夫人已经随卫生部五七干校去了江西。而两个孩子，一去陕西插队，一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凭我一个人，要把原本一个家收拾停当，工作量很大。要知道，当时是下决心做五七战士不再回北京的。

处理了家当，我们赴江西的五七战士共一千五百余人开始启程。这是一支颇为不整的队伍。因为大家做了不回北京的打算，因此往往带上一切可以携带的生活用品，比如坛坛罐罐。有的人甚至还带了煤球炉子。不到下乡年龄的孩子也随队出发，当然队中还有那些祖父母辈的老人。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桑蚕厂。北医五七干校的校址就选在那里。如今新建县已划入南昌市。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邓小平也在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

五七干校的建制通常是以连为单位，连下面再设排、班，连级干部是由工宣队充任的。他们负责整个学校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生产和生活。如果说，这些同志在主持政治运动上是严厉的话，那么在管理生产和生活上，他们的确是付出很多，尽职尽责。五七干校不是净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原单位在城里“文革”的延续。我记得，当时除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不断传来的中央的指示、社论精神外，揭发、清理“五·一六分子”是一项主要的政治活动。今天的历史研究表明，“五·一六分子”是一个颇为子虚的事情。除去“文革”初期北京几个高校的极少数学生串联成立“五·一六兵团”，以打倒周总理为口号，被定为反动组织并遭取缔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另外的隐藏的“五·一六分子”。究竟因为什么在大学五七干校掀起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但“文革”本身政治风云波诡云谲，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抓个什么“分子”倒也不奇怪。

我们初到干校所干的事，大部分是盖房。当时的工种分配是，中青年身体较好者搞基建；一少部分人赶水牛耕地；老弱养猪。建房首先是备料，即备砖和木材。木料要到附近山里现伐。当地有一座山叫南山，南山上多松树和杉木。那时完全没有环保意识，只要是合用的材料，几乎都被我们伐下。据说今天江西的绿化率是全国最高的几个省份之一。这要归功于江西人民近二三十年来的辛勤劳动。而三十多年前的我们，的确损害了新建的绿化。

砍来的木材经水路运到永修，我们再装汽车，直奔工地。这些木材最后被切割锯断，由木工做成柱、梁、檩和椽。这些工料都配齐之后，盖房就开始了。通过我们的劳动，连队宿舍算是解决了。那房子是依山而建，远处眺望，也是灰砖红瓦，一排排的刹是好看。这里值得记叙一笔的是，邻近卫生部干校由于家底比较殷实，常应我们的请求支援砖瓦和水泥。卡车开来，我们去迎接，刚好看到卫生部长钱信忠先生也在运木料的车上。“钱老爷”是作搬运工来的。他一身旧衣裤，短短的白发，干活十分卖力。因钱的爱人与我夫人是大学同班，我们对“钱老爷”似有特殊些的感情。大概在1967年或1968年，钱部长多次被揪到北医批斗，斗完拉到生理楼一间房子里反省，竟由一批北医的家属小孩看押。如今看到他同青壮年一起劳动，身体健康，不由想起“城市老爷”这个

“五七干校”学员在学习

赐名，像是黑色幽默。想来钱信忠先生当时已有50多岁了。

我们干校周围的农民，多着黑色中式布褂和长裤。即使在很毒的阳光下，他们也不挽起袖子和裤腿，还要穿长筒布袜，在裤腿上扎上绳，为的是防范蚂蟥。我们则没有这样的衣裤。在下水田前，只好在外露的小腿和前臂擦上清凉油或硫酸铜溶液。蚂蟥最怕硫酸铜，以此来防备蚂蟥非常有效。但问题是下水田时间一长，硫酸铜溶液就被洗掉了，蚂蟥即开始进攻。许多人过去没有遭到过蚂蟥的叮咬，一被咬住总是着急地想把它拽出来。但事与愿违，蚂蟥的吸盘吸附在皮肤上十分牢靠，一使劲就揪断了。按说，生物教研室的老师应该是昆虫专家，可他们对此也是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医学院的知识分子能有大田劳动的经验，确是“教学相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荣辱观。作为五七战士，我们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在外表上向贫下中农看齐。谁最像贫下中农，谁最光荣。

首先是穿着。我们从城里来，没有农民式样的衣裳。于是大家就尽量往“破”里穿。旧衣服最好，常常不离身。没有旧衣服，就把新衣服“做旧”。方法是多洗。洗时多放碱用力搓，颜色掉得比较快。然后是加补丁。新衣加补丁，色调有了反差，似乎也不难堪。补丁自然是越多越好，最高境界是“补丁落补丁”。于是我们几乎每人都穿着“百衲衣”。

其次是“扮相”。无论我们怎样“做假”，当地农民也是以一种异样眼光看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他们说我们是“金链手表、金丝眼镜、皮肉挺白，身高无力”。为此，我们把手表套在裤带上隐藏起来；大多头戴破草帽，尽量把帽檐拉低，盖住眼镜；鞋上的泥不擦，积得越多越好。最可回忆的是设法把皮肤晒黑。我们常常挑阳光充足的时候，脱去衣服，只留裤衩，在太阳底下“蒸晒”。办法是先晒正面一小时，然后再翻过来晒反面一小时。如此反复，最终把皮肤晒得通红。不妙的是在晚上，皮肤开始发痒，一两天后开始脱皮，也就是皮肤角质层脱落。用手轻轻一揭，皮肤就像半透明的纸，可以大片掉下来。应该说，我们这些学医的人，是明白这样晒的后果的。其实，这就是灼伤。江西的太阳很毒。这样暴晒多少是有危险的。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五七战士”，大家更忧虑的不是灼伤，而是能不能做到“脱胎换骨”。要改造，就不能不“豁”出去。在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最敏感的，就是怕贫下中农把自己看作城里的老爷太太。所以，时代决定荣辱观念，是不错的。

有件事同我们改造“外表”有关，在这里值得一记。当时，我们“五七战士”工作在江西乡下，但户口留在北京，工资照发。那时，我们算是“中高”收入者。在干校里钱无论如何花不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大礼拜（我们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称大礼拜），乘一站火车到南昌，采购吃穿用等物品，当然还要趁机“撮”一顿，大快朵颐。

董兄，我的老同事，也是一起“暴晒”的战友。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某一大礼拜天，大家委托他去南昌代购物品。他早上乘火车出发，可到天黑也不见踪影。直到第二天他才被工宣队的同志领回来。原来，他在南昌下车后，即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盯上了。原因是，他身穿破衣服头戴破草帽，却戴一副金边眼镜，蹬着一双新皮鞋。这个样子即使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看来，也确实稀奇古怪，不伦不类。由于到南昌的次数不多，他有点发蒙，不时东张西望，而且在商店花钱也非常“大方”。纠察队越发觉得这人可疑。吃饭时，他摘掉草帽，脸的下部黝黑，可上面被草帽压着的脑门却很白皙。于是工人纠察队认为，此人必定在烈日下受过军事训练。又见他购物时使用的钞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托他买东西时给他的都是十元的大额新票），把购得的物品分装在数个包里一一放好（董兄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就更加怀疑起来。当时人们反敌特的弦绷得特紧，联想自然丰富，最后判定他可能是一个“空降特务”。就在董兄采购完物品准备满意地返回新建时，工人纠察队的同志们果断下手，将他“擒获”。当场，工人纠察队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答以“五七战士”。战士就是兵，兵又非兵，岂不疑点重重。董兄于是被带到南昌市工人纠察队总部看管起来。最后，当然是一场误会，人们终于搞清他是新建县北医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于是由工宣队前往南昌将他领回。我记得他回来时，大家都排在房外，像是列队欢迎。董兄在我们的谈笑中从此得了个“空（下转65页）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 赖诗逸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张荣生在文章的开头，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确实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年浩劫’的提法有符合事实的一面。”接着，便在“但是”方面大做文章，根本否定了“十年浩劫”这个已沿用多年、大家很熟悉的观点，并拐弯抹角地说，使用“十年浩劫”的说法，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文化大革命’十年说得一团漆黑、尽情丑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张荣生没有具体加以说明，但他明确断言：这是“共产党执政期间发生的十年失误”。这个观点，他通过副标题也突出地显示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十年浩劫”还是“十年失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这场“政治大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如何认识这个后果的严重性。

研究“文革”的问题，最好是先从它的性质谈起。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它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这是一场“内乱”，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灾难”。所以，把“文革”概括为“十年浩劫”，可以说是一语破的。这怎么是“把‘文化大革命’十年说得一团漆黑、尽情丑化”呢？至于“十年失误”，那是属于评论工作问题的说法，也大大地淡化了“文革”的破坏性。难道张荣生提出“十年失误”的看法时，忘掉他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确实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吗？难道“巨大灾难”不是“浩劫”吗？

张荣生在引用《历史决议》关于“文革”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都没改变”的论断后，发出提问：“‘十年浩劫’一词所寓意的社会画面，怎么能同这种社会性质互相吻合呢？”对此，我的看法是：我国的社会性质之所以没有改变，主要因为，党粉碎了林彪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四人帮”策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所以，“文革”还是处于内乱的范围。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一点，是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加以正视的。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观点，就是这一段话的最好概括。难道由于当时的社会本质没有改变，就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称为“十年浩劫”吗？

张荣生说：“按照‘十年浩劫’四个字的字面含义，那就是：在整整十年里，动乱从头到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以致物质生产停滞不前，经济工作

不进反退，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事实并非如此。”在引述《历史决议》中有关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的一段论述之后，又发表议论说：“这些成绩与‘十年浩劫’一词的字面含义怎么能相称呢？”在这里，张荣生既曲解了“十年浩劫”的含义，又把“文革”与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的十年”混同起来了。

“十年浩劫”的含义，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律解释，但是，大家都知道，其中重要的是“浩劫”二字，“十年”二字只是如实地记录了“文革”期间的主导潮流。但是，所谓“在整整十年里，动乱从头到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恐怕只有张荣生一个人持这样的看法，按照他的说法来推理，所谓“十年失误”也应该是：“在整整十年里，失误从头到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是，我们知道，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经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经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这明明是正确的举措，难道它们也被纳入了“失误”的范围吗？由此可见，张荣生想通过曲解“十年浩劫”的含义来否定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研究“文革”的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的十年”，是有明显区别的。“十年浩劫”，是专门针对那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言。对于这十年所做的其他工作，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凡是确实取得了成绩的，都应该加以肯定。但是，用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来否定“十年浩劫”的提法，说它是“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则很难达到目的。

《历史决议》确实提到，“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并列举了其他一些工作的成绩。紧接着，《历史决议》又明确指出：“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这里，我只摘引几个经济数据来说明这一点。按每百元积累的国民收入计算，在搞“文革”的这十年间，“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6元，都少于“一五”时期的35元，而且是越来越少。在工业生产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3元。其结果，在“文革”十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5000亿元。从经济效益（这是考核经济工作的重要指标）来看，认为“经济工作不进反退”，恐怕不会过分。从总体情况来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了。不仅如此，“文革”还在政治上、文化上、教育上、组织上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各个领域的长时间的大破坏，归结起来就是“十年浩劫”。这难道与“‘十年浩劫’的字面含义”不相称吗？

在研究“文革”的问题时，还必须注意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几年后，党又作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决定。1984年6月31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第九号通知正式提出：“各整党单位一定要对广大党员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历史决议》中已经透露出这一意图，这个重要文件对那场所谓“政治大革命”写下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曾经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谈到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一观点是怎样提出来的。张荣生认为把“‘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由来已久”。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早在1980年年中，胡耀邦就使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说法。在当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遗留的问题，必须做好三项工作，第一是审判林彪、“四人帮”；第二是写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完成以上两项工作后，才有可能进行第三项即召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个时候，他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4个月。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总结历史教训时，曾经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个题为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已于当年8月3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时，再次提到“十年浩劫”。他指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样，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就发展成为令人痛心的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隆重的庄严的大会上讲的。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集会的场面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又重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

除了党的领导人之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1980年9月2日于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十年浩劫”。他在讲到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时说，这“对于治愈十年浩劫给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又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是十年浩劫中审判工作的一条重要教训。”

邓小平的讲话和胡耀邦的报告，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胡耀邦总结的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反应十分强烈。邓小平的讲话发表后，在全国还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学习活动。难道张荣生对上述文件都没有读过吗？

还应指出，张荣生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观点之余，又大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用意不说自明，但这种做法却令人莫名其妙。从上面所说情况可以看到，把“文革”概括为“十年浩劫”，是符合《历史决议》论述“文革”问题的基本精神的。因此，把这个观点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扯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同时，我们知道，大力倡导四项基本原则的是邓小平，一再使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提法的，也是邓小平。请问张荣生，难道邓小平的言论会自相矛盾吗？难道他认为邓小平“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吗？

张荣生在文章中又提出，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具体言行应该“科学扬弃”。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在这里，我只提出一点意见。张荣生在引述毛泽东的言论时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应该指出，毛泽东的原话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康生在主持修改“九大”的党章时，也采用了这个提法，但加进了“始终”两个字，变成：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胡乔木早在1979年初就加以澄清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时光已经流逝了20多年，张荣生却依然引用康生修改后的写法。在对毛泽东的言行进行“科学扬弃”时，怎么能出现这种不应发生的

问题呢？还有，张荣生不明确说明支配“文革”的错误理论是什么，这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决议》明明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张荣生在这篇研究“文革”的文章中，却一字不提这个理论，更不要谈“科学扬弃”了。避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能说清楚“文革”的问题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是从坚持《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结论来看，还是从响应党中央要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号召来看，都不应该用“‘文化大革命’十年失误”的说法来代替“‘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观点。为了牢记“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防止“文革”的灾难在任何范围重演，应该继续坚持“十年浩劫”的提法。

（责任编辑　萧　徐）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7.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高王凌	15.00	5.00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刘武生	38.00	6.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16.80	5.00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徐庆全	48.00	7.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6.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6.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6.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红色家书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35.80	7.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作者走访当时夹边沟、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有关历史档案，历时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对于一切关心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李宗仁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本书将“文革”时期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史实展现给读者，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红墙大事》　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 20 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

● 齐翔延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现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袁鹰同志这篇文章，把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这第一场大批判的真相揭开了。让人们能回头看清什么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手段、后果，使人懂得了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更让人们经过反思看清表面的和深层次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这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这是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把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变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牢牢记住它！

这里我想，有些事、有些话是否可以作点补充。

袁文中讲了夏衍当时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夏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并非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他曾亲口说过，最初是胡乔木提出要拍《武训传》的，而我不同意拍，并且说了"武训不足为训"的话。为了阻止拍这部片子，夏衍还提出，现在上海没有钱拍片。后来，中宣部审查剧本通过，并设法筹资，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而上海文化局始终未出钱资助。电影上演后，胡乔木又组织文章大加赞扬。因此，夏衍所说"不必由我来作检讨"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当批判运动的暴风雨袭来时，夏衍却被告知，这是毛主席亲自抓的，连周总理也表示自己有责任。你是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能不承担责任吗？并且说，这件事由中宣部出面公开检讨影响太大，而夏衍出面只是上海地方的问题。为了顾全大局，必须要夏衍来做检讨。这样，夏衍的检讨是非写不可了。当夏衍把检查写好寄给周扬后，立刻就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应该对此事负责任者不作检查，而没有责任的却不得不写检查，而且还要登报宣扬。这是什么道理？

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强迫被整的人作检讨，说违心的话。不许他们说明情况，不许辩解，更不给他们应有的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随意捏造事实，乱扣帽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给他们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硬要他们承认，否则就是态度不好，过不了关。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实事求是之意，硬是强迫人说假话。而且逼着群众信假话，也跟着说假话。这是非常坏的风气。批《武训传》时是这样，反右派运动是这样，反右倾批彭德怀是这样，文化部整风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文革后，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周扬发表异化文章还是这样。别人代他写的检查登报后，他就一病不起，最后带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过去凭空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说假话成风，人人说假话，对假话不以为然，说真话反倒成例外。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必须彻底打掉这种风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都要说真话，而不允许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为人之道。就职宣誓、入党入团宣誓，可以少些豪言壮语，但这一条必须列上。而且要让说假话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应有的惩罚。而逼别人说假话的，更应罪加一等。这样，才能让我们不再受假话之害。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序

● 沙叶新

读董健先生此书，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越来越不相信眼泪的年代，是一个越来越把眼泪视为软弱、视为煽情、视为作秀、视为虚伪的社会，我也曾被别人的眼泪甚至被自己的眼泪欺骗过；但我至今还是经常会为生活中足以感动我的人和事动容落泪。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颁奖节目，我又再一次泫然泪下，获奖人物有歌手丛飞、民工魏青刚、村医李春燕、邮递员王顺友等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感动了中国，但他们确实感动了我，让我泪流满面，哭得像孩子。

我也深知民间和网上对媒体颇多尖锐批评，批评媒体缺乏诚信，尤其批评媒体对重大事情或隐瞒不报，或混淆视听。我同意这些批评，也曾撰文不遗余力地揭露过媒体的欺骗。但我仍然相信在凄冷黑暗的铁屋里，总会有点亮火柴的女孩；面对无冕之皇的华丽新装，总会有说了真话的男孩。尽管火光微小，尽管人微言轻，但他们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希望和真实，而这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也曾写过一首诗，最后几句是："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我也坚信：总有一朵花是香的，总有一片情是真的，总有一滴血是热的，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和痴情，所以我对感动我的人物毫不掩饰我的泪水，任它夺眶而出。况且我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物，比如陈健，很多年前我就在黑龙江逊克县双河见过他，早就闻知他为金训华守墓之事，此事在当时和现在都争议甚大。另一位是这次的颁奖嘉宾徐本禹，他同时也是《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我曾想对他和他任教的小学有所表示，但他婉拒了，他发来的短信至今还很珍惜地保留在我的手机里。他当初和现在都感动过我，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真实性。

虽然举国上下随处可见的污秽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仍然有很多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灵魂。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河北一位老人白芳礼，在生命的最后19年，即从他74岁开始，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陆续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他自己的生活如同乞丐。一日三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水。有一年他到天津市南开大学捐款，学校要派车接他，他说不用，可以省下汽油钱给贫困学生买书，自个儿却蹬三轮车到了学校。在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事一说，台下一片哭声。许多贫困生上台从老人手里接过资助款时，双手都在发抖。去年9月老人去世了，终年93岁。

四川农村一患白血病的女孩余艳，原是被一农民捡来的奄奄一息的弃婴，长大后非常聪明乖巧，很小就会洗衣烧饭，学习也很刻苦努力，不幸于2005年的5月患上急性白血病。因家境贫寒以及她的十分懂事，她决心不再给养父增加无力承担的重负，便放弃治疗，小小年纪就自己安排自己的后事，在病床上偷偷写下遗书，嘱咐后人将世界各地捐赠她的57万元救命钱，分成7份，转赠给其他无钱治病的白血病小患者。一群署名"全世界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余艳之墓"的墓碑上携刻着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来过，我很乖……"她死时只有8岁。

真是感天动地！此时此刻，我在转述以上这一个特别老、一个特别少的两个人的特别感人的事迹时，仍然热泪盈眶。我相信他们感动的不只

是一个人。虽然他们不是“年度”人物，但他们是超年度的，至少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我被感动的大都是极为平凡的人：民工、农民、教师、学生、一般的公务员、普通的老百姓。对有些入选《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我并不那么感动。比如有些官员之所以入选，只是因为在现今的官员队伍中像他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他的那些“美德”也实在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应尽的义务。至于体育冠军的入选，则是把追星当作了“感动”，何况他们的“拼搏”和“贡献”早已得到荣誉和金钱的巨大补偿。他们入选的更主要原因是政治的需要，是政府的作秀，而入选标准当然也不会离开意识形态的一定之规。这也是历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始终没有知识分子的缘故。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袁隆平、黄伯云等那些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人中之杰，值得尊敬。我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有自己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还能担当道义，介入公共事务，捍卫自由民主，揭露权力黑暗，成为社会良心。这类知识分子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感人吗？

2004年一家媒体就曾评选过“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推出50人的候选名单，但遭到另一家媒体的反对，最终这一活动就不了了之，销声匿迹。50人的名单中，是否所有的人都可称之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可商榷，但其中也确实有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如顾准、张思之、江平、邵燕祥、袁伟时、龙应台、刘军宁、高耀洁、丁东……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过中国，也令人感动。当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绝不止其数，如医生蒋和学者李，前者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揭示真相，震动高层，使之采取得力措施，拯救生灵。后者在耗费巨资举办的政治狂欢节中，写下宏文《风雨苍黄五十年》，襟怀坦白，大智大勇，真的是感动中国，令人泪下！

知识分子可以感动中国，但有的权势者惧怕这样的感动，并且阻止这样的感动，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感动会给自己脸上抹黑，而他们所操办的感动则能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央视评选这样的“感动”自有醉翁之意，说穿了其实是央视“悲情版”的“春节联欢晚会”。

最近阅读董健先生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再次证实知识分子的令人感动。董健先生在书中忧愤于腐败的教育和失魂的大学，主张“立人”为大学之本，开拓精神的空间为大学的崇高使命。他在大学里极力提倡：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因此他敢于揭露校园内黑幕，敢于在教育大臣面前指陈教育弊端。须知董健先生本人便曾是大学副校长，如今还是在位的文学院院长，他如此放胆直言，乃是自暴家丑，自揭内囊。这是置既得利益于不顾的牺牲，是不惜遭到上司和同僚压力的勇气。董健先生在该书《世相偶揭》和《招戏剧之魂》、《谈文说史》等几辑中，还把批判的矛头伸向校园之外，他透视贪官的心理，揭露金大侠的虚伪，他忧虑流行文化对公民意识的颠覆，痛陈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呼吁将现代启蒙精神注入当代文学和当代戏剧中……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出他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下转80页）

向华盛顿进军事件

● 雷　颐

1932 年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涌向华盛顿的“历史性进军”及最后被镇压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或是为了“后事之师”，这道伤疤仍时时被美国历史学家揭开，他们的研究、叙述，“拼贴”出这次事件的全景——

1932 年 5 月 21 日晚，时任华盛顿警察局局长格拉斯福特正驱车经过新泽西向南开去。突然，车灯照出一片人影，后来他把当时的场景形容为“一群七十多或一百个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正在游行，他们情绪高昂地边走边唱，不时向从旁经过的车辆挥手。”只见一个男子扛着一面美国国旗，另一个男子则高举一面写着“退伍补偿金或工作”的旗帜。格拉斯福特把车开过去停下，想和他们搭话。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在游行者的手推车上安睡的小女孩，她依偎在全家的衣服堆里，与四周的嘈杂不堪形成鲜明对照。此时，他想不到，以后历史将其称之为“历史性进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格拉斯福特是最年轻的准将，此刻他立即就明白路旁的游行者是何许人也。大约两星期前，全国的报纸都报道游行者向国家首都进军的消息。这些示威者是退伍军人和他们家属的代表，到华盛顿去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这笔补偿金是八年前，即 1924 年许诺给这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的。但那一年经过激烈的争吵，联邦政府又决定要到 1945 年才支付。现在，1932 年，这些自称“退伍补偿金大军”的人把这笔要推迟支付的补偿金戏称为“墓碑补偿金”，他们说因为到政府支付这笔补偿金的时候，其中许多人早就死了。格拉斯福特立即向华盛顿驶去。

当他赶到那儿时，晨报已登出关于“退伍补偿金大军”的最新进展。《华盛顿星报》报道说：“一百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业老兵将在明天早晨乘货运列车从费城前往华盛顿”，来自波特兰大、俄勒冈和中西部的其他退伍兵也都将在那儿汇合。这位警察局的头儿马上就想象出自己将面临可怕的局面。但他不可能看到的是，这支“退伍补偿金大军”将影响到一些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的大人物——这些人物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乔治·巴顿，杜威·艾森豪威尔和爱德加·胡佛。这支“退伍补偿金大军”还将影响到 1932 年的总统大选，这时参加总统竞选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向现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发出挑战，激烈地指责他应对搞得全国动荡不安的大萧条负责。

1932 年，全国将近一万二千家企业倒闭，失业率飚升至 25%，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无人养家糊口。许多无家可归者只能聚在一起，搭起简陋之极的栖身小棚，这种贫民窟被称为“胡佛村”，他们指责总统应为他们的不幸负责。格拉斯福特知道，他现在必须为这支“退伍补偿金大军”建立一所“胡佛村”来安顿他们。但建在何处？最终他选定一块叫做安那科斯蒂亚平地的地方，从国会山经过一个跨越安那科斯蒂亚河的木头吊桥，就可到达此处。

格拉斯福特尽最大可能估算所需物资，购买大量木材、铁钉之类东西，同时他向当地商人要了一些食品，后来他还从自己的钱包中拿出 773 美元买来食品以防食物不足。第一支“退伍补偿金大军”在 5 月 23 日到达，随后的两个月中，到达的人数估计超过 25000 人，不少人携妻带子，要求得到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

事情还要从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第 6 年说起，那时面对这些退伍老兵的赔偿要求，柯立芝总统坚决反对，声称“能够买卖的爱国主义不是爱国主义”。但国会不顾柯立芝总统的否决，还是通过了一项补偿法，规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

服役者每天补偿1美元，在海外服役者每天补偿1.25美元。其中50美元当时就支付，余下的美元到1945年凭证兑付。

直到1929年5月即“华尔街黑色星期一”五个月之前，一直都平安无事。这时，来自德克萨斯的议员怀特·波特曼由于本人是退伍兵，提出了立即兑现补偿金的提案，但这一议案连付诸表决的机会都没有。1932年初，波特曼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想使此议案再度引人注目。1932年3月15日，一个此时已失业、名叫瓦尔特·沃特斯的低级退伍军官在波特兰大、俄勒冈的退伍军人大会上发出号召，要每个人都不付钱乘货车到华盛顿要回自己有权得到的钱。但他的号召当时并无人响应，不过到5月11日当波特曼的议案再次被国会搁置时，沃特斯赢得了大量追随者，大批退伍军人开始跟他一起向华盛顿进军。他们的“进军”得到铁路工人的同情，因为不少铁路工人也是退伍军人，这样他们通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向华盛顿前进。他们在全国各地又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为他们捐送食品、金钱，给他们巨大的道德支持。这时，各地退伍军人都组织起来，全国媒体也纷纷报道此事。

当他们向华盛顿进军的时候，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向白宫报告说共产党已经渗透进这些退伍兵中，阴谋推翻政府。但总统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他说这些抗议者“只是暂时生病”。

但从5月21日起，铁路警察开始把这些人赶下火车，他们被赶下车后则开始阻拦火车，不许火车出站，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面对这种情况，军方有人提出派军队前去干预。但此时的陆军参谋长、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参加战斗的第42师师长，断然否决了这个决定，他的理由是这是政治事件而不是军事事件。他的名字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这时，一些州采取了妥协作法，用汽车把他们运送到本州边界，让他们进入下一个州，继续向华盛顿进军，这样形势有所缓解。5月29日，包括瓦尔特·沃特斯在内的俄勒冈大军到达华盛顿，与先期到达的其他几百名退伍军人汇合。除了安那科斯蒂亚主营地外，陆续又建了26个较小的营地，虽然分散于各处，但还是集中在华盛顿的东北部。不久，这些营地就聚居了二万多人，他们的“总司令”沃尔特宣布了“军事纪律”：“不许乞讨，不许酗酒，不许言辞激烈。”在这两万人中，有一千名妇女和儿童，这是全国最大的“胡佛村”。“补偿金大军”把他们的聚居地起名为“麦克思营地”，他们之所以要用警官S·J·麦克思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营地，他们的营地建在麦克思的辖区范围内，但为人宽和的麦克思并不为难他们。他们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设立了小图书室、理发室，高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还设立了自己的纠察人员维持秩序，一些家长还给孩子上课。警察局长格拉斯福特几乎每天都骑着一辆蓝色的摩托车在营地上巡察，他还安排了一些医务人员每天两次为患者看病。

虽然报纸几乎每天都详细报道了营地的生活，但它们大都忽略了营地生活方方面面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在这个学校、公共汽车和电影院仍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营地中的退伍兵却不分白人和黑人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一同吃饭、一同娱乐。吉姆·班克思是一个老黑奴的孙子，他回忆说：“这是我所记得的第一次大规模种族混同的努力。”

如果说报刊忽略了这种混同现象，却对少数共产党人在这些退伍军人中的活动报道颇为详细。这些报道似乎证实了诸如胡佛总统的新闻秘书西德罗·朱斯林这样的官员的说法，他曾声称：“这些游行者已经从补偿金的要求者迅速成为共产主义者或者游民。”与此同时，在司法部，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主任爱德加·胡佛正在极力寻找“补偿金大军”起源于共产党的证据——历史证明这是一项莫须有的指控。

这时，国会开始讨论是否立即兑付退伍补偿金的问题。6月13日，波特曼议员立即支付现金的提案获准交付表决，估计要支付24亿美元。6月14日，国会就此提案展开激烈辩论，忠于胡佛总统的共和党议员从平衡财政的角度考虑，强烈反对这一提案。但支持这一提案的爱德华·艾思力克众议员在发言为其辩护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场身亡。数以千计的退伍军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参加了他的葬礼。6月15日，众议院以211票赞成176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提案。

6月17日，参议院开始对这一提案进行表决。当天，有8千多退伍军人聚集在国会大厦前

面，另有1万多人则分布在安那科斯蒂亚河对岸，河上的木头吊桥早就被警察吊起，以防不测。辩论进行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在激辩。最后，大约在晚9点半的时候，参议院派人通知沃特斯进去。但片刻之后他就从里面出来，对人群宣布：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一时气氛骤紧，这些退伍军人似乎要攻击国会大厦。此时，一位赫斯特报系的女记者对沃特斯悄声耳语。明显是听了她的劝告，沃特斯对人群喊道："唱'美丽的阿美利加'。"唱完歌后，大多数人就返回营地。随后几天，有许多进军者回到家乡，但斗争并未结束。沃特斯宣布"为了得到补偿金，如有必要，他和其他人将一直呆到1945年"。确有2万多人和他一起坚持下来。此时已渐入炎炎夏季，从6月进入7月天气更是越来越热，营地的卫生状况迅速恶化，食品供应也日益紧张，对此，格拉斯福特和沃特斯二人都焦虑不已。

但此时，胡佛总统和麦克阿瑟、陆军部长赫尔利此时比以前更担心"退伍补偿金大军"会举行暴动，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引发暴力活动。最终，决策者决定在7月22日清除仍"驻扎"在市中心的退伍军人。但警察局长格拉斯福特设法把这一日期往后拖了6天，希望这些退伍兵能自动离开。

7月28日一大早，格拉斯福特和一百名警察来到退伍大军的营地，但退伍兵领导人沃特斯却告诉他，经过投票，他们仍将坚持留在原地。大约上午10点左右，警察把栖居退伍兵最多的一所废弃军械库用绳子围起来，里面的退伍兵开始撤离。同时，为了显示团结，数以千计的退伍兵在附近聚集。就在刚过中午时分，一小群退伍兵又向废军械库前进，试图重新占据它，但被一队警察阻止。这时突然有人向警察扔砖头，警察也开始挥舞手中警棍。虽然有几名警察受伤，但警察并未开枪，连手枪都无人从枪套中拔出。混战中格拉斯福特警服上的警徽被一名退伍兵撕掉。但只几分钟，冲突就停止了。直到1点45分之前，局势基本平静。这时，格拉斯福特看到在军械库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些退伍兵互相斗殴，有几名警察赶忙过去制止。对以后发生的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人们无法确定哪种说法准确，反正不久就传来几声枪响。当混战结束时，一名退伍军人被打死，一名受重伤，有三名警察也受伤。

近两个月来，麦克阿瑟将军预见到很有可能发生暴力事件，所以一直在对部队进行防暴训练。当流血冲突发生时，他根据总统的命令，迅速从附近调来部队在白宫前集合。这时，他的主要助手艾森豪威尔强烈建议他离开街道，命令低级军官来执行这一任务。但麦克阿瑟不听劝阻，一定要亲自组织指挥军事行动，并要求艾森豪威尔与他呆在一起。

随后发生的事情永远铭刻在美国人的记忆中：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坦克第一次在首都的大街上隆隆驶过。麦克阿瑟命令他的部队从市中心把退伍兵赶走，估计有8千多人，为数不少的旁观者也必须赶走。下午4点30分，大约200名骑兵骑在马上挥舞着马刀和战旗从白宫附近的草坪呼啸而出。在这支队伍的前面是这次行动的执行官乔治·巴顿，随后是五辆坦克和大约300名陆军士兵。这些陆军士兵头戴钢盔，端着装满弹药、上好刺刀的步枪。街上到处是人群，有好奇的围观者，公务员，还有"退伍补偿金大军"成员，许多人带着妻小，但大都被骑兵驱赶离开大街，一些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催泪弹的爆炸引起多处着火：军械库附近这些退伍兵塔起的临时窝棚开始燃烧。浓烟与催泪瓦斯融为一体，向四周散去。从晚7点开始，士兵开始全面清除市中心的"营地"，里面共有男女老少约2000人，还有数不清的旁观者。到9点，部队开始越过吊桥进入安那科斯蒂亚平地。

在这里，"退伍补偿金大军"的领导人被告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撤离妇女和儿童。然后军队向"麦克思营地"猛扑过去，用催泪弹驱散了约2000名退伍兵，并将这一营地付之一炬。几千人开始缓慢地向四英里外的马里兰州撤去，在那里停有国民卫队的一些卡车，准备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

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许多人都可亲眼证实，陆军部长赫尔利代表总统早就下令禁止军队越过吊桥冲向安那科斯蒂亚，并且至少派过两名高官向麦克阿瑟传达赫尔利的命令。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但麦克阿瑟将军说"他太忙同时不想让自己和自己的下属被这些从上面下来假传圣旨的人打扰。"这不是麦克阿瑟最后一次无视总统指令——20年后，他在朝鲜战争中因无视总统命

令而被杜鲁门总统解除联合国军总司令之职。(杜鲁门总统曾明确命令不得轰炸朝鲜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军事基地，因为这种行动将使中国更深地介入朝鲜战争。但麦克阿瑟无视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从军事的观点坚持轰炸这些基地，并一直在努力说服国会同意采取这一行动。)

在整个事件中，共有两名退伍军人死亡，一些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伤。

大约在晚上11点钟，麦克阿瑟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他的行动辩护。他对记者们说："如果总统今天不采取行动，允许这种情况持续24小时以上，他将会面临一场真正的战斗这种严峻局面。如果他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一星期，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管理体制将受到严重威胁。"

在随后的几天，报纸和新闻纪录片几乎全是这些退伍兵及其家人四处逃散、燃烧的棚户、催泪弹浓烟、步兵刺刀寒光闪闪、骑兵挥舞马刀这些令人心悸的照片和镜头。在全美国的舞台上和影院里，军队被人嘲笑，麦克阿瑟被人嗤之以鼻。

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罗斯福也反对立即支付这笔补偿金，他认为如果支付，则实际是在大家都在遭受大萧条的灾难时而独独照顾公民中的某一特别阶层。但在读到有关麦克阿瑟清场的报道后，他对一位助手说"这将使我赢得选举"。的确，三个月后罗斯福便以七百万选票当选。乔治·巴顿后来认为"大萧条"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有限，而是军队"这种反对群众而不是乌合之众的行动使民主党赢得选举"。为胡佛总统写传的大卫·伯纳尔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一事件给在任的胡佛总统致命一击。"在绝大多数分析家的头脑中，对于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输赢结果的疑虑此时全然消失。胡佛总统肯定要输。'退伍补偿金大军'是他的最后失败，他的结束象征。"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罗斯福虽然也不赞同支付"退伍补偿金"，却成功、精明地利用了政敌的这次巨大失误，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1933年3月，即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执政的前几个月，退伍补偿金大军又开始向华盛顿汇集。到了5月，就有大约3000人住进一座"帐篷城"，这是罗斯福总统命令军队在华盛顿郊区一处废弃的要塞专门为他们搭建的。在白宫的安排下，国家新的第一夫人爱莲那·罗斯福冒着风雨、踏着泥泞来到这些退伍军人之间，参加他们的歌咏会。这一招果然见效，一位退伍兵这样说："胡佛派来军队，罗斯福派来他的妻子。"到1933年6月，约2600名退伍兵接受了罗斯福总统"新政"提供的工作，虽然还有许多其他人认为每天1美元工资太低近于奴隶而拒绝接受。从1934年10月起，罗斯福便在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建立了"退伍军人培训营"，试图解决"退伍补偿金大军"中其余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如佛罗里达营区的七百多人就参加当地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1936年，怀特·波特曼重提立即支付退伍补偿金提案，此次提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哈理·杜鲁门是位坚定的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新政"坚定的支持者，也是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这次却公然反对总统，支持这一提案。1936年6月，开始支付第一笔补偿金，每人大约得到580美元。最终，给300多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兵支付了近20亿美元。

1942年初，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国会开始审议一项保障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权益的法案。这条法律后来被称为"军人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有关社会保障最重要的立法之一。据此法案，大约780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退伍后在入学深造和参加职业培训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同时保证他们在买房、买农庄或自己经商创业时得到贷款。后来的事实证明，"军人权利法案"帮助制造了一个教育良好、住房良好的新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模式为战后美国经济提供了活力。

罗斯福总统最终改变了他长期反对给退伍军人"特权"的立场，于1944年6月22日签署了这一法令。此时，盟军正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解放欧洲，他手下的将军乔治·巴顿正在率部向塞纳河挺进，而麦克阿瑟将军正为光复菲律宾与日军激战。对这三位此时已被传奇化、成为万众景仰的英雄人物来说，十余年前的"退伍补偿金大军"事件已成遥远的过去，这件令他们极其尴尬的事件似已被忘却。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历史在铭记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并不会忘记他们留下的那道小小的"伤疤"。其实，个人的功过毁誉确在其次，重要的是其能否成为民族、国家的"后事之师"。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换届暨十五华诞庆典在京举行

推举许嘉璐为新一届会长

5 月 24 日，人民大会堂三层小礼堂高朋满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暨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在这里隆重举行。知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会会员、理事、顾问、部分外地团体会员代表及各界人士 400 多人共聚一堂。大会通过了研究会新的章程，组成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大会一致推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 1991 年 5 月。十五年来，在历届会长周谷城、萧克、程思远、费孝通的领导下，本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宗旨，高举爱国团结的大旗，开展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多种形式活动，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

常务副会长张文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实现文化自觉推进现代新文化建设”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和充分肯定了第二届理事会工作取得的进展，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常务副会长曲润海作了关于研究会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

当选会长许嘉璐在会上致词，高度赞扬老同志热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奉献精神，认为研究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联系全球炎黄子孙的纽带和桥梁。

大会后，专家学者和各地团体会员代表分别举行了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与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和炎黄文化工作研讨会。

（王志光）

（上接 75 页）让我心怀感动。虽然我不敢断定董健先生的这本书，是否能感动整个中国，但我敢断言，它定能在知识界、在校园内引起共鸣。

董健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跬步斋”，跬步，乃半步之谓。我理解这不是董健先生的谦逊，而是他的诚实。一方面，他对中国这种虚夸、浮躁、误国、害民的“大跃进”十分反感，提出“跬步”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他对个人的人生步迹也深含着自责。譬如他在书中诚实地承认他在大学时于“红”“白”之间的彷徨，他还诚实地自责个人还残存着知识分子喜欢被权势者“赏识”的依附心态等等。取名“跬步”也是诚实地承认他在追求中国进步的道路上只是迈出了半步，还未能大步前进。与那些犹豫彷徨、裹足不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董健先生的这种老实态度也令我感动。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我深信董健先生老而弥坚，志在千里，定会大步向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像董健先生一样在中国现代化和政治民主的大道上迈出“跬步”，那会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力量！

董健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的书能不感人吗？

2006 年 2 月 18 日晚于上海善作剧楼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第三届会员大会暨成立十五周年庆典

2006年5月24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暨成立十五周年庆典，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会员400余人。大会听取并审议了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通过了《章程》修改草案，推举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及领导成员。许嘉璐当选为会长。

会后，举行了炎黄文化工作研讨会和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

① 大会主席台
② 许嘉璐会长演讲
③ 张文彬作工作报告
④ 曲润海作关于修改《章程》的说明
⑤ 老领导李宝光讲话
⑥ 孙天义会长代表黄帝陵基金会向大会赠送纪念品
⑦ 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场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6年第7期

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感受少奇同志务实、民主风格

上海第一尊毛主席塑像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向华盛顿进军事件

ISSN 1003-1170
07>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